

炎黄春秋

第 **5** 期
2011 年

中国宪法为何难以落实

从历史实践看民主与专制的关系

中央党校“三次路线斗争”大讨论

南阳专区信访工作的历史教训

苏俄的“政治自由”问题

目 录

求实篇

- 1 中国宪法为何难以落实 张千帆
- 7 中央党校“三次路线斗争”大讨论
..... 王海光 于 南
- 14 周恩来张闻天外交风格异同 何 方
- 16 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设想及实施 曾丽雅
- 19 新闻发言人制度与胡耀邦 吴兴唐
- 22 1957~1960年南阳专区信访工作的教训 赵宗礼
- 26 萧乾出任中央文史馆馆长经纬 胡治安
- 30 文革前的《文史资料选辑》..... 雷 戈

争鸣录

- 35 从历史实践看民主与专制的关系 施京吾
- 40 如何理解“尊孔读经”：与杨继绳先生商榷 彭国翔

故纸堆

- 45 1960年公民肖森的上书 任复兴

访谈录

- 49 周巍峙回忆周恩来 徐庆全

亲历记

- 56 我参与王佩英平反工作的回忆
..... 张松林 口述 郭宇宽 整理
- 58 我为“遵义事件”计算死亡人数 王录生

人物志

- 60 吴江在拨乱反正中 沈宝祥
- 65 卢芷芬之死：语文教材改革风波的余波 卢元镇
- 68 徐孔：因直言而落难 白 石

忏悔录

- 72 我对批斗“反动军官”的悔恨 李 华

品书斋

- 73 介绍《爱的哲学》..... 李 锐
- 77 我走进了“胡风分子”圈 彭小莲

古今谈

- 81 从清代农业政策看当代农村变革 高王凌

海外事

- 85 苏俄的“政治自由”问题 金 雁

编读窗

- 92 来信摘登 许人俊 等

顾问 问：

杜润生 于光远 李 锐

编 委 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方 实	王俊义	冯 健	冯其庸
卢跃刚	曲润海	何 方	吴 象
吴明瑜	宋木文	张文彬	张岂之
张希清	张荣华	张惠卿	杜 光
杜导正(召集人)	李一鑫	李大同	
李冰封	李宝光	李维民	杨天石
杨奎松	杨继绳(副召集人)	沈志华	
苏双碧	邵燕祥	周瑞金	金冲及
赵德润	保育钧	郭道晖	资中筠
钟沛璋	凌 云	展 江	秦 晖
袁 鹰	袁伟时	高尚全	陶斯亮
钱理群	章诒和	萧蔚彬	彭 迪
韩 钢	董 健	曾彦修	鲁 諝
雷 颐	魏久明		

社 委 会：

杜导正(主任) 吴 思(副主任) 杨继绳
李 晨 徐庆全 胡竞成 张晓鸥

社 长：

杜导正

法定代表人、常务社长、总编辑：吴 思

副 社 长：杨继绳 李 晨

副 总 编 辑：徐庆全 执行主编：洪振快

社 长 助 理：胡竞成 张晓鸥 杜明明

总 经 理：李 晨

副总经理兼网络总监：张晓鸥

理 事 长：杜导正

副 理 事 长：莊其環 李 琼

理 事：白建钢

秘 书 长：吴 思

副 秘 书 长：杜明明

主管、主办单位：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本刊常年法律顾问：

张思之(吴荣赵阎律师事务所 010-68083211)

步凌云(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 010-85869163)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ISSN1003—1170

国外发行代号：1274M

国内总发行：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订购处：全国各地邮局(所)

印刷：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编：100045

本 刊 网 址：<http://www.yhcqw.com>

本刊电子信箱：yanhcq@sina.com

yanhcq@gmail.com

发行部邮箱：yhcqfxb01@126.com

电话：发行部：010—68532048 68539058

编辑室：010—68534879 68523512

财务室：68525374 办公室：68522852

传 真：010—68532569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 0296号

出版日期：每月4日 定价：8.00元

中国宪法为何难以落实

○ 张千帆

从辛亥革命至今,中国一直面临着“有宪法而无宪政”的困境。在过去一个世纪的漫长历程中,中国历届政府制定了一部又一部宪法,除了1975年的“文革宪法”和1978年受“文革”影响的宪法之外,每一部宪法都罗列了许多公民权利,但在实践中却难以落到实处。如何实现从宪法到宪政的根本转变,已成为21世纪中国面临的巨大挑战。

一、为什么宪法难以落实

中国现行宪法宣布了很多崇高的理念,但由于没有违宪审查机制,在实践中难以落到实处,以致遭到侵犯的事例屡见不鲜。在新闻尤其是在网络上,几乎每天都能看到中国某个地方又发生了侵犯人权的违宪事例。最近,周泽律师发现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江兼任省公安厅厅长,明显违反宪法第65条规定的人大常委职务不兼容原则。种种迹象表明,宪法规定的原则或理念和我们生活的现实发生了脱节。中国改革30年之后,主要问题已经不是有没有法,而是有法却没有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

之所以如此,根源在于民主制度的欠缺。政府被隔绝在社会压力之外,对于是否执行法律享有很广泛的自由裁量;它愿意执行就执行,不愿意执行就不执行。由于人民对政府缺乏政治上的和法律上的控制,因而对它的不作为无可奈何。

因为这个原因,中国不缺良法,而到执行阶段事情就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一旦赋予良法以实际意义,就要不可避免地引发普遍的利益冲突。比如选举,原来权力在上级官员那里,所以有人送钱来买,现在权力跑到选民那儿去了,他即便要买也不来找领导买,而是去找选民买——如果他买得起的话。甚至我们的司法改革也涉及利

益冲突。宪法明明写着“独立审判”,各级领导不会不明白这些道理。但问题是一旦司法独立了,法官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法官”,他们必然会约束各级官员的自由裁量,最后结果也是减少这些官员的寻租机会。

当然,秉公执法其实对任何政府的长期执政都是好的。严格执法有助于控制腐败,控制腐败将有利于保障人民利益,进而减少社会冲突、群体性事件,维持社会和政治稳定,也就是有利于长期执政。国家不太平,政治也不稳定,领导人就很紧张。为什么不去切实地维护人民权利呢?维护人民的权利,人民不就满意了吗?不也就可以实现长期执政了吗?然而,这个道理说起来简单,其实未必行得通。

各级领导很少有长期理性,因为其任期顶多就是两届十年,十年过后已经不关他的事了。尤其到了县级和乡镇一级,地方领导换得更快,一般只有两三年,这个地方治理好坏跟他有多大关系?只要表面上维持一个繁荣的假象,只要不出大事,GDP每年都以两位数增长,就可以升官。这种体制极大地助长了短期行为。

我们很可能幸运地碰到一个开明的领导人,但是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大国,地方大、层次多、官员众,他不能每天都盯着每一个地方,让他们依法行政,执行已制定的良法。我们经常听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政令不出中南海”,所有这些都注定了我们的良法难以落实。

二、为什么说宪法仍然有用

虽然宪法难以落实,但宪法还是有用的。宪法是给老百姓规定权利的,一旦老百姓认识到宪法和他们之间的利害关系,他们就有动力站起来维护宪法。尤其近年来,老百姓越来越认真地对

待宪法。宪法意识不断提高,自觉运用宪法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导致宪法仍然可以为公民权利保障发挥一定作用。2007年,重庆“最牛钉子户”拿着宪法和《物权法》维护自己的权利,最后居然还成功了。这是宪法还有用的一个典型例子。

为什么难以落实的宪法还有点用?

首先,所有政府都关心自己的形象。这在世界上大概没有例外。没有哪个政府会公开说自己“破罐子破摔”。民主政府因为是由民选产生的,有时反而比较“牛”。譬如美国布什总统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因为战事进行得不顺利,民意支持率直线下降,跌落到50%以下,他也可以不在乎——当年是你们选我上台的,无论我这一届做得怎么样,只要我没有违法乱纪,你得等我做完这一届再下台。如果没有这种民主正当性,便格外不自信,外在形象对它尤其重要。一个民意支持率动不动就超过90%的国家,是不能容忍自己的支持率跌落到50%这个水平的。如果无视宪法,放任地方官员滥用权力,必然产生大量的社会不满、冲突甚至暴力事件,这些事件一旦被报道出来,负面新闻肯定会损害政府形象。当然,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控制媒体。在中国,30年来的改革使得这个变得困难了。尤其是在网络时代隐瞒真相越来越困难,而中国已经有好几亿网民。既然政府要关心自己的形象,那么政府就至少有压力甚至有动力去实施这部宪法。

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各级政府都有锐意进取的精英,有真正想把这个国家治理好的干部。近30年来的制度改革,政治精英和学者贡献很大。比如说农村改革确实是由安徽农民发起的,但它是经过有些领导的支持和肯定才得以在全国开始推广的。历次的修宪以及行政诉讼、信息公开等一系列法律上的进步虽然落实不到位,但毕竟是一种进步,而这些也都是由政府精英和法学界合作完成的,有些可能还超前于我们中国社会。比如说在1989年制定《行政诉讼法》的时候,全国恐怕没有几个人真正听说过“行政诉讼”这个词,或知道还有“民告官”这种可能性。但这是政府主动开始的一场改革,而改革的结果是或多或少地约束了政府自己的权力。

最后,虽然法律的实施大打折扣,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它不是一点效果都没有。原来有一个

人大常委说,15%的效果还是有的。在法治国家,法律制定出来就必须实施。虽然不可能达到100%的效果,但是也许可以达到百分之八九十的实际效果。在我们国家,肯定达不到那么高,也许10%的效果总有吧?而10%毕竟不是0,毕竟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一点进步,至少是帮助我们人民提高了宪政和法治意识。公民法治意识的提高进一步对政府施加一种道德压力,法律制定出来就要执行,不执行就是政府的错。因此,良法一旦出台之后,基本上步入了一条“不归路”,政府很难再回头,至少在大的方面。当然,近两年我们也在谈论改革是不是在倒退,但是我们还是不能想象今天政府可以公然地从宪法中删掉“人权”、“私有财产”、“征收补偿”、“法治国家”、“依法行政”等进步理念。这些东西一旦规定以后,就相当于政府和人民重新立了一个约。政府只有去落实,不落实那就是政府的错。在这个意义上,政府也面临实施法律的压力。

三、落实宪法的官方路径

推动中国的法治与宪政有两条路,一条是官方路径,一条是民间路径。官方路径是由政府主动推行的一种制度改革。这条路成本低、效率高,实施也更加有效。问题是可持续性。开明的领导人启动了改革,但碰到既得利益抵制便难以推行下去。另一种路径是由民间发动,促使政府进行制度改革,民间发起但不是由民众完成。民间路径具有可持续性,但缺点是成本高、难度大,而且结果不确定。

官方落实宪法的典型是2001年齐玉苓案。1990年,山东省滕州市第八中学学生齐玉苓考取山东济宁商业学校,但被同班同学陈晓琪冒名顶替长达八年,因其父陈克政(村党支部书记)买通了滕州八中、济宁商校、滕州市教委的有关人员。1998年得知真相的齐玉苓向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1999年齐玉苓不服一审判决后,再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山东省高院经过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后,2001年最终判决,引用宪法第46条,判决被告陈晓琪停止对齐玉苓姓名权的侵犯,以及被告人和有关单位需赔偿齐玉苓人民币十万元。

司 法 解 释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 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

(2001年6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183次会议通过,自2001年8月13日起施行。)

法释[2001]25号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1999]鲁民终字第258号《关于齐玉苓与陈晓琪、陈克政、山东省济宁市商业学校、山东省滕州市第八中学、山东省滕州市教育委员会姓名权纠纷一案的请示》收悉。经研究,我们认为,根据本案事实,陈晓琪等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齐玉苓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并造成了具体的损害后果,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1年第5期。

在该案中,最高法院下达的一个“批复”直接适用了宪法第46条。这是在1949年之后第一次适用宪法条款的司法行为。突如其来的“宪法司法化”是大家都意想不到的,在法学界甚至是社会上激起了一股风波。宪法学者都很激动:中国的宪政时代终于来临了!但是可惜,齐玉苓案后无来者。其实在齐玉苓案发生之后,已经听说最高法院下达了“下不为例”的通知,否则,把公民的宪法权利逐一“司法化”,牵涉就大了。因此,从2001年到现在,我们就再也没有第二个“齐玉苓”。即便遇到凤毛麟角的宪法性案件,法院也会刻意回避宪法。绝大多数时候,法院不会受理案件;受理了,也会以非宪法的依据作出判决。一个例子就是2004年的“乙肝歧视案”——张先著诉安徽省芜湖市人事局因为他是乙肝病毒携带者而拒绝录用。法院判决不予录用公务员的行为是违法的,但是法院的判决怎么读都读不懂,因为明明就是一个宪法平等权的案件,非要通过行政法来判决。安徽省的有关部门明文规定,凡是得了乙肝的不能考公务员,考上也没用;既然有依据,就不是违法行政。所以,法院最后是如何判决原告胜诉的?这个问题弄不明白,因为它绕来绕去偏要规避宪法。到2008年底,最高法院废止了2001年对齐玉苓案的“批复”。从2001年到2008年,所谓“宪法司法化”短短八年时间就夭折了。

当然,齐玉苓案应该从一个更广阔的视角去理解,那就是司法改革。从1999年开始,最高法院前任大法官肖扬制定了人民法院司法改革的第一份纲要。这也是一次官方的主动尝试,改革的目的是要把中国的法官变成“真正意义上的法官”,当时非常激动人心。但是十多年过去了,今天的法官如何呢?不是说司法改革没有成就,但是这种成就多半是表面的、非实质性的。法官不穿军服了,不带大盖帽了,手上拿了一个法槌,换

了一身法袍,但问题是,法院内部的权力结构和外部的司法环境都没有改变,执政党和司法之间的关系更没有改变。我们今天已经到了一个十字路口,连司法改革大方向都开始迷失了:司法改革到底怎么走,是进一步推进司法职业化,还是实行所谓的司法“民主化”或“大众化”,回到五六十年代的模式,甚至回到四十年代陕甘宁边区的“马锡五模式”(马锡五曾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陇东分庭庭长和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他没有受过任何正规法学教育,以依靠群众、调解结案等方式办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四、推动宪法落实的民间路径

我们再看看另一条途径——民间宪政。它的标志是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孙志刚之死是广州警察和收容所滥用权力导致的一场悲剧,经过媒体报道发酵之后迅速影响了全国。全国民众尤其是网民通过各种方式,表达了强烈的道德义愤,再加上当时有青年法学家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使公众视线从孙志刚个人悲剧转移到对收容遣送制度合法性的质疑。社会抗议引起中央高层的关注,最后不仅责令地方政府纠正错误,而且果断地在短短的两三个月之间就废除了实施了半个多世纪的收容遣送制度。这是民间宪政的一



2003年3月,湖北青年孙志刚在广州市收容人员救护站被毒打身亡。4月25日,《南方都市报》以《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为题,最先披露了孙志刚惨死事件,引起全国各地乃至海外强烈反响。8月1日,自1982年5月起施行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被宣布废止。左图为孙志刚像,右图为最早报道孙志刚之死的《南方都市报》。

拆迁条例授予不受控制的地方公权力、公正补偿机制的缺失,加上我们的GDP思维,为地方政府的过度征收、过度发展提供了巨大动力。制度根源在成都市金牛区产生了唐福珍自焚悲

剧,当时正好有人用手机现场录像,并把这段自焚视频放到网上。结果这段视频在网络上广泛传播,引发了极大的道德义愤。然后,北大五位学者以公民名义致信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废止或修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相关条款,促使国务院启动了拆迁条例的修改。和孙志刚案件不同的是,拆迁条例的修改并不顺利。在孙志刚案中,事件发生后三个月就废除了收容遣送条例。唐福珍案件发生后,事过一年,最后正式颁布的新条例问题却很大。由于土地征收、房屋拆迁和收容遣送性质不一样,涉及的既得利益要大得多,所遇到的阻力也更大。

次成功,而且成功的果实一直延续到现在。孙志刚事件是一个标志,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社会公民权利的进步。比如户籍制度改革已提上议事日程,农民工的权利越来越受到重视,等等。在刑事领域,2005年的余祥林案,也是一个震撼人心的悲剧,经过全国媒体报道之后引起了轩然大波,最后触动了中央,促使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联合下发通知,要遏制刑讯逼供和超期羁押。一时间,这些制度痼疾似乎得到了改革,但改革成绩几年之后又似乎“缩水”了。云南“躲猫猫”案等一系列事件把我们的视线引向看守所的法治,让我们看到许多看守所的“未决犯”待遇甚至还远不如监狱里的“已决犯”。

“孙志刚模式”对保障我们中国社会的公民权利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这种模式也存在着难以逾越的局限性。

所有这些事件都遵循着几乎同一种模式和过程,可以称为“孙志刚模式”。这个模式涉及一个流程:首先,一种制度或者某个恶法产生了社会悲剧,这个悲剧被媒体公开报道,如果不是传统的平面媒体,至少在网络上被报道出来,看到报道之后,民众反应非常强烈,地方政府很可能无动于衷,但是最后震动了中央,中央政府关心执政党的整体形象,而如果不及时处理,事件就将产生极其负面的影响,因而中央采取行动,一方面责令地方纠错,另一方面推进制度改革,防止类似的悲剧重演。

首先,这种制度进步的代价是极其高昂的,而且会越来越高。我国每天都在发生着社会悲剧,普通百姓对此甚至已经有点麻木不仁了。当各类社会悲剧、群体性事件此起彼伏的时候,只有那种惊天动地、人命关天的大案才能激起足够的社会影响。孙志刚和唐福珍都是用自己的生命,为我们的制度进步铺了一条血路,因为只有震撼人心的悲剧才能激发我们公民的良知,进而推动一点制度改革。但是随着社会悲剧的越来越多,我们公众对这些社会悲剧的“耐受度”也在不断提高。原来说起贪污腐败,全国声讨一片,现在说起贪污几千万甚至上亿,那又如何?江西鄱阳

2009年底的唐福珍事件可以说是第二个孙志刚事件,它们的过程十分相似。首先,造成唐福珍自焚的制度根源很多,比如土地公有制、城市

财政局一个小小的股长就能贪污近亿元。2004、2005年前后,国家审计署第一次披露了“审计黑洞”、各种各样的公款挪用,也是引起了社会和媒体的兴奋;几年之后,审计署光是披露却无权治理,披露出来的黑洞越来越大却无可奈何,我们也就慢慢习惯了。甚至孙志刚或者唐福珍事件放到今天,既然这些都已经发生过,再发生也未必能引起我们的兴趣。比如唐福珍自焚了,当时我们很受震撼,后来自焚的全国也有,一个都不算什么,至少三个才能吸引眼球,四川峨眉有七八个人集体自焚,媒体才给曝光。

其次,成本高也罢了,有结果也行,但是这个结果是高度不确定的。因为看一看“孙志刚模式”本身,就知道这种运行方式非常迂回曲折,中间要经过好几个流程,其中任何一个流程被卡住就无法前进。第一,是在基层因制度产生了悲剧,但悲剧要经过媒体报道之后才能产生全国性的影响,产生全国影响之后才有可能震动中央;中央如果下决心要改,这时候才回到地方去治理,甚或带来一些制度变革。如此迂回曲折的方式就注定了结局是高度不确定的,在任何地方都可能被卡住。第二,媒体报道可能被地方政府压制。2010年,陕西渭南警方到北京来抓作家谢朝平,因为他写了《大迁徙》揭露三门峡水库移民产生的遗留问题,结果被渭南警方跨省抓捕,只是在全国媒体关注下才求得公正。即便像他这样有胆识有良知的作家,经过这次打击之后也是灰头土脸的。在中国,新闻媒体是一个风险极高的行业。地方政府出于维护自己的乌纱帽的需要而打压记者是屡见不鲜的事情。第三,新闻报道还必须要产生足够震撼人心的效果。但如上所述,人民对于这些是越来越适应、越来越麻木了。第四,即使产生了震撼人心的效果,还必须能震动中央。就孙志刚事件来说,它本身也有诸多偶然因素,如果当时中央坚持不改,说不定现在还在照样实行收容遣送制度。有时候,中央虽然觉得要改,但是时机不到。比如说土地征收和房屋拆迁,2007年通过《物权法》的时候,国务院法制办就想改,但为什么那么长时间,直到唐福珍自焚还没有草稿出来呢?主要是因为各方争议太大。中央觉得时机还不成熟。即便今天,这个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因为它关系“土地财政”,关系中央、地方的财权、

事权分配问题。由于深层次的问题无法解决,征地拆迁改革长期卡壳。最后,即使中央进行了制度改革,制度上有进步了,但是光有规定是不行的,还得让这个制度在全国各地各级政府那里得到落实。在人民监督缺位的时候,改革会面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困境。地方和中央打太极,这也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在这个意义上,孙志刚事件本身就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中央恰好在那个时候认为,废除收容遣送时机已经成熟,在这一点上它和社会基本达成共识,而且采取的措施也是非常具体明确,那就是废除收容遣送制,建立自愿救助制度,地方没有一点自由裁量权,再实行收容遣送就是违法。只有这样,地方才无法滥用权力,没法再和中央讨价还价。

问题在于,并不是所有的制度都能像废除收容遣送那么简单。很多制度都可能会留下一些空间、漏洞给地方政府去钻,因而即便改了也未必能达到效果。比如说,最高法院在余祥林案后下达了通知,禁止刑讯逼供,禁止超期羁押。这个问题当时似乎看起来解决了,但是现在似乎又死灰复燃,而且它也没有解决所有的问题。河北聂树斌的命运其实比余祥林更悲惨:余祥林只是被判了几年的监狱,最后活着出来,还得到了补偿;聂树斌却被错误执行死刑,但是恰恰是他的冤案至今没有得到解决,甚至最高法院责令河北省高院进行重审,它却一再坚持原判,最高法院对它也无可奈何。

最后,公民自身的宪法和法律意识还不够强烈。由于公民积极维权意识不够,民意对政府缺乏足够压力,各级政府不直接受制于选民压力,因而不会感到有义务采取符合民意的措施。

由于这些原因,“孙志刚模式”是没有保证的。它至多只能给我们提供一种迟到的正义,悲剧发生之后,让我们亡羊补牢、改革制度,以防今后再次发生,但是不能从源头上防止悲剧的发生,尤其是无法事前防止悲剧的发生。

五、中国宪政的前景

人民的权利最终要由人民自己站出来维护,所以人民一定要从被动变成主动。近年来,少数几起事例让我们看到了超越“孙志刚模式”的希

望。第一个就是2007年发生在厦门的“PX化工厂”事件。厦门市政府要在离市中心很近的地方建造一个PX化工厂,据说PX物质有致癌风险。当然,市政府有一套自己的说法,为了这个项目的税收和经济效益而强行上马。当时认为有致癌风险的厦门大学病理学教授正好是全国政协委员,她组织了100多名政协委员提案要求停止PX化工厂的建设。然而,这些政协委员的努力失败了;100多名政协委员的力量应该不算小,但是精英政治过程并未能阻止厦门市政府推进PX化工厂的项目,国家环保总局也通过了环境影响鉴定。在这种情况下,厦门人民自己站出来了。市民通过手机联络,最后好几千甚至上万市民到厦门市政府门前“集体散步”。厦门市民通过这种方式迫使市政府让步,在厦门市停建PX化工厂。这可以说是第一起在中国由公民集体自发维权的成功事例。

后来,上海市民模仿厦门市民的做法。当时,上海要造磁悬浮列车,会产生电磁波污染,附近的居民也去“散步”抗议,最后上海市也做出了调整,结果应该能够让多数人满意。2009年,广州市番禺区的居民抗议在这个区建造垃圾焚烧厂。这些居民非常担心自己的生活质量会受到严重影响,所以去市政府门前抗议。最后,广州市的态度比较好,表示愿意听取多数民意,垃圾焚烧厂项目被暂时搁置。另外,最近反乙肝歧视进展比较快,国家卫生部下达了通知,明确要求禁止乙肝歧视。几年前,在针对乙肝歧视的张先著案发生后,一些志愿者建立了“肝胆相照”网站,建立了一个松散的联盟来联络全国的志愿者进行维权,进而引发了一些维权事件。比如在杭州,乙肝病毒携带者雷震要求地方卫生局开健康证明,结果也得到了积极的回应。这些都是通过公民自发的努力,最终推动了公民权利的保障。这些事件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希望,因为它不仅仅是针对悲剧的一种反应,而是公民主动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因而也不需要求助中央干预。

虽然“厦门模式”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希望,但是它也有局限性。首先,厦门市政府让步的具体原因未明,我们不知道是哪个环节哪个部门发生了影响,因此也不能断言厦门事件具有成功的必然性。它也可能是一个失败的案例。和“孙志刚模

式”相比,“厦门模式”的好处在于不要求中央干预,公民行动就能成功促使地方政府做出改革。然而,“厦门模式”也有“孙志刚模式”的局限性,包括结果的不确定、缺乏可预期性和可复制性。下一次在某个地方再发生类似事件,我们并不能说它就能达到厦门那样的结果。事实上,PX工厂从厦门搬到了漳州,漳州市民知道PX工厂来了,也像厦门市民去“散步”,但他们的“散步”却没有发挥作用。厦门事件发生一年以后,在成都发生了和厦门事件几乎完全一样的事件,结果不但没有改变市政府的决定,为首的六人还被拘留。

最后我们看到,民间宪政是需要制度支持的。这个命题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不能忽视人民的力量,没有人民,制度只是一个摆设。麦迪逊很早就说过,只有人民自己才是自由的最可靠的守护者。这个观点当然有它的正确性。一旦人民从政治的舞台上消失,把自己的权利交给政府,乞求政府来维护我们的权利,那么我们很快就会发现,宪法只是一张废纸。清末实业家张謇说得非常好:宪政需要政府来实施,但是人民也要一起来推动。问题是人民怎么去推动宪政呢?是不是通过“群体性事件”,通过“散步”这种零星的方式就能维护自己的权利呢?显然是不行的。没有制度的支持,民间维权必然是逆水行舟、举步维艰,代价极其高昂,而且成功的可能性很小。

当前,要推动中国宪政的实质进步,我们还是需要制度的支持。什么制度?首先当然是周期性的选举、党内民主、党外竞争,等等。只有通过选举,才能够让政府真正对人民负责。其次是不同的权力中心之间的制衡,尤其是司法的相对独立性。要让我们的宪法真正成为一部“法”,要让中国不仅有宪法而且有宪政,我们不仅需要主动、积极维权的人民,同时也要有一套制度,让人民看到这套制度的重要性以及制度维权的希望。现在人民权利受到侵害了,他们能怎么办呢?很多人会选择忍气吞声,这样自然什么都不会发生。现行宪法为人民规定了很多权利,而人民自己要在制度实践过程中逐步学会行使这些权利。■

(作者为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教授)

(责任编辑 洪振快)

中央党校“三次路线斗争”大讨论

。王海光 于南

十年文革结束,如何认识文革,摆到了历史转折的门槛上。毛泽东晚年始终坚持文革是基本正确的,认为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并视为自己一生做过的两件大事之一。^{注1}因而,能不能打破“三七开”的框框,迅速走出文革的阴影,决定了中国的历史路向选择。

1977年8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大”,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同时又高度评价这场运动是“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的伟大创举”,“必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的伟大创举而载入史册”。大会还提出:“要认真组织力量研究党史,学习和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经验。”^{注2}所谓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分别指的是刘少奇、林彪和“四人帮”的问题。

当时包括邓小平、胡耀邦在内的一大批重返领导岗位的老干部,都是以待罪之身进行工作的,文革中加之于他们的罪名还没有澄清。同时,在“揭批查”运动中,揭露出来了大量文革中的人和事,如何定性处理,也都牵涉到对这场运动怎么看的问题。研究“三次路线斗争”问题,实际上就是要对文革十年历史做出个政治交代。但在总结“三次路线斗争”的大题目下,党内有着各种不同的动机。一类是想把文革的罪责全部推到林彪、“四人帮”那里,以维护对文革“三七开”的评价。另一类则是要以实践为衡量历史是非的标准,实事求是地评价文革的罪错。“凡是派”和“实践派”就是这两者的代表。

研究党史和总结“三次路线斗争”的任务,由刚刚复校的中共中央党校承担起来了。在胡耀邦亲自组织领导下,中央党校首先开展了“三次路线斗争”大讨论,成为党内以实践标准评价文革的开篇之作,奏响了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前奏曲。

一、研究“三次路线斗争”思路的形成

中央党校在文革中是康生直接控制的重灾区。1977年3月,胡耀邦到中央党校担任副校长。他一面整顿学校管理,一面筹备秋季开学。他提出:要把被林彪、“四人帮”颠倒的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颠倒过来,要一个一个地问题地搞。^{注3}在就任后即创办《理论动态》,进行思想理论上的拨乱反正。

中央党校确定了“两个为主”(学习马列原著为主,学员自学为主)的教学方针,开设了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党的学说(中共党史和党的建设)四门课程,编出了近百万字的马列著作选读本。在所有课程中,党史教学的难度最大。对于“十一大”提出的研究党史,特别是总结“三次路线斗争”的历史,大家普遍信心不足。

胡耀邦对编写党史情有独钟。在中共中央第一次讨论党校工作时,胡耀邦即提出了编写党史的建议。5月19日,他在党校会议上又对编写党史作了具体部署:要大家提倡敞开思想,提倡争论,收集正反两方面的资料,争取在明后年搞出一个研究党史的计划大纲。^{注4}胡耀邦自己应《人民日报》胡绩伟的要求,还编写过一个“十次路线斗争”的稿子。^{注5}为帮助大家学习党史和总结历史经验,《理论动态》专门一期登载了苏共编写党史的情况。^{注6}

在清理中共党史中,与拨乱反正直接关联的,还是“第九、第十、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但政治敏感性也最强。所以,在讨论党史教学中,一些人提出要多讲前八次,少讲后三次。胡耀邦断然否定了这种观点,强调党史教学就是“研究第

九、第十、第十一次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注7}

但是,要研究文革的历史,就不可避免地要触及毛泽东晚年错误,忌讳多多。党史党建教研室就教学方案讨论了多次,意见很不统一。^{注8}眼看开学在即,党史课的教学方案还是迟迟定不下来。

9月21日上午,胡耀邦到党史党建教研室,听取党史和党建课的教学准备情况。教研室负责人缪楚黄、周逸先后作了汇报。缪楚黄说:党史课最大困难是“三无”。即:一是无党史定本;二是一些重大是非无定论;三是教员多年不搞教研无人能讲课。因此提出两个教学方案:一个是大部分同志去搞党建,研究“三次路线斗争”的任务先放下;另一个是还搞党史,把一至八次路线斗争的稿子发给学员,然后着重研究第九、第十、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经验。当时,大家对党史教学普遍信心不足,存在依靠外援的依赖心理。

当天,胡耀邦去见了邓小平,转告了一些老同志希望他挂帅编修党史的意见。邓小平认为由他出面不合适,要党校先搞起来。邓小平还给胡耀邦说:现在有两个风要很好抓一下,一个是学风,一个是文风。千篇一律,应景文章,无病呻吟。希望中央党校做好这件事。

第二天,胡耀邦再次来到党史党建教研室,就教学工作和如何总结“三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等问题,发表了长篇讲话。这次会议明确了中共党史的教学思路,就是要总结“三次路线斗争”。9月26日,党史党建教研室开会,成立了第九、第十、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专题研究小组,负责起草“三次路线斗争”的提要稿子。

10月5日,在《中共中央关于办好各级党校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要认真学习党史,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经验”。

10月9日,中共中央党校举行开学典礼。叶剑英在开学讲话中专门讲了编修党史的问题。他说:“我希望在党校工作的同志,来党校学习的同志,都来用心研究我们党的历史,特别是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历史。”“我们要把被歪曲的历史重新纠正过来”,“在不久的将来,一定可以写出一部好的党史来。”

二、以实践作为检验路线是非的标准

“三次路线斗争”研究小组经过两个月的紧张工作,最后形成了两个初步研究方案。一个是讲三次路线斗争,另一个是只讲两次,着重说明林彪、“四人帮”是怎样破坏文革的。按照“十一大”的基调,研究方案对文革是充分肯定的。^{注9}

12月2日上午,中央党校召开党委扩大会议,专门讨论党史教学方案问题。在听取党史党建教研室的负责人汇报后,与会者直率地提出了批评意见。

胡耀邦说:我看你们的稿子不能用,是抄人家的。你们自己把历史都颠倒了,这个不行,要立即收回,宣传了错误的东西,走漏出去怎么办?文革一开始就受林彪、“四人帮”干扰,没有按主席的想法搞,许多做法就不是主席思想。普遍夺权是主席思想吗?不是。坐喷气式是主席思想吗?主席领导几十年,是这样的思想吗?主席历来不是这个思想。夺权,大部分干部都靠边站。十几年的党史都讲歪了。林彪、“四人帮”的干扰当时是方兴未艾,怎么排除得了?中央文件怎么选?不能贴标签。因为是中央文件就是正确的,这是什么论啊?错了就是错了。他明确讲:这十几年的历史,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同志讲话,还要看实践嘛。党史颠倒的东西多了,我们不能这样讲。他还列举政治、经济、冤案错案等方面的许多事实,说明文革造成了严重破坏。会上,胡耀邦明确表示了否定文革的态度。他说:“时间越久越看到‘四人帮’给党和国家、民族带来的灾难的深重,把党分裂了,群众分裂了,民族分裂了。”^{注10}

与会者议论纷纷,敞开思想,提出了许多尖锐的问题。但也有一些比较保守的意见。

大家感到:三次路线斗争的问题很大很重要,很不好讲,是全党关心的问题。按这个提纲讲,会更混乱。那么,要不要讲?怎么讲?有的说:有些问题党校解决不了,要中央作结论。有的说:这一期讲不讲?短短的时间,我们的水平行不行?胡耀邦、冯文彬等校领导的态度很明确。胡耀邦说:要讲!是怎么讲法。必须用现在的观点看过去,要跳出框子,要用真正的毛主席思想,通过实践检验来分析。以哪个人讲话、哪个文件为根据,

不是科学态度,那就不是研究了。冯文彬说:问题比较重要,也是全校学员关心的,必须研究,避也避不开。要研究党史就要恢复党的传统,敢于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如果脑子里还有旧的框子,精神枷锁,就研究不好。已经粉碎“四人帮”了,不应再说违心之言,做违心之事。没有这一条,根本不要干。按着现在的方案搞,越搞越糊涂。搞党史要恢复历史本来面目。尽管难,但时间不能拖,越早越好。例如“一月风暴”什么性质?我们看事实,不管那个电报主席看过没有。用客观事实作标准才是科学态度。^{注 11}

最后,胡耀邦提议,由哲学教研部主任、《理论动态》负责人吴江牵头,与搞党史的同志一道,一个月搞出新方案。完全按科学态度,研究清楚了,提交党委讨论。

12月10日,胡耀邦听取了吴江和三次路线斗争研究小组成员的汇报,正式确定了搞一个关于第九、十、十一次路线斗争若干问题的讨论提要。胡耀邦说:怎么研究,抱什么态度,是方法论。方法不对头,研究党史也要迷失方向。要从事实出发,尊重历史,尊重事实,严格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脱离实际,断章取义,都是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他向大家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为什么在20世纪60年代,在社会主义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会发生这场“文化大革命”?要求大家认真研究,搞清楚这个问题,写出有分析有说服力的文章。他还说:评价“文化大革命”要看实际结果,要由实践检验,而不能依靠哪个文件、哪个人的讲话。要完整地准确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而不能断章取义,依靠只言片语。^{注 12}胡耀邦在这里提出的两条原则,一是要完整准确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二是用实践作为检验历史是非的标准。这对于研究小组的成员来说,无异是一次醍醐灌顶。由于指导思想明确了,起草工作进行得很快,一个月后,《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提要草稿)就搞出来了。1978年1月18日,吴江将初稿呈报给胡耀邦。

“初稿”虽然还不能突破“十一大”的基调,如吴江所说“大都是陈言”^{注 13},但已有了新的灵魂。“引言”中说:今天,我们“已经有条件坚持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辨明这几次路线斗争的是

非,把被歪曲的历史真相恢复过来”。^{注 14}这是首次明确提出以实践为检验真理和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

此时,中央已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组织部部长。1月20日他在初稿上批示:“路子是对头的。只是太简略了。应该意气风发地同时又严密周详地加以充实。现在大约是14000字,可扩充到30000字。”^{注 15}

于是,研究小组利用寒假休息时间,加班加点对初稿作了进一步的修改和充实,赶在春季开学前拿出了新稿。修改稿调整了某些章节内容,扩充到38000字左右。题目为《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

胡耀邦还提出了一个新意见:稿子先不上报中央,作为草稿先印发给第一期学员800多人内部讨论,征求意见,然后将提纲连同学员意见一并上报中央。再考虑如何着手编写。^{注 16}此议得到校党委扩大会议多数人的赞成。

三、研究“三次路线斗争”的大讨论

1977年9月,中共中央党校复校开学。第一期学员有高级干部班、中级干部班和理论宣传干部班三种班次,分属一、二、三部,共807人。

第一期学员的情况比较复杂。有的是在文革中先被打倒,后被“解放”的干部。有的是虽然被“解放”了,但没有安排工作的干部。有的是工农出身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有的是选拔进领导班子的劳动模范。也有的是文革中犯过严重错误,不宜留在原岗位的干部。学员的境遇不同,学习心态和对问题的认识大不一样。

为了营造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民主学风,胡耀邦向中央党校学员和教员宣布说:我们在教学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中都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校内研讨问题一定要畅所欲言,讲真心话;要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不要顾虑重重,不要讲违心之言。我们只有这样才能学好理论,提高认识,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增强党性。为了解除学员解放思想的顾虑,胡耀邦还宣布说:我们除了要真实行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外,还要加一条:不装(档案)袋子,学员结业时不作鉴定。

当时的中央党校,是全党思想理论最活跃的地方。许多学员提出,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真正做到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使大家能敞开思想发表意见、讨论问题,希望中央党校能够带个头。^{注 17}

中央党校在课程设置上突出了以实践为检验真理标准的内容。在哲学教学单元,着重从认识论的方面批判了文革中的个人迷信取代实践检验,以权力标准、语录标准代替实践标准的做法。这些学习内容,都为“三次路线斗争”的讨论奠定了基础。

“三次路线斗争”研究小组根据冯文彬等人的意见,在1978年春季开学后,于3月6日召集部分省部级学员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听取对稿子的意见。应邀参加座谈会的有6人,其中有后来调任《光明日报》总编的杨西光。^{注 18}

1978年4月,在党的学说这门课程中,党史教研室将数易其稿的稿子正式铅印发第一期三个班次的全体学员讨论,征求修改意见。题目是:《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提要,征集意见稿)。

《提要》还没有从根本上跳出中共十一大肯定“文革”的政治框框,但在这个框框下填充进了许多新鲜的历史内容。其最有新意的思想成果,是提出了研究三次路线斗争应遵循的三条原则。第一,“应当完整地准确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包括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论述和一系列指示)的精神实质,来进行研究”。第二,“应当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第三,“应当以研究总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为基础,对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进行综合研究”。

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第二条,即对实践标准的论述。它引用毛泽东“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的话为依据,说明“路线的正确与否,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要由实践的结果来证明,由路线斗争的实际总结果来检验。”^{注 19}如此旗帜鲜明地论述实践标准,用实践效果评价“文革”是非,是“文革”后的第一次。

《提要》对当时人们最为疑惑的两个问题——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三七开”的论断、

澄清“文革”以来重大路线是非与“捍卫和高举”的关系,都做出了新的解释,强调不要拘泥于这个“三七开”的数字,鼓励人们要敢于承认错误和实事求是地认识错误。并且说:认真研究文化大革命以来三次路线斗争的历史,澄清事实真相和重大的路线是非,彻底打碎“四人帮”的精神枷锁,是目前所需要的“一个新的思想解放运动”。

研究“三次路线斗争”,最棘手的还是刘少奇的问题。“文革”中对刘少奇进行全民大批判,强加了一大堆骇人听闻的罪名。现在怎么看?吴江领导起草小组在研究中提出,要把刘少奇的问题与林彪、“四人帮”的问题从性质上区分开来,前者是党内路线问题,后者是反革命集团。^{注 20}《提要》虽然还是延续了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和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提法,但一是肯定了毛主席的路线“始终占着统治的、主导地位”,二是确定了刘少奇路线到1966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际上已告结束”,这就把刘少奇和造成“文革”大乱的政治责任实际上区别开了。

第一期学员对“三次路线斗争”稿子的修改意见非常认真,讨论十分热烈。大家对编写《提要》总体上是认可的。认为:“这个材料虽然还是初步的东西,但毕竟提供了线索”,为总结历史经验提供了一个初步的意见,对澄清思想、分清路线是非有很大帮助。“尽管有些问题写得不够,但大方向是对头的”,是个很好的开端,等等。对党校发动学员集体讨论征求意见的做法,大家也是肯定的。认为“先搞个稿子,提出若干问题,然后广泛征集意见再着手编写,这个办法是很好的”。有的还提出“有必要全党来进行总结”。^{注 21}

学员们对“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的研究原则,给予了高度评价。许多小组反映:“这一条很重要,是正本清源,要把它说得更充分一点。”“坚持以实践为检验真理标准的问题,需要突出强调”。有的建议还要加上“尊重历史事实的原则”。有的说:“要实事求是地反映当时的历史面貌”,“不然我们文化大革命的巨大代价就白费了”。有一位高级班学员明确地说:“不能拿运动中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文件作最后标准,应以斗争实践的结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

不满意的意见也不少,许多还是相互对立的。如一些人提出,稿子讲负面的东西多了,“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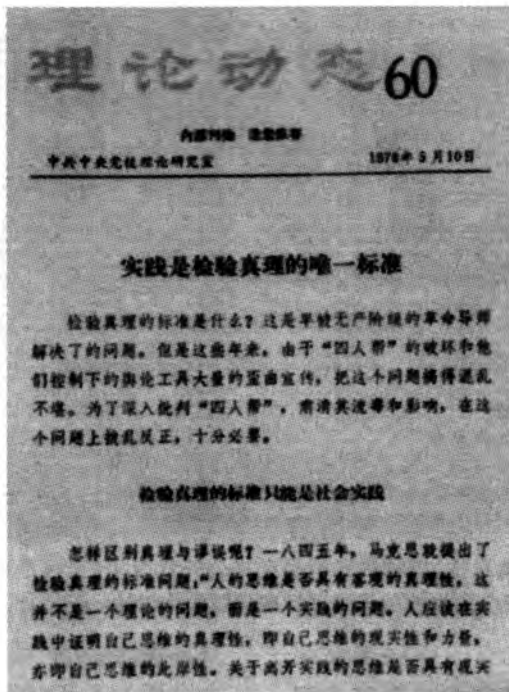
不出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及时性”；有的则认为：稿子对文革的错误揭露不够，回避了许多问题。有的赞扬说：党校做了有益的拨乱反正的工作，“突破了思想禁区”，启发大家认真思考一些问题；有的则批评说：稿子要求大家敞开思想，冲破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种种“思想禁区”，但自己却回避了许多问题，心有余悸。^{注22}还有学员鼓励作者说：“是真理就不怕辩论，怕辩论就不是真理，不能回避要害”。^{注23}

在这次大讨论中，还没有人公开提出否定文革，大家都是以设问的方式对文革的具体问题提出质疑。很多问题都突破了“十一大”的框框，有些设问实际已经在指向毛泽东了。这些意见，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党内对文革的不满情绪。

大家在讨论中一致认为：研究“三次路线斗争”，最大困难是一些重大的历史事实不清楚，具体材料不足。有些学员还把相关史实编出了数字串串。如：“一月风暴”、“二月逆流”、“三家村”、四条汉子（彭、罗、陆、杨）、五一六通知、六一大字报、七二〇武汉事件、八一八接见红卫兵、“九大”新党章、十月的胜利。^{注24}大家强烈要求搞清楚这些事件的来龙去脉。这实际上是党内干部对知情权的民主要求。

四、真理标准大讨论后的深入

中央党校进行“三次路线斗争”大讨论，是胡耀邦为否定文革破题的一篇大文章。这场大讨论，打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旗帜，充分发扬了民主，给学员们带来了一次思想解放的洗礼。虽然讨论稿本身还非常粗糙，在讨论中也有不少僵化的观念，但是能够正确地提出问题，往往要比解决问题更重要。人们可以不同意某些观点，但不能不去思考。事实上，只要能够平等地讨



1978年5月10日，在胡耀邦的组织和主持下，中共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60期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锋芒直指“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

论，很多问题的是非曲直自会清楚的。有些学员后来回忆时说：尽管这次讨论还没有完全否定文革，但对他们思想解放推动极大。^{注25}一旦学员接受了以实践为标准、事实为依据，对文革的肯定也就变成了一张被抽象出来的政治蒙皮。这正是这场讨论最大的成功之处。

根据学员提出的意见，研究小组整理出了一份综合材料，并于5月17日报送给了校党委。校党委将《提要》征求意见稿连同整理出的学员意见，转送给了华国锋、汪东兴等中央领导人。经过汇总整理的学员意见材料，集中表达了党内对文革日益强烈的否定倾向。在这种情况下，再沿用过去的传统政治模式——搞出几个路线斗争的头子作为政治失误的替罪羊——实际上已经很难立得住了。

学员在讨论中反映的意见，也暴露了当时人们是非标准的混乱。有的意见明显地带有“两个凡是”的思想枷锁，有的在“完整准确”和“实践标准”的关系上陷入二元论，有的对以实践检验真理的认识还很有些歧义。因此，胡耀邦和他的理论助手们意识到，必须要进一步阐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观点，把这次大讨论推向全国。

时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杨西光，刚刚在中央党校接受了“三次路线斗争”大讨论的思想洗礼。他在众多来稿中敏锐地发现了胡福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稿的特殊价值，遂与正在着手这项工作的中央党校理论工作者合作，对该文进行了全面修改，修改成为《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一文，突出了实践标准的唯一性。1978年5月，《理论动态》和《光明日报》先后发表该文，引发了一场突破“两个凡是”的思想解放运动。

真理标准大讨论兴起后，1978年6月，中央党校第二期高级班和中级班开学。“三次路线斗争”研究小组参考一期学员的意见，提出了新的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本報特約評論員

张敬惠说：“我们走的是中国道路，这是中国共产阶级的革命道路，我们解决了中国问题。但是这些矛盾，由于‘四人帮’的暗探和他们的控制于我们，所以其害甚烈，是害害害。如果中国继续政治不民主，为了搞八股，搞‘四人帮’，受害比革命前还要重。所以中国要上民主政治，中国要民主政治。”

檢驗真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實踐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个真知真学说的提供和教
育。而在这些革命斗争中
所获得的经验了法上更进一

馬克思主義之新証據
維尼。尤里亞說：「馬克
思說：『黑奴制、阿片、鴉
片、妓女、毒藥、賭博、十
字軍、宗教戰爭、猶太人、
頂上。』馬克思主義是上
帝被咒。』」馬克思主義
是「上帝被咒」。馬克思
主義是「上帝被咒」。馬
克思主義是「上帝被咒」。

物陰陽之正端爲尊，
特雄陽時，當以爲建國
精神之始，而加以修
治，是爲正端。此經心
陰陽和調謂之五穀中
品，是爲陽時之盛，中
品是爲少陰，少陰雖有
陰陽之實，然則何生是
毛乎？毛是陰也，爲毛
胎。毛胎者，母中胎也。
毛胎，爲一少陰也。毛
胎，爲陽時胎陰和氣，則
是爲陽時，而爲少陰。若
一毛胎，則毛胎者，

中，从列宁到斯大林，从毛泽东到邓小平，都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都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都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看明意文。

“知人智”出于莫究。这种洞悉是那些高僧的慧见。般若学要旨说：“一切法皆空无自性”的“般若”指般若寺的功德场遗址。般若寺，唐名道场，亦名陀罗尼场。此场遗址上建陀罗尼塔，是凡人们的修德。般若寺上树“菩提树”。一个寺院名称，也于佛教史留名。但证明不了真经。他们以

[illegible]

足。這和細心是矛盾的。凡是科學的經驗，都不容許有細心的經驗。但是，只要整齊有條，經驗就是科學的一部份，才能經過科學的，經過科學的經驗。所以科學是整齊的科學。這一點，科學的經驗，「整齊」與科學的經驗，是科學的經驗。凡是科學的經驗，是科學的經驗。

党内流行的“‘左’比右好”、“宁‘左’勿右”等等一些说法，“是极其错误和极其有害的”，认为文革的党内斗争大抓大斗，逼供信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造谣诬陷，无限上纲，“冤案、错案、假案之多，被迫害致死的人数之多，都是我党历史上罕见的”。

新稿中对发扬民主的反思，是相当深刻的。照录如下：“要

制,首先是要让人民群众各领导人口味的话,符允许讲不同意见的话,不仅允许讲正确的话,至错误的话(讲错了可帽子,打棍子,真正实行持真理,而且允许改正允许反批评(但只能摆不允许‘无限上纲’,以不仅要有批评已经下台有批评当时正在台上的不仅要有批评林彪、‘四评任何野心家、阴谋家会主义头子的权利,而错误的权利。没有这些这些保证,所谓民主就的自由都没有了,还谈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

稿时间较早,没有来得及会思想解放的成果。

，高级班是 223 人，中级班是 208 人。学习期限是从 1953 年 1 月到 1954 年 1 月。第二次“三次路线”是从 1954 年 1 月到 1955 年 1 月，两个班次进行的。

胡耀邦给中央党校全
中全会的精神。其中讲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提要》修改方案,要求列为党史的一门常设课程。^{注 26} 12月23日,新的修改稿报送给了胡耀邦。

此时，胡耀邦正出席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会里会外非常忙碌。12月26日，胡耀邦对报告批示：“我没有时间看了。可能问题多一点是如何评价刘少奇错误路线问题（特别是林彪、四人帮夸大这次路线斗争）。这没有关系，拿给大家讨论去，议论纷纷，有好处。”^{注 27}

新修改的征求意见稿,吸取了第一期学员的意见和建议,借鉴了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成果,理论更为彻底,表述更加明确。

新稿把初稿的三条研究原则拓展为四条。即：第一、应当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第二、应当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唯一标准；第三、要对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进行综合研究；第四、对于文化大革命应取一分为二的分析态度。第二条和第四条是重点。

第二条体现了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成果,突出强调了实践的“唯一”性。第四条是新添加的一条,明确提出要敢于去揭文革疮疤。“如果不顾事实,不作分析,禁区处处,讳莫如深,把缺点当美德,把错误当成果,那绝不是什么保卫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而是继续保护错误路线造成的灾难和恶果”。^{注 28}

新稿着重阐述了“左”的危害性。指出过去

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其特點是：(1) 以科學的觀點和方法，對社會現象進行客觀的、系統的、定量的研究。(2) 以科學的理論為指導，對社會現象進行深入的、系統的、定量的研究。(3) 以科學的理論為指導，對社會現象進行深入的、系統的、定量的研究。

道。才能從這方面瞭解我們

是地獄和天堂並存的。

1998

到:为了搞好四个现代化,必须安定团结。要政治上的安定团结,必须分清一些大是大非问题,主要是政治上的功过是非。这次中央会议解决了彭老总、陶铸、彭真、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等一大批历史遗留问题。但不是所有问题都解决了。还有同志问,还有刘少奇那个叛徒、内奸、工贼算不算数?有没有?这我还说不清楚,没有看材料,估计大体不可靠。^{注 30}

1979年1月5日到9日,一、二部学员讨论了修改后的“三次路线斗争”提要稿。在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的精神鼓舞下,大家畅所欲言,思想十分活跃。

这次讨论已与上次的情况很不相同。第一次的讨论稿,还不能完全突破“十一大”的政治禁区,但仍有许多学员提出意见,指责稿子对文革的必要性和成绩肯定不够。这次的《提要》修改稿,否定文革的倾向更明确了,理论分析更深入了,叙述也更顺畅了,但学员们反而是普遍感到不满意,认为思想还不够解放,写得不好。这个巨大反差,正反映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带来的党内思想解放的新气象。

学员们认为:“《提要》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总结,距离还比较大,存在问题很多。主要问题是:写的较早,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不够,思想不够解放,观点不够充分,材料不够充分,没有冲破禁区,不是从客观事实出发,而是从概念出发,没敢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主观上可能是为了维护旗帜,回避的东西太多,特别是不敢写毛主席的缺点错误,不能做到是非、功过、赏罚分明,水落石不出,字到纸上留几句;总结经验教训也一般化,不深刻,阐明规律性的东西不够。”大家的意见是:“这个稿子不是小修小补就能用的,必须认真学习三中全会精神,把思想解放一点,胆子大一点,动大手术,重写此稿”。学员们还提出:党的路线斗争,不要编号排列,而应按照发生的事实,是什么就写什么。排次数的方式不科学。^{注 31}

大家还对如何写好文革的历史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主要有:1.必须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准,实事求是。关键是打破禁区,丢掉思想枷锁,解放思想。2.必须从调查研究入手,大量积累资料,把文革中发生的重大事情搞清楚。对搞党

史研究的同志,要开放档案馆,要给他们看一切必要的材料,如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重要记录、专案审查材料。事实不搞清楚,就没法写历史。3.应该发动党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一起来总结文革的历史经验。有的小组还建议,把“八大”以来的中央文件,包括正确的和错误的文件,全部汇集成册,供党内一定范围和党史工作者研究讨论。

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新形势和第二期学员的讨论情况,以“三次路线斗争”为框架的教学体系已不能适应新形势下拨乱反正的要求了。但是,研究文革的历史及其经验教训又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刘少奇的问题必须搞清楚。不把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不彻底清算过去长期的“左”倾路线,全党正在开展的拨乱反正和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是难以彻底的。

1979年2月6日,中共党史教研室向校党委提交了一份报告,提出了研究文革的新思路。报告说:“三次路线斗争”征求意见稿已不能适应学员需要,为研究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建议从研究小组抽调人员,暂借调到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帮助工作,借参加专案工作之便,进行专题研究,一举两得。校党委批准了这份报告。

在胡耀邦亲自指导下的中央党校两次“三次路线斗争”大讨论,反映了在“扭转乾坤的两年”中党内思想剧变的情况。第一次大讨论,首倡实践是检验真理和路线是非的标准,为全党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鸣响了前奏曲。第二次大讨论,本身可以说是劳而无功,但就历史而言,这正是进步的“扬弃”。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带来的思想解放潮流中,“三次路线斗争”的话语成了历史,改革开放的话语成为时代最强音。

虽然,随着“三次路线斗争”命题的被否定,一个旧时代的历史从此跨越过去了,但这场大讨论的拨乱反正的思想解放意义,敢于直面惨淡历史的巨大勇气,已经定格在历史之中。在这两次大讨论中反映的意见和对文革教训的总结,直接帮助了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若干政治生活准则》的制定。也为后来《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四千人大讨论,起了某种历史铺垫的作用。(本文注释详见本刊网站)■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责任编辑 洪振快)

周恩来张闻天外交风格异同

○ 何 方

周恩来和张闻天都是见过大世面、具有世界眼光和时代观念的人，外交思想比较接近是很自然的。再加上不知是否出于历史的原因（张闻天做过党的总书记，两人同为延安整风中挨批的主要对象），他们一直都是互相尊重和互相照顾的。

据胡乔木在纪念张闻天的文章中说，1958年中央决定陈毅接任周恩来兼任的外交部长

时，曾考虑是不是把张闻天给调开，但周恩来主张把他留下来，说他在外交部搞得不错，工作仔细认真。在平时工作中，周恩来比较尊重张闻天的意见，生活上也注意照顾，例如一再招呼晚上没有急事不要叫醒闻天。一次在总理处召开党组会，刘英和中组部的帅孟奇商量调李一氓当驻缅甸大使，一些党组成员表示不同意，说他在和大（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和人的关系搞不好。周恩来也觉得李一氓有点文化人的吊儿郎当，对他当大使不完全放心。但张闻天认为，那样一位老同志，又是名人，就不能去缅甸当个大使？何况他做了外交工作后作风已有改进。最后总理还是同意了张闻天的意见。还有个令我一直记挂在心的事，就是1959年庐山会议后没有见到周恩来对张闻天的批判。开了差不多一个月批张的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他只到会讲了一次国际形势和阶级斗争等问题，批判了彭德怀，也没特别批张闻天。因为他一直管外交，张闻天和毛泽东的许多不同看法可以顺手拈来，但他并未提起，此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周恩来返抵延安时，在机场受到中共中央领导人欢迎。
左起：秦邦宪、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林伯渠、肖劲光。

后也从来没有听到他提过。

张闻天不但同意周恩来的不少外交思想，而且也很佩服他“不知疲倦的工作精神”（这是张常说过的话）。由于一些思想相通，所以周恩来受到批评时，张闻天往往表示同情，有时两人还站在一起。例如1954年日内瓦会议后，毛泽东批评没有及时突出台湾问题，张闻天就曾私下表示不以为然。1956年国内反冒进时，张闻天也在外交部大讲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在外援上打肿脸充胖子。后来周恩来遭到反“反冒进”的批判，张闻天不但表同情，而且认为他不应该来外交部一再检讨。至于两人在外交上的看法一致和互相支持，那例子就更多了。

当然也不必隐晦，周恩来和张闻天两个人之间还是有些矛盾和相互看不惯的地方。例如张闻天就一直认为总理有事务主义的毛病，事情管得太具体，对下面不放手。特别是他认为，总理对形势政策研究不够，也不太重视基本业务如规章制度等的建设，可以花很长时间接见个别记者或中

外人士,却没时间及时审批一些重要文件如年度总结和规划等;有时参加使节会议或外事会议的代表等候总理接见,得等上一两个月,一次等了两个多月,最后宣布总理没时间,不见了,让大家回去。张闻天对这些都很有意见,我也听见他在部务会议上正式提过。但是反过来,周总理却认为张闻天有点偏重研究和务虚,对具体工作抓得不够,特别是对交际工作没兴趣,会见外宾不积极。这最后一点也是张自己在会上挑明并且做了自我批评的。

在我跟他们两人工作中,对他们都很尊重和景仰。但有一次两人发生了冲突,我也被卷了进去。这就是1957年初在外宾接待问题上矛盾暴露和总理当众发脾气的事。说来也话长。

我们好像一直有个内外有别和好做表面文章(难免弄虚作假)的传统,对上边来人检查、外头来人参观、特别是外宾来访,都要做好回答问题的应对准备。打扫沿路和参观单位的卫生,当然更少不了盛宴招待、送礼留念,等等。在我的印象中,这一套在延安整风后就开始了。1944年接待中外记者代表团和1945年接待政协访问团时就这么干过。对外宾接待,建国后特别重视一定要搞得场面宏大,招待丰盛。周总理和陈老总又喜欢讲排场、图好看,弄得接待外宾的工作,不仅是对外交部,也使一些地方和部门感到不胜负担,怕接待不周,受到上面批评。有一次范长江就当着我的面向张闻天诉苦说,建国初期邀请乌兰诺娃来华演出,她因为不适应北京的气候有点伤风感冒。于是总理把他叫去训了一顿,说:斯大林的掌上珠,被你们当成了路旁草;立即以大姐(指邓颖超)的名义,送一件貂皮大衣给她。所以有外宾来,地方不知如何接待就请示外交部,有时外交部派一个科长或科员去打前站,竟可在省市里指挥一切(例如一次在湖北武汉就是这样)。

对这些,几位副部长和礼宾司部分同志都有意见,地方上也有些反映。尤其是张闻天,他认为在外宾接待上规格太高,造成过分的铺张浪费,也违背国际惯例(如群众夹道欢迎、请客送礼太滥太丰盛等),并且公开批评,说这和援助外国、支持世界革命不自量力一样,都是打肿脸充胖子,因此一再提倡进行礼宾改革。也许是乘国内反冒进之风,主管礼宾司的姬鹏飞副部长领人去

了一些省市视察外事处工作,回来就让秘书李颉写了一份反映接待外宾铺张浪费的材料,举了不少可笑的事例,如缅甸文工团访华临行送礼中有每人毛皮上衣一件,这是带回去永远也用不上的。材料写成后,姬批让办公厅主任董越千修改。他看后不满意,又批叫我修改,定稿后他才批示办公厅送新华社《内部参考》发表。

对这件事,从内容到做法,我都同意,但意识到这是针对总理的,因此多了点心眼,除事后报告张闻天外,还特意保留了姬鹏飞的四个批条。张闻天从外地回来,知道这件事后立即打电话给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制止,但吴冷西说不但已经刊出而且也已经发出去了。正好当天怀仁堂有晚会,张闻天遇到邓小平,建议全部收回这本《内参》。不料邓小平却满不在乎,说反映一点情况有什么关系,何况还是在《内参》上,用不着收回。张闻天同我商量补救办法,我也没辙。而且无独有偶,正是在这件事的前后,张闻天原先布置礼宾司起草的礼宾改革方案,在征求各方意见后已形成正式文件,张闻天就报请代总理陈云和邓小平审批。但陈云是个谨慎的人,他说这是周总理管的事,还是等他访问回来再说。在历时三个月访问亚欧11国之后,周总理一行于1957年2月6日回国,3月7日在国际俱乐部一次酒会结束后,当着外交部领导的面(张闻天没参加),没指名批评分工管礼宾又在场的姬鹏飞,却故意指名并不相干的乔冠华,发了一通脾气,说以后请客没钱了就用我的工资。大家心里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但没人吭气,只有贺龙和乔冠华跟着敲边鼓,说他们的工资也可以拿出来。张闻天和外交部酝酿好久的礼宾改革,从此也就束之高阁。据说,直到文化大革命后,中国的礼宾规格才经过几次改革,逐渐固定了下来,大致与国际惯例接上了轨。

礼宾问题讲得这么啰嗦,因为这是张闻天和我本人在1959年外事会议上挨批斗时的一条重要罪状——“反总理”。实际上,根据我的观察,无论是张闻天还是周总理,后来好像都没把这当成一回事。他们的关系依然不错,所以才有一年后陈毅接任外交部长时,正是周恩来主张让张闻天继续留任的事。■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责任编辑 洪振快)

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设想及实施

○ 曾丽雅

在邓小平所设计和推行的改革方案中,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重要内容。正如他所说:“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冷溶、汪作玲主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以下简称“《年谱》”,第1134页)早在1978年9月15日,邓小平就提出了中国的政治体制与现代化不相适应的问题。他指出:“从总的状况来说,我们国家的体制,包括机构体制等,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人浮于事,机构重叠,官僚主义发展。”“总的说来,我们的体制不适应现代化,上层建筑不适应新的要求。”1980年4月10日,他又说:“中国搞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现在还只是开步走。一开步走,就发现我们许多方面不适应,面临的问题成堆,如体制臃肿、官僚主义严重、人浮于事、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低等。解决这些问题,不是容易的事,不改是不行的。”他明确指出:“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可能顺利地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年谱》,第376、617~618、688页)

邓小平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既是为现代化建设创造必要的条件,也是与经济体制改革相提并论的。

1980年8月18日至22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邓小平在会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对中国的政治体制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是好的,是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但是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着许多弊端,如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他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制度问题更重要,“这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

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制度的影响,以致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以往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相信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年谱》,第663页)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提出了解决政治体制问题的几个要点:一是权力不宜过分集中;二是着手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三是从长远着想,大量培养和使用比较年轻的、有专业知识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

基于此,党中央在这些方面着手做了一些工作。

首先,精简机构。1981年10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要真抓中央这一级的机构改革。部委太多了肯定误事,每个部委的人太多了也肯定误事。机构不改革,计划就不能很顺利地执行。1982年1月13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邓小平在会上作了《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的重要讲话,指出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如果不搞这场革命,让党和国家的组织继续目前这样机构臃肿重叠、职责不清、许多人员不称职不负责,工作缺乏精力、知识和效率的状况,这是不可能得到人民赞同的。3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问题的决议》,原则批准《国务院机构改革初步方案》。至6月底,经过精简机构,国务院所属部委、直属机构和办公机构由100个裁并为60个,工作人员总编制缩减1/3左右。

第二,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1982年2月20日,党中央公布《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从而废除了干部领导职务实际上存在的终身制。这项工作是通过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作为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过渡办法。从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决定设置中央顾问委员会,到1992年中共十四大决定不再设立,中顾委存在了10年。它成为解决党的中央领导机构新老交替的一种组织形式,使一些老同志在退出一线之后继续发挥一定的作用,为实现新老干部的交替与合作做出了历史贡献。邓小平把这一措施与思想政治方面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联系起来,指出:“搞终身制,老当第一书记,谁敢提意见。中国封建主义很厉害,这个问题不解决,就要把人推向反面。”(《年谱》,第659页)

第三,解决干部队伍年轻化问题。中共十二大走的第一步是干部年轻化,中央委员会中60%的干部年龄为60岁以下。在党中央和国务院新的领导班子中,新选拔的中青年干部占32%,平均年龄由64岁下降为58岁。领导班子老化的现象有了初步改善。邓小平对干部年轻化问题看得非常重要,认为“这是革命和建设的战略需要”,“让老人、病人挡住比较年轻、有干劲、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到亡党亡国的问题。”(《年谱》,第865、798页)

邓小平在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时,也认识到了中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难度:其一,中国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是个缺乏民主传统和法制传统的国家,“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甚至包括干部职务终身制。”(《年谱》,第666、688页)因此解决起来不那么容易;其二,中共是个老党,中国革命经历的时间长,老干部多。因此,干部年轻化的问题不是一下子可以解决好的。但这些问题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邓小平指出:“这件事搞不好,我们就会丧失民心,四个现代化也没有希望。”(《年谱》,第939、800、807页)

的确,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情况复杂。除了在改革干部结构、实现新老交替、推进干部“四化”方面取得了进展,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措施并没有落实。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政

治体制中的弊端日益突出,各种消极腐败现象日渐严重。因此,到1986年,邓小平重新把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

这一年6月10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央负责人汇报经济情况时说:“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1980年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但没有具体化,现在应该提到日程上来。不然的话,机构庞大,人浮于事,官僚主义,拖拖拉拉,互相扯皮,你这边往下放权,他那边往上收权,必然会阻碍经济体制改革,拖经济发展的后腿。”6月2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又说:“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9月3日,他对日本朋友竹入义胜说:“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9月13日,他在听取有关次年经济体制改革方案时,更尖锐地指出:“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年谱》,第1121、1126、1134、1137页)

邓小平在1986年的多次讲话中,再三重申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是为经济体制改革扫清道路及中国改革的全面发展要求提出来的。

邓小平不仅反复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而且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内容、步骤等也提出了要求。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邓小平指出:总的目标是三条: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他把这三个目标联系成一个统一体,认为“调动人民积极性的最中心的环节,还是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生产力发展了,人民积极性调动起来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就增强了,社会主义制度就巩固了”。(《年谱》,第1143页)他还指出,改革要向

三个目标进行,一是要达到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即领导层的活力;二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三是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邓小平追求的目标是:领导层的活力,领导机关的效率和基层的积极性。他认为,“领导层有活力,克服了官僚主义,提高了效率,调动了基层和人民的积极性,四个现代化才真正有希望。”(《年谱》,第1152~1153页)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邓小平指出: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第二个内容是权力要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同时地方各级也都有一个权力下放问题。第三个内容是精简机构,这和权力下放有关。在党政分开问题上,邓小平指出:“党政分开,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党要善于领导,不能干预太多,应该从中央开始。干预太多,搞不好倒会削弱党的领导。”过去“在很多事情上党代替了政府工作,党和政府很多机构重复”。这既造成机构臃肿,也造成效率不高。“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在权力下放问题上,邓小平说,“真正下放权力,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才能把人民群众和基层组织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年谱》,第1137、1126、1153、1135、1121页)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步骤和方式,邓小平认为“改革总要有个期限,不能太迟”,他希望“明年党的代表大会要有一个蓝图”,即十三大要提出一个改革方案来。他还指出,政治体制改革比经济体制改革更复杂,每一个措施都要涉及千千万万人的利益,主要是涉及广大干部,所以“步子要更稳,必须是有领导、有秩序、自上而下地进行”。做到“第一要大胆,要坚决,第二要谨慎,要照顾到我们的传统,要理顺各方面的关系”,“力求步骤方法合乎自己的实际,力求及时总结经验,有错赶快改”。(《年谱》,第1137、1156、1205页)以使改革顺利进行。

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和建议,1986年成立了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经过研究和论证,形成了《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初步方案)》。198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大,正式宣布“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全党日程的时机已经成熟”,

并把邓小平1980年8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作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性文件。十三大报告确定,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兴利除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是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在人事更替上,十三大最主要的特点是确定了“三老半退,四老全退”的人事安排格局,即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同时退出了中央委员会,邓小平留任中央军委主席,陈云改任中顾委主任,李先念在1988年4月召开的七届全国人大上免去了国家主席职务,改任全国政协主席,彭真、邓颖超退出中央委员会并分别免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和全国政协主席,徐向前、聂荣臻免去中央军委副主席职务。

从中国实施改革战略始,邓小平就不断地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同时也指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艰巨性和困难性,即中国的“积习太深,习惯势力大得很”,“每项改革涉及的人和事都很广泛,很深刻,触及许多人的利益,会遇到很多的障碍”。但他更指出“政治体制改革要坚决搞下去”,“我在有生之年要搞,我们这一代要搞”,“只有这样搞,才能扫除实现现代化的障碍”。(《年谱》,第1157、1134~1135、1201页)

邓小平对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大贡献,便是实行了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和退休制。他自己先后辞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1989年9月4日,他又请求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实现从领导岗位上完全退下来。他批评和反对“个人崇拜”,认为“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1页)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尽管任务艰巨,但我们必须努力去践行邓小平当年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设想。■

(作者为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当代江西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洪振快)

新闻发言人制度与胡耀邦

○ 吴兴唐

新闻发言人不是一个“人”，而是一项制度。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主要领导人和组织者之一的胡耀邦同志，十分重视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完善和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中联部新闻发言人制度是耀邦同志亲自提议建立的。他在当时还指出，党中央各部门，国务院各部委都要创造条件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这是政治开明的表现。

从1984年起，我任中联部新闻发言人长达十年。其中前两年多时间，我曾多次作为工作人员参加耀邦同志会见重要外宾。他的敏捷活跃思路、开放开明态度、平易近人作风、风趣幽默话语以及率直好动性格，都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现在，新闻发言人制度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如果我们把这项制度作为政治文明建设的一项内容来看待的话，尚有许多可以改善的地方。

1984年11月25日至29日，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内部访华。胡耀邦、邓小平、陈云等中共领导人同金日成举行了多次会谈和会见。我作为中联部研究室的负责人参加了其中的一些活动。在欢送晚宴之后，耀邦同志请钱李仁等中联部领导留了下来。耀邦同志说，这次同朝鲜领导人谈得很好，见到外界对这次访问有些猜测，已同朝鲜同志商量过，待金日成同志回朝鲜后正式发表访问消息。他说，我方可由中联部新闻发言人来发表，由此中联部建立起新闻发布会制度，你们带个头，党中央其他各部门也要搞新闻发布会；外交部已有定期新闻发布会，建议国务院其他部委也要有新闻发言人。他强调，这样做是政治开明的表现。他又说，金日成的访华消息，中联部要召开新闻发布会，不仅要宣读新闻稿，还要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请中联部同朝方商定一个同时发表的时间，期限在一个月之内。

根据耀邦同志的指示精神，部领导多次召开部务会议，决定成立中联部新闻局，任命我为新闻发言人，并对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作了周详的筹

划和布置。组建新闻局时，起始只有我和吕瑞金两人，后来来了胡晓，共三人。没有经验，人手少，任务繁重。我们克服困难，经过近一个月的紧张准备，在外交部齐怀远和全国记协丁永宁的积极帮助和配合下，中联部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如期召开。中外记者提问热烈，而且涉及的范围也很广泛。我们尽可能作了明确的回答，而不使用“无可奉告”这类生硬语言，努力达到耀邦同志提出的开放、开明的要求。

新闻发言人作为一种制度，除召开定期或不定期的新闻发布会外，还有其他职能性的重要任务。例如：为中央领导人会见重要外宾准备参考材料和谈话备用稿；中央领导人会见外宾后向主要媒体记者进行新闻吹风；接受中外记者的专题采访；做好中外记者的电话采访，一定要有人值班，一定要对记者提出的任何问题作出答复；同中外记者进行一些联谊活动，进行非正式的交流 and 交谈。

20世纪80年代初，耀邦同志提出开创党的对外联络工作的新局面，以党际关系四项原则为指导，积极发展同各国各种类型政党的关系。“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党际关系四项原则，是耀邦同志首先提出来的。这一指导原则是耀邦同志从1980年到1982年期间分别同意共、西共、荷共和希共（国内派）等政党领导人会谈中逐步形成的。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正式确定为中共发展同各国政党关系的原则。

1983年，在胡耀邦总书记领导下，中央批准并转发了中联部《关于进一步开创党的对外联络工作新局面的基本设想》。1984年9月，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听取了中联部的汇报，对党的对外工作做了重要指示。耀邦同志当时还指出，不仅要向外国政党和外国朋友，而且也要向国内各级机构宣传党的对外联络工作的方针和政策。因

此,宣传开创党的对外联络工作的新局面和党际关系四项原则,成了当时中联部新闻发言人的一项主要工作。

过去,中央领导人会见外宾的消息,通常由外交部、中联部等主管部门向新华社提供新闻稿,由新华社向媒体发新闻通稿,内容十分简单和刻板。新闻发言人制度逐步完善后,就由新闻发言人在领导人会见外宾后,向中央几家主要媒体记者进行“新闻吹风”。“新闻吹风”大大增加了领导人会见新闻报道的内容,也成为民众了解中央政策的一个渠道。因而这项工作成了新闻发言人的重头戏。

1984~1986年是中共政党外交转折和开创新局面的时期。各国政党和组织的领导人纷纷来华访问。耀邦同志强调:“无论是大党还是小党,凡他们的领导人来访,只要有时间都可以安排我来见。各党是一律平等的,意见不同也不要紧,相互交流有好处。”因而在这一时期,耀邦同志会见外宾是十分频繁的。

会见之前,我们照例要向领导提供会见参考材料和谈话备用稿。除正式会谈外,耀邦同志很少按照我们准备的备用稿来讲。他的谈话有自己的思路和风格。他多次向我们指出,同外宾谈话一定要有针对性,事先要摸清情况,谈话要有新的思路,不要千篇一律,不要老套套,你们准备的材料我都看了,你们是花了功夫的,对我很有帮助,但是你们一定要有新思路,或者提出一些新问题,不要把我上次讲过的东西还给我,也不要把报纸上公开发表的东西抄一遍给我。耀邦同志性格外向,谈锋很浓,不回避有争议性的问题,并鲜明地表明自己的看法和观点。他不仅语言生动,还配以各种手势和动作,兴奋激动时就手舞足蹈起来。

耀邦同志有个习惯,就是在会见外宾前半个小时就来到会见大厅。听取情况汇报和商讨同外宾谈话的主要内容。一般情况下他都十分准时,有时稍迟几分钟他也会说明缘由,并说声“让你们久等了”表示歉意。但有一次,当我们提前几分钟走进人民大会堂会见厅时,只见耀邦同志已经坐在那里了,而且看样子已经坐了有一会儿了。他见到我们进门即起身迎接,并同我们一一握手。这使我们很不好意思,连忙表示歉意。而他摇

了摇头笑着说:“不必不必,不是你们迟到而是我早到了,我想在这里静一静,思考一些问题。”耀邦同志在我们面前既不摆架子,也不掩饰自己的情绪。通常情况下都是情绪饱满,积极乐观,谈笑风生。但有时也会沉默少言,眉头不展,不断抽烟。

“新闻吹风”对我来说既难又易。难点在于耀邦同志同外宾谈话内容广泛,语言新鲜,时常即兴发挥。我的面前放了两份稿纸,一份做记录,另一份草拟新闻稿。这就需要思想高度集中。既要迅速又要准确,因而难度很大。但也有容易之处,就是耀邦同志对新闻报道的开放态度。当耀邦同志同外宾握别,我送新闻稿请他审批。他说:“我不看了,除了谈话中有两点(他指出这两点的具体内容)现在不便发表外,其余的统统可以讲。”他补充说,以后就照此办理。于是,我向等候在另一小厅里的新闻界的朋友们进行“新闻吹风”,遵照耀邦同志的指示精神,详尽地宣读了我记录的会见内容,并提供我草拟的新闻稿,至于具体如何报道请各位记者自定。这得到了记者朋友们十分热烈的反应。因此在这一时期各媒体发表的新闻稿可以有所不同,中新社不同于新华社,《中国日报》不同于《人民日报》。

1986年12月28日,胡耀邦总书记会见来访的法国社会党第一书记若斯潘。耀邦同志照例在会见前半小时来到会客厅。那天,他愁容满面,始终沉默不语。但在同外宾谈话一开始,耀邦同志立即活跃起来,一扫沉闷气氛。耀邦同志在同外宾谈话时,喜欢用答问对话形式。他自己提问题也鼓励对方提问题。当时在上海发生学生示威游行,若斯潘一行刚从上海来京。于是若斯潘问:“您对上海学运如何看法?”耀邦同志停顿一下,答道:“我个人的看法,只是我个人的看法是,对待学运如同治水。中国从古代起就有治水的经验,那就是只能疏导,而不能堵。”这是耀邦同志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胡耀邦外交思想是一个大题目,需要探索和研究。这不是本文题目所能及。但如上文所述,耀邦同志在会见外宾前经常就各种题目同会见陪同人员交谈,也涉及我国总体外交和政党外交的一些问题。而当时有条规定,这种形式的谈话是不准做记录的,所以只能凭记忆将耀邦同志的谈话内容梳理出几条,也许可以作些参考。

一、打破旧框框 ,发展新思路。几年来开创党的对外联络工作的新局面 ,政党交流有了很大的发展。关键的一条就是打破旧框框 ,发展新思路。我们的思想不要被旧框框老套套束缚住。

二、什么样的政党都可以交往。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政党和组织 ,除少数法西斯性质的政党外 ,什么样的政党都可以交往。政党交往就是交朋友 ,交友越广越好 ,朋友越多越好 ,左中右、上中下都可以来往。

三、各国政党应是独立自主的。独立自主地制定自己的纲领和政策。各政党由于处境不同 ,历史背景不同 ,必然会有不同看法和意见分歧 ,这是很自然的。重要的是不能把自己的看法和观点强加给别人 ,更不能任意指责。这在国际共运历史上已有许多教训。可以通过交流和交往达到相互了解的目的 ,还要做到相互谅解。

四、政党交往形式可以多种多样。有正式的和非正式的 ,有政党所属的团体和机构的来往 ,还可以相互派考察团组。可以相互通信 ,用口头或书面方式通报情况 ,逢年过节发些贺卡 ,联络感情。总之要灵活多样。

五、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我们的独立自主外交政策 ,就是根据国际事件的是非曲直作出我们自己的判断和提出我们自己的主张 ,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大国集团 ,也不怕任何压力。只

有这样做了 ,才有我们自己的国际地位。

六、坚决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的正义斗争。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党都有同我们党交往的强烈愿望 ,这是件好事情 ,要作为重点工作来做。我们同第三世界国家过去有共同的遭遇 ,现在又面临相似的问题 ,在情感上是相通的。过去我们相互支持 ,现在在反对外国侵略、压迫、干涉方面和在国内经济建设方面都要相互支持。坚决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的正义斗争是我国社会主义外交的立足点之一。

七、同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关系终究是要恢复的。研究和处理同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关系要有长远观点和历史观点。要有三个区别 :东欧与苏联区别 ,恢复关系可以先易后难 ,先东欧后苏联 ,对苏联 ,要把对外搞霸权同国内社会制度相区别 ;把苏联政策同广大苏联人民相区别。

八、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同我们的时代已相距很远。现在的科技新发展 ,包括生活中的新发明 ,马克思是没有看到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要坚持 ,但马克思主义要不断发展。这种发展一要同本国实践相结合 ,二要同时代发展相符合。因而你们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

(作者为中联部新闻局原局长)

(责任编辑 洪振快)



SIEMENS

西门子助听器

Hearing Aids

服务热线:010-84608877

SW 声望听力
www.sw-tl.com

请认准西门子听力集团授权证书 西门子听力仪器(苏州)有限公司

北京西门子听力集团 洪爱波 摄 (摄于2009年2月) 北京西门子听力集团 洪爱波 摄 (摄于2009年2月) 北京西门子听力集团 洪爱波 摄 (摄于2009年2月)

注: 请以西门子听力集团产品说明书为准, 销售人员应遵守产品使用说明书, 不得擅自修改。

1957~1960 年南阳专区信访工作的教训

○ 赵宗礼

三年“大跃进”使南阳专区非正常死亡和外出逃人数多达上百万，其中仅 1960 年就锐减约 70 万人，为上年底总人口数的约 11%。正由于此，1960 年 11 月“民主革命补课运动”时，南阳是仅次于信阳的“重灾”地区，除由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杨蔚屏坐镇南阳指挥抓运动外，国务院也下派 43 个得力干部到南阳，协助河南主抓南阳的“整风整社”。丁乃光和周总理的秘书何谦及一位叫霍幼方的人是国务院下派工作组的负责人，第一负责人丁乃光还兼任了南阳地委书记，名列第一书记林晓之后，实为中央的“钦差大臣”。

丁乃光来了以后，给习仲勋、安子文、张苏并国务院机关党委写了“关于淅川县党、政主要负责人严重违法乱纪、瞒上欺下等问题的报告”、“淅川县县、社、队反、坏分子残害劳动人民的种种刑罚报告”、“南阳专区缺柴情况的报告”等。这些报告在今天看来虽然在个别政治术语上难免有历史的局限性，和略有以“左”反“左”的味道，但仍不失为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譬如丁乃光 1961 年 1 月 27 日给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国务院秘书厅写的“淅川县人民向中央写信遭受反、坏分子打击报复的五个例子”（实际是 4 个，因其中有 2 个是重复的），就是研究“反右”和“大跃进”时代人民群众上访权利被剥夺的强有力证据。

淅川县的例子

下面原文抄录丁乃光给中央几个权威部门的信及附件。信的原文如下：

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国务院秘书厅：

我随国务院机关下放干部到淅川县工作了

十多天。这个县是封建势力复辟了的三类县，据说是南阳专区的“光山(县)”。

工作中接触到原县委书记、蜕化变质分子梁宏江打击报复、封锁消息的罪行，我顺便查了几封中央有关部门转到县里查处的人民来信。因我没有到县人委去查，对国务院秘书厅转来查处的信件，还不了解。

看了这几封信后，我感到 1957 年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秘书厅召开的人民来信来访工作会议上，以及随后国务院关于加强人民来信来访工作指示中，所提出的省以下对人民来信来访“多办少转”的原则，是仍然需要坚持贯彻的。中央监委关于不要把群众控告转给被告人手中的规定，对我们办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的人来说，仍然必须严肃执行。中央秘书室予（即“豫”，下同——作者）甲（59）字第 2031 号转给淅川匿名信，是一封极为重要的来信，不知怎么搞的，这封信竟落到被告人手里。这几件案子，如果我们在检查总结来信来访工作时，结合研究一下，找出经验教训，我想这对改进今后的工作，是会有教益的。

即致

敬礼

丁乃光

1961 年 1 月 27 日于南阳

附：淅川县人民向中央写信遭受反、坏分子打击报复的五个例子

淅川县人民向中央写信遭受反、坏分子打击报复的五个例子

一、1959 年 9 月 12 日，由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予甲（59）字第 2031 号，转淅川县匿名信一件。

主要反映 :1.本县人民生活所迫 ,到处外逃 ,思想混乱 ,人心不定 ;本县公安部门手持手枪 ,违(下有一字不清——作者)人民。2.社员饿得到处逃难 ,死亡很多 ,青泉村一带在 13 天中 ,死亡 30 多人。3.有一个小孩饿死了 ,别人拾去蒸熟卖。4.本县有坏子分集团 ,破坏全县的生产生活。

此件浙川县收到以后由原任县委第一书记梁宏江(蜕化变质分子)布置给公安局副局长姚忠清(蜕化变质分子) ,去了解写匿名信的人 ,姚布置了三个公安人员下去调查 ,经过查对笔迹 ,查出是滔河公社朱家山村叫朱定远(男 ,37 岁 ,中农) ,调查后他们决定为 :写反动匿名信。并假造朱的历史 :1946 年至 1947 年当伪保长二年(实际朱的祖父当过保长) ,他们并还说 :向中央写反动匿名信 ,诬蔑浙川县生活不好饿死了人 ,骂县委是坏分子集团。

当时朱定远在青海 ,梁宏江令公安局把朱由青海扑回来。两次向地委请示 ,要判朱的刑 ,地委都没批准。后梁宏江、姚忠清私自把朱定远判管制三年。

此案一直到这次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 ,于 1960 年 12 月 15 日 ,才由浙川县人民法院审查 ,撤销原判管制 ,朱定远无罪 ,予以平反。

附注 :朱定远为复员军人 ,因为浙川县党、政领导被反动分子篡夺 ,封建势力复辟 ,实行残酷的阶级报复和破坏 ,他在本县本乡生活不下去了 ,才被迫外流青海。在途中向党中央写了匿名信 ,揭发坏分子 ,揭露真象。从现在浙川县民主革命补课运动看来 ,朱定远所写的完全真实 ,而且他当时就看出了县里有坏分子集团、公安局向人民专政这个本质的问题。可惜这信我们一般对待 ,又转到坏分子手中 ,结果朱定远本人遭到报复 ,更重要的是浙川县的问题也未能及时发觉 ,此后一年 ,全县在反坏分子继续统治下 ,又死去了三、四万人民。这个教训 ,值得记取 !

丁乃光

1961 年元月 23 日

二、1960 年 3 月 19 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60)字第 592 号 ,转浙川县委的一件人民来信。

主要反映 :1. 原来县委书记段秀廷在这 ,人

们生活还好 ,现在的梁宏江书记来了以后 ,群众生活一天比一天的下降 ,甚至两个多月人们都吃不到五谷 ,至今饿死的人很多。2.双河镇饿死些人就无埋 ,温自强五个孩子全部饿死。3.外逃的人有三分之一。

此件转来后 ,原县长李磊石(反革命分子)说 :“得下去调查 ,这里头有敌人破坏”。当时组织了王成叶(处理人民来信的干部)四人 ,下双河镇调查。调查结果 ,这个大队 3000 人死了 430 人 ,占总人数的 14%。后给李磊石汇报 ,李大发脾气说 :“不是真实情况。死人数字过大 ,再去调查”。第二次 ,由南阳地监委和王成叶又去调查 ,情况属实 ,一直拖到 1960 年 9 月才报地委。以后李磊石对王成叶进行了打击 ,不叫王作人民来访工作 ,调下乡去。

三、1960 年 4 月 9 日 ,由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60)诉字第 651 号转王定川反映河南浙川县大湾村 ,群众缺粮的来信一件。

信中反映说 :“我在河北省曲周县监委会工作 ,接到家内父亲的来信 ,大湾人民生活因缺粮造成人口死亡 ,问题严重 ,他们住的一个院子三户 ,就死了 5 人。”

此件转到浙川后 ,原县委即派监委秘书王喜才 ,城关公安员王信(严重违法乱纪分子)去了解王定川父亲有啥问题 ,为啥胡反映情况 ?王信便先找王定川的父亲王新昌 ,追问他去信的目的动机何在 ,并叫王写书面检查 ,纠正原来的说法。大队支书胡保仓在包产队社员代表会宣布 :“王新昌他儿子是干部 ,女婿是军官 ,他二儿上学 ,他还说破坏话 ,他还告支部”。并把王戴上历史不清的帽子 ,不准参加社的会议 ,也不准二儿上学。

实际王定川反映的问题最属实。该队 1959 年 11 月到 1960 年 2 月上半月每人只吃一斤到一斤半红薯 ,干部多吃多占严重 ,社员吃到的很少 ,因此造成全队死亡 155 人 ,占总人口 1851 人的 8.3% ,严重的第二包产队死亡人口占总人口的 25%。

四、1960 年 5 月中央监委转来长春市监委干部靳平宇向中央监委的信 ,叫浙川调查处理。

信中主要反映 :上集公社水田大队靳家沟包产队群众生活问题很大 ,全村原 250 多人 ,现有 180 多人 ,除外流 20 多人外 ,其余都死了 ,全村过

去 100 多个劳力,现在只有三、四十人能做些不重的活了。

此信转到浙川后,梁宏江(原县委第一书记,蜕化变质分子)即指示叫面向上级写假报告,说:“该村原来 230 人,去冬今春(1960 年)只死 14 人。大多数是常年有病体弱死的,外流只有 5 人,都属于干部家属和不安心农业生产而外出的。另一方面派人了解向靳平雨反映情况的人,在知道是其弟靳平清去信说的后,即捏造假材料,把砍小树 20 棵说成 320 棵,将村人丢的 30 斤红薯说成他偷红薯母 450 斤、青菜 500 斤等,将其交群众大会斗争,斗争中并追逼他给其哥写信的动机,并叫承认自己是睁着两个大眼说鬼话,斗后交群众管制。

实际是:靳沟村 258 人,死亡 31 人,占总人口的 12%。外流 8 人,主要原因是:(1)干部作风粗暴,捆、绑、吊、打社员,(2)群众生活不好,59 年 11 月份每人每月吃粮 3.12 斤,红薯 60 斤,12 月份每人每月吃红薯 24 斤,元月每人每天定量 6 两(16 两秤)实际没粮。

五、1960 年 3 月 19 日由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60)字第 592 号转浙川县人民来信一件。

主要反映:“前段浙川县是段书记领导,人民生活还好,现在梁书记(指梁宏江)领导,仅仅将他们干部生活提高,群众生活一天一天下降,甚至两个多月都没五谷吃,去冬今春饿死的人很多,双河镇死亡的人就没人埋,穆自强五个孩子全都饿死,浙川县的人死有一半,向外逃的有三分之一。若不早些挽救,危险更不可设想”。

此信转到浙川后,由当时在浙川工作的地监委宋科长(指宋希琨——作者)、县委王成业、彭星三(王成业应该就是前述第二封信中的王成叶,彭星三是县监委干部——作者)等四人前往调查,经八天时间了解:双河镇大队问题特别严重,全大队原有 3855 人,59 年冬到 60 年春共死亡 486 人(实际是 487 人——作者),占原有人数 12.6%,全大队患浮肿病 412 人,其中严重的 215 人,死亡 177 人。粮食供应上 59 年 11 月份每人每天吃一斤红薯(折 16 两秤 4 两粮),12 月份前半月每人每天半斤红薯,接着就没粮,中间每人发一斤粮吃 6 天,到元月下旬才开始统销。调查后向县委汇报,原县委书记处书记李磊石(阶级异己分子)、组织部副部

长黄福田(蜕化变质分子),商量后说:“死人没那么多”。并怒气冲冲地说:“你们咋调查的,为啥给人家弄些假材料,把未死的人也统计在死人数中(实际没有),一岁以下小孩谁叫你们统计的,重新调查”。(宋希琨等第二次调查时,县里还派常委宣传部长杨芳馨等人参加。又经过半个月的调查,因时间改为从 1959 年 12 月份算起,比上次少 1 个月,4 个月时间死亡 427 人,依据南阳地委(60)479 号红头文件——作者)二次调查后,黄福田说:“一,浮肿病根本没那个病,不能说浮肿病死的;二,要站在党的立场上看问题,要认识这是阶级斗争,不能仅说是生活问题;三,一岁以下的小孩死不能算成人。”最后说这材料县委研究后再决定,4 月份调查后一直不上报,并对调查人打击报复,将彭星三调出县监委,放到农村不叫回机关,把王成业抽下乡,不叫他两人再做调查工作。

1961 年元月 28 日

南阳专区其他县的例子

追根溯源发现,南阳境内为了封锁消息,粉饰太平,从 1957 年“反右”以后就开始了对给中央写信的人进行了各种不应有的政治迫害。这里另举 3 个给中央写信的党员因反映人民群众生活不好,两个被打成“右派”,一个被打成“潘复生式的右倾机会分子”的典型例子,算是对丁乃光所反映情况的一些印证:

第一个例子是,1956 年 12 月 20 日,“南阳何庙中心乡受饥饿的群众”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信中反映该乡“有的户粮食仅够年内吃,有的年内也不够,明春各家都没饭吃,大官寺村已逃荒 50 多人,挑着孩子,背着行李,到外边讨饭。有的因病没钱治,又没有好吃的,很快就死了”。“希望挽救我们的饥饿,叫我们活下去”。还说了句牢骚话:“我们也是中国人,而且还是生产粮食的人,可为什么不让我们吃粮食呢?”

1957 年元月 22 日,南阳地委在收到省委办公厅批转的这封给中央的匿名信件后,下批给南阳县委,责成其“了解群众,弄清情况,妥善处理,告知地委”。南阳县在查出写匿名信的是转业军人、何庙中心乡党支部副书记范伟正所为后,立即把范撤职辩论(实际就是批斗)。到这年 8 月河

南全省批判“潘复生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时,范伟正又成了批斗的重点人物,反复批斗,直到1961年秋,经“甄别”后,才得以平反纠正。

第二个例子是,唐河县桂章乡李汉章村(现社旗县兴隆镇桂章行政村李汉章村民小组)复员军人、共产党员、少尉军医张培养1957年4月12日给“中央委员会全体同志”写的一封长信。信中反映该村“开春到4月上旬,要饭人数已达40%以上,牲口死20%以上,卧倒不能干活40%以上。80%农户已经断粮”等严重缺粮情况。5月3日南阳地委收到了省委办公厅转来的此信后,虽然立即责令县里对严重缺粮的农民进行了及时的救济,但随着反右斗争的深入发展,便借着“反击右派进攻”的政治大气候,给张扣上“诬蔑合作化运动”、“反对粮食政策”的“右派”帽子。张培养本来已安置在方城县郝庙区卫生院且当了副院长,是位吃“皇粮”的公职人员,因之被开除公职,开除党籍,发配到原籍生产大队当了一名卫生所医生。

如果说前两个例子是下边县里的领导们对上书中央者施展的打击报复的话,对一位叫邱文华的人打击报复那可是南阳地委的直接责任了。1957年5月20日,中国农业水利工会干部邱文华给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写了一封控告信,反映南阳境内的泌阳县饶良区建设农业社淡庄村,农业社搞得不好,“入春以来99%农户的食物都是红薯干、野菜、树干、菜根……关庄等区不少村的三分之二的人都出去要饭去了。”“各村的牲口死亡的情况更加惊人,普遍是死亡在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之间,严重的几乎死光。我村东北角马砦合大社到现在牲口死的只剩四五头了”。还反映地方干部违法乱纪严重:“现在谁要说外边好,或者说饿得没劲干活,马上就会给你扣上个‘破坏分子’、‘坏蛋’的帽子,并把你列入被驱逐的名单。乡社干部和村干可以随便辱骂群众,捆绑群众,甚至自己制定法律,社办公室墙上挂满了流氓、游民游街的牌子……”这封信是邱文华1957年5月8日至5月14日在家乡探亲期间,根据自己亲眼见到的诸多第一手材料写成的。邱文华临走时还把村里农民们吃的食物如野菜、树花、树皮等带给接收他信件的全国人大信访部门的同志。

邱文华所反映的情况可以说都是完全属实的,都是有根有据的。遗憾的是,由于此信全国人大在转给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局后,中共中央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两大权威领导机构联名分别给河南省委和南阳地委发来了要求对此信所反映的情况给予答复的信件。南阳地委认为邱文华给他们“捅了大娄子”,惹了大麻烦,因而利用6月底即开始的“反击右派”的大气候,于1957年7月20日,分别给党中央、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河南省委、河南省人委和中国农业水利工会发去了“对邱宗华(实际应为邱文华)所反映情况的调查报告”,该报告避重就轻,文过饰非,在否定主要实质性问题,即农业社没有搞好,农民缺吃少穿严重,逃荒要饭情况在不少地方都有发生的核心问题后,反而诬陷邱文华是“阶级报复”(实际邱文华家里是中农成分,是当时团结的对象),“片面地听取家庭与个别富裕农民的反映,既不深入调查,又缺乏以阶级观点加以分析。可以说在这以前他就对合作化和粮食政策存有成见,所以对新农村情况那样的认识和结论。”南阳地委给中央和全国人大的报告给人一种感觉,好像社会主义的新农村农民们缺吃少穿是天经地义,无可厚非。1957年9月18日,南阳地委授意泌阳县宣传部给中国农业水利工会写了封“强烈要求对邱文华进行组织处理的三点建议”信。1957年9月开始,中国农业工会便开始对邱文华进行车轮战般的轮番批斗,达几个月之久,给邱文华扣了一顶“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的帽子。1958年4月,邱文华被撤掉行政职务,开除党籍,工资由行政20级降为23级,月薪由75元降为40元,发配到河北省唐海县柏阁庄农场劳动改造,直到1962年秋“甄别摘帽”。

可见,像丁乃光信中所反映的淅川县干部剥夺人民群众信访权利,还对给中央写信者疯狂打击报复的事,实际上在南阳专区“反右”斗争开展以后就突出存在着,只是到了1959年下半年后,南阳农村缺粮情况越来越严重,开始到处饿死人后,这样的事越来越多,打击报复现象也越来越严重了。但这从根源上追究,还不全是南阳地委的责任,河南省委应负主要的责任。有个老干部在回忆录中说:“1959年下半年时,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曾下过这样的指示:‘不能让那些

萧乾出任中央文史馆馆长经纬

○ 胡治安

我与萧乾的结识是在1986年。当时我是中央统战部干部局一处处长,负责联系国务院参事室和中央文史馆。那年5月9日,我拜访国务院参事室主任吴庆彤,他刚由国务院副秘书长转任参事室主任。他是很敬重的老同志,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统战意识较强,也很尊重周围同事,在交谈中没有一点官腔,谦和融洽。他提出中央文史馆馆长叶圣陶先生年老体弱,且社会职务甚多,无暇顾及中央文史馆的工作,建议再聘一位党外副馆长,请统战部推荐人选。回到机关,经过研究,我们推荐了萧乾。他是著名的记者,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在欧洲战场采写大量作品,采访过联合国成立等重大历史事件,他还是有名的作家、翻译家。那时,文史馆员中书画界人士居多,文史方面的名望之士极少,萧乾的经历和成就,很适合文史馆副馆长这一职位。中央文史馆馆长、副馆长、馆员,都由国务院总理聘任。文革中一些老馆员把周恩来签发的聘书挂到墙上,免去了抄家及皮肉之灾。随后,中央统战部向中央报告推荐萧乾为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不久,获得批准。

7月18日,中央统战部设宴招待萧乾,恭贺他出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当天下午4点半,我

到萧家迎他来部。他很高兴,虽然是第一次见面,却像老朋友一样亲热。饭后,我送他回家,到了楼下,他非让我上去坐坐不可,盛情难却,随他上了三楼。他的书房也就十来平方米,显得十分拥挤,甚至是乱七八糟,到处堆着书,几乎插不上脚。书桌前的窗户也很小,并不明亮,我想到他住的这个木樨地21号楼同对面的22号楼差别太大,就对他说道:萧老,你应该住得宽敞些。他说:不是没有房子,是我不愿意搬。搬家太麻烦,一搬家,书就乱了。现在虽也显得乱,但每本书放在什么地方,我心里有数。萧乾当时已经77岁了,还十分勤奋,每天晚上8点睡觉,凌晨两三点钟就起床写作。他在这间狭小的书房里写了百万字的作品,对它很有感情。他在《我这两辈子》里,曾这样写到这间屋子:

这书房就是我的归宿。我将在此度过余生,跑完人生最后一圈。我希望在这里能多出些活儿。然后,等我把丝吐尽时,就坐在这把椅子或趴在这张书桌上,悄悄地离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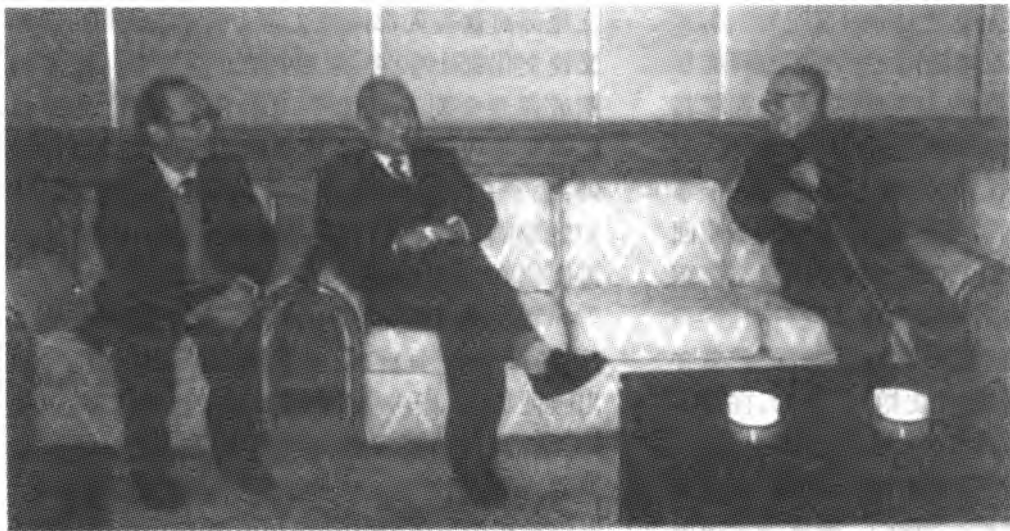
叶圣陶先生1988年2月16日逝世后,我们自然想到由萧乾接任中央文史馆馆长职务,同时请启功先生任副馆长。这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

有损于河南形象的信件出省’。根据这一指示,信阳专区第一书记路宪文曾指令信阳邮电局检查扣发了一两万封给中央部门的告状信件。”这话我至今尚未找到正式的文字依据,但近读《炎黄春秋》2009年第9期刘立强的一篇文章,文中说一个村子23个党员饿死了20名,剩下的3个人联名给毛主席写了一封血书,却被省委秘书长戴苏理亲自扣下了,还要追查处理“肇事者”。如果这件事不是子虚乌有的话,那位老干部回忆录中提到的吴芝圃让扣信件的事,很可能确有此事。

所以说,“反右”以后,特别是“大跃进”后期,河南境内普遍扣发上访信件,打击迫害写信者,其主要责任应归河南省委。当然像淅川县那样恶劣地超常发挥地执行,当事人也应难辞其咎。而当时中央主管信访工作的部门违背信访工作“少转多办”的原则,把控告信一个一个地都转到被控告者手里的做法,也是写信人遭受打击报复的直接原因。■

(作者工作单位为南阳日报社)

(责任编辑 洪振快)



1989年萧乾(中)、启功(右)出任中央文史研究馆正、副馆长

和中央统战部联合召开全国参事室、文史馆工作会议,将文参工作提到政治体制改革、加强民主政治建设的高度,加以认识。萧乾参加会议领导小组,但在相关会议上,只听不说。有一次到晚上10点多了,会未散,我说,萧老,打乱了您的生活秩序,请回吧。他笑笑说,没关系,坐着不动,足见他文史馆工作事务是很关心的,很想在这个领域里做番事业。

对萧乾、启功的聘任,得到中央批准。到了1989年1月23日,中午、晚上分别宴请萧乾、启功,请他们出任中央文史馆馆长、副馆长,征求本人意见。他们都表示乐意受聘,并感谢党的信任。席间,萧乾对文史馆工作提出建设性意见,如面向海外开展工作,吸收一些港、澳、台文化名人为特邀馆员,以文会友,沟通感情,为统一祖国服务;又提出还可聘请吴作人、巴金、冰心这样一些文坛耆宿为荣誉馆员,提高中央文史馆声望。粉碎“四人帮”后,萧乾多次出国访问、讲学、参加笔会,与港、澳、台许多文化界朋友恢复了交往。他希望以中央文史馆为纽带,把一些文化人团聚起来,因此有如上的提议。

中央文史馆一副馆长,一再向统战部提出,聘请境外文化名人为特邀馆员。根据萧乾和文史馆党组的意见,我们向国务院推荐了香港的饶宗颐先生,作为开展这方面工作的试点,人选肯定是超条件标准的。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还写推荐信。而在国务院秘书长会议讨论此事时,有人提出,在港台聘文史馆员,没有先例……

时任书法家协会主席的启功,诉了很多苦,说有人用他这个书协主席牌子,招摇撞骗,有个郝×搞个“书法学院”,说乌兰夫批准的,启功是院长,我根本不知道有此事。又说书协内部矛盾重重,四个人有三派,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各派都打启功的旗号,甲来

说一种意见,如说茶是红的好,我不表态,他回去就说,启老说了红茶好;乙来说,茶是绿的好,我不说话,他回去说,启老说了,绿茶好,搞得我左右不是人,一定辞去书协文史馆之职。

5月10日,中央统战部再次宴请萧乾、启功,恭祝他们出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副馆长。参加宴请的有吴庆彤、王海容、吴空,中央统战部秘书长刘小萍,一、四局局长等人。餐后送走了萧、启两位客人,其他留下研究萧乾、启功任职后的待遇问题。在“官本位”的中国,自然要把他们列在那个官阶上。萧乾在《改正之后》一文中说:“作协来信问我对于为作家评职称的意见,我回信说(1)作家的地位只取决于其作品的艺术价值和他拥有的读者。文学史上没有哪个作家曾评过职称。(2)然而中国有中国的国情。这里,级别、职称关系到住什么房子,病了吃什么样的药,以至有急病时能不能坐上小汽车去医院。因此,我赞成大搞这项工作。”当晚对他们的职级研究讨论一遍,认为萧乾享受正部长级、启功副部长级是合适的,并要我明天写出报告,送国务院。报告送走了,如泥牛入海。后来为他们的待遇问题,请示过多次,报告总是有去无回。

萧乾对文史馆工作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他倡导并担任主编,联合全国32个文史研究馆共同编纂的大型《新编文史笔记丛书》50册,600余万字,是弥足珍贵的史料,他还担任中央文史馆与上海文史馆合办的综合文史杂志《世纪》的编委会主任,亲自参与刊物的编审工作,还将他和夫人合译

的《尤利西斯》的3万元稿费,捐给《世纪》杂志。

1990年1月25日晚,中央统战部为萧乾举办寿宴,祝他80华诞。他高兴即席讲话:如果有人问我活到80岁,最深的感受是什么?我说,直到80岁还在岗位上,还能做事、能写作,近十年来,写了80万字,译了20万字,今后十年要写回忆录,同时做好文史馆的工作。可见他对文史馆馆长职务是很看重的。

1997年6月7日,他致巴金信中,把中央文史馆当成“我安身立命的文史馆”。随后,在同年12月14日的信中说:“我这个人就好多嘴多舌,只有在政治重压下,才能沉默下来。1957年后不再写了,不再说了。文革后翻身了,晚年当了中央文史馆馆长,不需要做什么工作,但能使我减少失落感,觉得自己还有点用处。”(《文学故事报》2005年第45期)

他很关心馆员的困难。1990年7月19日,我去看望萧乾,他说起黄苗子、郁风夫妇从国外来信,反映一些落实政策的问题。郁风、苗子早已办好去澳大利亚讲学手续,1989年6月6日成行。他们收到儿子的信,说苗子的工资被停了,住房也有麻烦了等等,因此致信萧乾,要求向有关方面反映。郁风是中央文史馆馆员,苗子与萧乾也是老朋友,他们求萧乾帮忙是顺理成章的。他怀着对苗子、郁风非常崇敬的感情说,他们两位都是文化名人,在国内外有广泛结交,影响很大;关心他们的人很多,他们是党的老朋友,早在40年代就与中共地下党有联系,参加民主运动,有历史贡献。1957年黄苗子被打成右派,受了很多委屈,吃了不少苦头。萧乾特别强调,苗子、郁风去澳洲是早有计划的,只是未确定具体日期,并非“六四”后的突然行动;他们在海外也未发表任何不利于国家的言论。他说,现在党中央宣布了对国外人员的政策,即使参加了非法组织,只要脱离,也不追究。何况对他们这样的呢。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为了赢得民心,对他们夫妇的事情一定得处理好!拖久了对我们国家不利。

他说得很诚恳,我听得很认真,从萧老的谈话,透视了他对友人的忠厚,对国家大事的关注,令人感动。我对苗子、郁风也有所了解。回机关后,即与有关方面联系。文化部艺术局的人说,郁风出国未经批准,用的是过期护照,是违法行为。

文化部对这类人都停发工资,这种作法没有错。又说文化部1989年的139号文件规定:公派出国或探亲逾期三个月不归的,停发工资,先作停薪留职处理,一年后取消公职。谈话人口气相当硬,说了一阵后,也有点转软的味道,说考虑到他们的影响,又有你们(指统战部)说话,要改变也可以研究,作为个别情况处理。

我找文化部是7月28日,而在此之前的7月25日下午,已经与黄苗子所在单位人民美术出版社和新闻出版署联系了,新闻出版署的王先生告诉我:“黄苗子出国前委托吴葆昆同志代领工资,吴代领后存入银行,自去年离去直到现在,不仅没有停发工资,而且还在调资中提了两级,每月增加60多元,今年春节还送去团拜请帖。苗子的儿子向吴要过工资,吴没有给,因为苗子走以前没有交代将工资交给儿子”。出版社表示,极希望与苗子取得联系,沟通思想消除误会。新闻出版署拟将上述情况书面报告中央统战部。这个回答及实际作法,与文化部官员的谈话形成鲜明对照。8月1日萧老再次来信,并附上郁风儿子的信,我将有关结果告诉萧乾时,他表示感谢。黄苗子夫妇也来信来电表示谢意。

萧乾做馆长,是带着历史“伤痕”上任的。

早在1947年5月4日,萧乾为《大公报》写了《五四文艺节感言》社论,其中写道:“外国作家如萧伯纳,年届90仍在创作,而中国作家年甫50,即称公称老,大张寿筵。”众所周知,当时茅盾称茅公、郭沫若称郭老,这话岂不是攻击革命作家茅公、郭老?第二年,遭到郭沫若的挞伐,他在《华商报》上发表《斥反动文艺》,“鸦片、鸦片,第三个还是鸦片,今天你的贡烟就是《大公报》的萧乾”。继而写道:“对于这种黑色的反动文艺,我今天不仅想大声疾呼,而且想代之以怒吼:御用、御用,第三还是御用,今天你的元勋就是政学系的大公。”萧乾被戴上了政学系“反动文艺”的帽子。他是顶着这个黑帽从香港回到内地的。他进入内地前,英国的剑桥大学送来了聘书,朋友再三动员他去英国任教,那里有他七年的劳绩,还有些许存款。但他“怕当白华,怕成为丧家之犬”,毅然决定回到北京,回到他土生土长的老家。谢绝了一切劝说和利诱,这一举动还多少憋着一股气,要洗刷“黑色反动文艺”的罪名,以行动证明自己

的清白和爱国并不后人的情结。但有着文坛泰斗打下的“黑色”印记,回国后他不能搞创作,不能当主角,只能写点通讯搞些翻译,当“副总”,如《人民中国》副总编、《译文》编辑部副主任、《文艺报》副总编,尽管如此,他也安居乐业,有所成就。1951年他的长篇通讯《在土地改革中学习》在《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读后非常推崇当即写信给胡乔木称赞“写得很好,请为广布,发给各地登载,并可出单行本”。他在土改中所写的一系列文章汇编成报告文学集《土地回老家》,被译成11种文字出版。1957年他被卷入深渊,一顶右派帽子压制了22年。政治重压下,沉默下来不再写了,不再说了。并且“处处设防”,小心翼翼。1979年后他翻身了,旧著重版,新著不断,一部一部,我每年都要收到他赠送的带着油墨味的新书,亲笔写着“治安同志指正,萧乾”。

萧乾行事很谨慎,但也敢作敢为,坚持原则。

有一个年轻学者S,在原单位傲视一切,关系紧张,十分孤立,无法待下去。原单位一负责人对我说,此人太坏,人品坏,道德坏,学风坏,搞了几个姘头;图书馆的数据看到有用的就撕下,他没有一个朋友,学校开校友会也不请他,连他弟弟也骂他“不是人”、“野心家”、“投机分子”。他自称就靠了一个中央领导,谁也奈何不了他!在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时,钱正英、钱学森、胡绳几位副主席对他都有啧言,表示反对。

为给S君找个安身之所,有关领导指示将他安排为中央文史馆馆员。正在这时,我与萧乾在政协文化餐厅请一位文化人吃饭,入席前闲谈时向他透露S君可能来当馆员啊。他听后脸色由晴变阴,很不乐意,说他还年轻,职务不低了,是全国政协委员,又是××的特别顾问,再当个馆员有什么意思?他来了,馆里谁敢领导他?当天晚上,萧乾两次打电话给有关领导,表示此人不合“耆年硕学”的馆员标准,表示文史馆同仁不欢迎,不便接受。态度非常坚决。事后有关领导责怪我,为什么让萧乾知道?并说对S君的安排就是对中央领导人的态度!而我觉得办了件好事。一位副部长与我有同感,他说顶住好,一个人就是面旗帜,旗帜不好,集合不了力量,自己害了自己。

在当今中国社会为人不管如何方正,难免做些违心的事,萧乾也不例外。在90年代初期,他

连续三年推荐一位小姐任全国政协委员。这位小姐,只是摄影爱好者,并无其他专长,真是一位无名之辈。而萧老连年在推荐信上签字,因就他一个人签名,就算他个人推荐了。但也怪,每次把信寄出后再不过问。萧同我经常见面,他从不问起那小姐的事,似乎没有这件事一样。那几年我总猜不透此中奥妙,退休后,从一位朋友处找到了答案。原来萧是受人之托,他不敢也不便推脱,违心地推荐信上签字。他明白,这种人是不可能入选的,但自己的人情也做了。

在多年的交往中,感到萧乾身上有股难得的亲和力。他总是那样慈眉善目、平易近人,圆圆的脸上笑口常开,活像一尊弥勒佛,同他接触、交谈,是一种享受,享受温馨、享受智慧,享受同志朋友间的淳朴的爱意。大约是1992年,我去他府上拜年,看到走廊上牵了几条绳子,上面整整齐齐挂着五颜六色的贺年卡,可见他对友人的深情与尊重。在交谈中他没有高调,而他做的事、写的文章,充满着对国家、对人民、对生活的厚爱。他出生于一个贫寒的蒙古族家庭,当他来到这个世界时,父亲在贫病交加中逝世了。童年的萧乾放过羊,送过奶,织过地毯。1926年因参加共青团坐过牢,释放后,开始他“未带地图的旅人”的生涯。童年时代的悲惨经历,青年时代的漂泊生活,造就了他顽强、正直、敏感、忧郁的性格,也铸成了他崇尚平等、追求光明的精神。他说过,我不能保证一辈子不说错话,但我能保证一辈子不说假话。他以自己高尚的人格和丰厚的创作成果,赢得了党和政府的赞誉,受到人们的尊敬。

非常遗憾,在新世纪的门槛边上,他转身进入了极乐世界。1999年2月11日下午6时辞世。比他毕生崇拜、敬仰的冰心先走了半个月。■

(作者为中央统战部干部局原副局长)

(责任编辑 洪振快)

本刊公告

2009年简装合订本(上、下册)105元

2010年简装合订本(上、下册)105元

免费挂号邮寄,汇款地址见本刊目录页

文革前的《文史资料选辑》

○ 雷 戈

一、文革前的文史委员会

1959年,周恩来指示,要成立“收集历史资料的组”。很快在7月下旬设立了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来负责计划、组织和推动从清末到全国解放各个时期中各种历史资料的撰写和征集工作”。

第一届文史委员会的成员中,学者有顾颉刚、王伯祥、向达、翁独健;右派有罗隆基、浦熙修、章伯钧;民主名士有章士钊;被俘将领有郑洞国、覃异之、黄绍竑;前政权人士有翁文灏;清朝遗老有载涛;北洋高官有叶恭绰。其他人都是中共官员。往后历届中共官员的比例越来越大。

文史委主任范文澜工作忙,又要重写《中国通史简编》,“不能经常过问会务”,基本是个挂名不干事的主任。

文史委下面设有多个业务组。国民党军事组、国民党政治组、北洋组、文教组、东北组、西北军组等。

1963年,经胡乔木提议,由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组织社会历史调查,杨东莼主持此事,“制订了计划,并购置图书资料和办公用具,地址在中华书局”。受杨东莼器重和培养的华中师院青年讲师章开沅也来京搜集资料。社会历史调查计划分为几个专题小组,杨东莼直接参加知识分子问题小组,这个小组成员还有李侃,章开沅分在社会经济小组。“但不久就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思想指导下,展开了‘四清’运动,而这个社会历史调查也就无疾而终。”(李侃:《文史资料工作杂忆》,《文史通讯》1994年第1期)

1964年,“全国妇联成立编写妇运史专门机构”。这是全国第一个编写专史的专门机构。

溥仪特赦之后,“曾一度有人提出把他安排在中华书局”。后来还是做了文史专员。文史委曾

为溥仪《我的前半生》修订稿“开了几次座谈会,要大家提意见”。尽管《我的前半生》差不多近乎自虐式的“交代一件罪恶就打自己一个嘴巴”,连周恩来都有些过意不去,觉得“书里自我批评太多了”,但人们依然指责溥仪在书中“‘美化自己’、表面‘忏悔’、‘认罪’之词太多,真实情况仍然写得不够之类”。

文革前军事政治组“每周召集组会一次,有时两次,主要讨论审稿问题”。

二、文革前的文史编辑

文史编辑基本有两个序列。一个序列是以《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为主文史委员会人员,一个序列是以文史专员为主文史人员。两个序列各有侧重和分工。编辑部自然是专职编辑,重点负责文字和观点;专员算是兼职编辑,重点把关史实。

(一)编辑部的人员构成比较复杂。除了中共人员外,其他人员“有的是旧时的军政官员和爱国人士,如王式九、王述曾、王毓超等;有的是著名报人和记者,如万枚子、彭子冈、浦熙修;还有蔡松坡将军的哲嗣蔡端先生”。这里面有右派,也有摘帽右派。比如,王述曾建国后就在政协工作,被划为右派,留在原单位。原《大公报》女记者彭子冈、浦熙修,还有老报人万枚子,原是国务院参事,都被打成右派,后都到文史委员会工作。他们编稿,也写稿。用浦熙修的话说,“新闻记者当不成了,就安心当旧闻记者吧”。1961年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中署名乐松生的《北京同仁堂的回顾与展望》一文,“就是浦熙修写的最后一篇文章”。从《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开始,所有稿件的选用和审定都由文史委员会副主任申伯纯和另外几位领导负责。“选定后的文字加工、编

辑、校对、出版工作,主要由王述曾、万枚子、浦熙修等几位‘右派’承担。”特别是王述曾,从《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开始,“就是责任编辑,而且经常帮申起草文件或撰写文章”。另外,1961年,为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出版的《辛亥革命回忆录》,6大本、200多万字,也都由王述曾“承担主要的文字编辑加工的任务”。据有的右派编辑说,“我们思想上唯恐自己更‘右’了,力求‘左’得可爱些,借以证明我们这些‘右派’立场是很革命的。”(曹湘渠:《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初建阶段的回忆》,全国文史委编《周恩来同志倡导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四十年纪念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右派记者不能写新闻,只能编史料,这种恶意惩罚造成的精神压抑难以为外人道。他们平时大都埋头工作,“沉默寡言,别人可以理解他们的处境和心情,但是却无法承担他们的内心隐痛”。浦熙修虽作为第一批“确实已改造好的右派分子”之一,摘掉了右派帽子,在文史资料委员会担任文化教育组副组长,但政治惶恐与精神压力丝毫未见减轻。她每天记日记,并曾上书周恩来,“请严格审查其一生”。

(二)文史专员或文史委员是专职的史料写作者。他们以文史工作为职业,“而且他们本身就是历史人物,有前清的,有伪满的,有民国的”。许多人“在解放战争中被俘”,经过改造受到政府特赦并被安排在文史委员会任职,其中不乏“指挥过千军万马的高级将领”。根据周恩来的提议,为安置特赦战犯,成立了文史专员室。^{注1}文史专员政治待遇与国务院参事相同,月工资100元。周恩来亲自安排杜聿明等人作为第一批文史专员。1961年3月1日下午,杜聿明、宋希濂、溥仪、王耀武、杨伯涛、郑庭笈、周振强带着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专员任命书”,正式上班。“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室从此正式成立,行政建制隶属政协,业务上受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指导。”此后每批特赦人员除自愿到外地者外,留京者大都被安排为文史专员。最初四批特赦战犯中共有21人被安排为文史专员。^{注2}第一批7人:溥仪、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杨伯涛、郑庭笈、周振强;第二批7人:溥杰、范汉杰、罗历戎、李以勳、董益三、沈醉、李佩青;第三批4人:廖耀湘、杜建时、康泽、方靖;^{注3}第四批2人:黄维、文强。与第四批同时安

排为专员的还有1949年12月在四川巴中县率部起义但在“解放后被错误关押”的原国民党第四兵团中将司令兼第127军军长赵子立。专员室由专员们选出组长若干人,“负责业务、学习、生活方面的自我管理”。

文史专员每天坐班。文史专员第一天上班时都带着“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的任命书”。他们根据各自经历,“先后分别参加北洋组、军事组、政治组和社会组,以军事组人数为最多”。其任务,一是撰写“三亲”史料;二是征集史料;三是审阅来稿;四是参与编辑出版文史书刊。^{注4}“几乎所有的文史专员都对这项工作非常满意。”他们既有撰写稿件的热情,又有审改稿件的自觉,“成为文史资料工作中一支重要力量”。王耀武一面写史料,一面审核评选各省寄来的史稿。他写的史料,有20万字左右;审核的稿件,“当在百万字以上”。廖耀湘撰写史料10多万言,审核史料不下“百余万字”。文史专员编稿的一般程序是,由文史办公室“将有关他们本人经历过这段历史的稿件,分配给他们审阅”。经溥仪审阅过的稿件就多达“数百万字”。至于撰写史料,许多文史专员更是“达到了勤奋的程度。少者写了十来万字,多者百万字,甚至数百万字”。某些资料可以视为“某一领域有代表性的典型材料”。有的人不光自己写,还帮别人写。比如,沈醉帮唐生明写《我奉命参加汪伪政权的经过》,帮洪范写《我所知道的杜月笙》等。对文史专员来说,尽管周恩来曾保证,“不要有顾虑,过去没有交代的,现在写出来,也等于补充交代,政府不会追究;同时也不要害怕,不要避讳,知道什么就写什么。”虽然他们对文史资料工作方针也反复学习和揣摩,“但对于如何写自己却仍不免存在思想顾虑。”这顾虑包括别人写自己和自己写自己。尽管对于那些“专做征集工作”的文史专员来说,这种顾虑或许会小些。总体而言,相对于其他文史人员,文史专员与周恩来的关系倒是最为密切。周恩来曾三次接见文史专员,“了解情况,遇到困难,及时解决”。

三、《文史资料选辑》在文革前的编辑与出版

《文史资料选辑》是资料性的内部刊物。编辑

部由主持文史委的常务副主任申伯纯负责,同时,文史委副主任杨东莼、办公室主任米暂沅,还有文史委委员阎宝航,也都是《文史资料选辑》的主要负责人员。另外,范文澜派近代史所的副研究员姜克夫也来参加《文史资料选辑》的编辑审稿工作。

早期的《文史资料选辑》选登的多是一些“重头长篇”。并且,“一般不设栏目,只是按一定顺序把选好的文稿排列起来。所谓‘一定顺序’,有时是按史料的内容排列,有时是按史料所记事件发生时间的先后排列,有时是按作者的身份地位排列,有时又是把几种因素综合起来考虑。”

60年代初,“一个月最多可以收到1000多份好的稿子”。文史委员会“每周召集一次委员会讨论,集体审稿,一方面认真学习全国政协的有关文件,研究如何提高工作效率,进一步搞好文史资料的征集、编辑工作;另一方面,对稿件充分发表各自的审读意见,评判优劣,提出具体处理意见。最后,在大家认识一致的基础上,将质量最好的稿件,经修改后全部抄送至全国政协文史办公室。”

对于重要稿件的取舍,大都经过政协副主席和文史委有关负责人讨论决定。“在文字上也很注意加工修饰。”文史资料委员会在开展工作的之初,为了提高人们撰写史料的积极性,“不仅对于可以入选的来稿及时核发稿酬,即使内容无甚可取的来稿也从不退还,而是酌给少量笔墨费,以资鼓励”。当时规定,只有经全国《文史资料选辑》刊用的稿子才有稿酬。

《文史资料选辑》“在几经研究磋商之后,决定交由中华书局出版”。这是因为,第一,当时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主任是范文澜,范又是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中华书局总编辑金灿然在延安时期就协助范编撰《中国通史简编》,是范的得力助手。同时,金灿然还是近代史所的学术委员。那时,文化部又将中华书局定位于“以整理出版古籍和文、史、哲学学术著作作为主要任务的专业出版社”。因而中华书局“与国内学术界特别是历史学界有着相当广泛的联系。而《文史资料选辑》的内容又属于近现代史的范围,由中华书局出版,可算顺理成章”。第二,当时直接领导古籍整理工作的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文化部副

部长齐燕铭,“既与全国政协有很深的历史渊源,又与金灿然关系密切,中华书局凡有重大问题,金灿然无不向齐燕铭请教商量,出版《文史资料选辑》,肯定是得到齐燕铭的同意和支持的”。据李侃回忆,他当时是中华书局近代史组的负责人,金灿然把出版《文史资料选辑》的任务交给近代史组,并指定他与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办公室保持经常的业务联系。从此,他就开始涉足于政协文史资料工作,从1960年初创刊到1966年文革之前,“中华书局共出版《文史资料选辑》50辑,还有政协为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所编的《辛亥革命回忆录》6册。”(李侃:《文史资料工作杂忆》,《文史通讯》1994年第1期)

《文史资料选辑》创刊之际,正是三年大饥荒之时。“因为副食品奇缺,连摇笔杆的文人也感到每月定量的粮食不够吃,然而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及其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却都依然在紧张而认真地工作。每年规定出8辑的任务,基本上能够按期完成。”根据某些当事人的回忆,“讨论问题时,大家仍然是无拘无束、畅所欲言,暇时聊天,也有说有笑。这种和谐的、活跃的氛围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物质生活困难的压力,而且也可以看出他们的精神状态是如何的充实。”

四、《文史资料选辑》在文革前的发行与阅读

文革前,《文史资料选辑》的发行渠道受到严格的行政控制。一切按级别来。一是按级别配发。一般配发到省一级。比如,《文史资料选辑》分配给新疆50套,“发给党政领导参阅”。新疆文史委也分到2套。另外,省直党委宣传部、省委党校图书馆一般也都有《文史资料选辑》。一是按级别购买。地市级和县团级的行政机关可以购买。规定凭借“县级以上领导机关的公函办理订阅手续”。至于个人,“限行政18级以上干部才能配售”。

显然,这一时期,《文史资料选辑》发行和阅读范围基本限于内部,“除了政协委员和科研、教学人员可以凭卡购买外,党政军部门一般限定在厅局地师以上范围传阅。还有少数尚存争议和比较敏感的资料,当时刊印了一种大开本的白皮书,专供中央和省军以上领导干部参阅。”只是这

种 16 开本的大字白皮书数量很少。

一方面,《文史资料选辑》作为内部读物,“读者对象多是有较高级别的干部”。另一方面,那时《文史资料选辑》“选登的多是一些重头长篇,文稿的标题本身就很引人”。难怪有的中学生都要偷看《文史资料选辑》。一记者教训儿子说,这些内部资料“里面尽是一些大资本家、大战犯、大特务写的东西,你们辨别能力差,看了会中毒”。此类恐吓,其实只会吊足人们窥探知识禁果的胃口。再加上,“买文史资料要凭卡,神秘得很”。值得注意的是,“神秘”一词在文史资料回忆者口中频频出现。“读者有神秘感,上门求购者络绎不绝。”显然,经过官方的精心设计,围绕《文史资料选辑》,已构建了意识形态主导下的一整套连贯的知识分类和知识分配体系。文史资料所代表的历史知识必须被严密纳入官方知识分配体系。

“文史资料”作为一种珍奇秘闻,具有某种信息的隐秘性,甚至具有某种特殊的新闻的保密性。这使得官方必须把它作为一种稀缺资源严格控制和分配。按照当年的标准,《文史资料选辑》里面刊登的东西还是多少有些超出官方对大众的一般宣传尺度,比如,对历史事件或人物的某些无关宏旨的习惯提法和表述,不经意地透露出来的历史内幕的某些细节,特别是众多作者的特殊身份等等,这些可能都是官方不想让普通民众了解和知晓的。尽管这些内容对官方毫无损害,但既然官方不希望民众知道,就必须加以限制。一旦限制,就会造成某种秘密。一旦成为秘密,就更有必要限制,于是秘密就更为神秘。

按照当时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的定位,《文史资料选辑》“不是面向广大群众的公开刊物,因此发行面不宜过宽”。最初,《文史资料选辑》每辑“限量印行 8000 册”。虽然是内部发行,但它和所有那些所谓的“内部发行”书籍一样,因政治限制和行政管控而身价倍增,特殊的神秘性使其天然拥有众多的读者群。供不应求^{注 5},且持续升温。“不断有机关和个人要求订阅。”“连科技和体育学校也说是‘学习需要’希望订阅或分期付款。当时,文史办公室副主任张述孔每天要花费许多时间和口舌来对付这些登门求索的贵宾。”爱屋及乌的连锁效应是“地方文史资料也备受青睐”。

《文史资料选辑》之所以受到读者欢迎,“主要原因是通过这个刊物可以了解到在一般书刊中所了解不到的历史事实和社会历史知识”。通常情况都是,“一个人买了大家传看”。说人们争相传阅并不为过。更有甚者则是废寝忘食。一位文史官员回忆,1961 年春,他调到中宣部,“有机会找齐了已经出版的全部《文史资料选辑》,喜出望外,用几个晚上的时间差不多通读了一遍。”(范康:《略记七届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的工作》,全国文史委编:《周恩来同志倡导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四十年纪念集》,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9 年版)《文史资料选辑》所具有的某种传奇性或野史性甚至到了文革期间依然魅力不减。那些“把《选辑》诬称为‘大毒草’的造反派”,也在“津津有味地逐册逐篇看”这些被他们抄去的“毒草”。造反派一方面指责收藏文史资料的人“为什么不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而是喜欢看文史资料”,一方面又把文史资料全部拿走,“轮流传阅”。红卫兵也是如法炮制,留下《文史资料选辑》“偷偷传阅”。在一些下乡插队时的知青点,《文史资料选辑》也成了“最抢手的书”。就连一些地位很高的科学家也在乱里偷闲地阅读《文史资料选辑》(这些学界名流自然有资格购买《文史资料选辑》,但也有可能是官方配发给他们的)。竺可桢 1968 年看过梅汝璈《关于谷寿夫、松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杀事件》一文后,还对他 1937 年 12 月的日记作了新的补充。(刘燕军:《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1937—1985)》,《抗日战争研究》2009 年第 4 期)

《文史资料选辑》开始问世的时候,“读者主要是统一战线内部的上层人士和党政部门的领导人,这个面是很小的,所刊登的史料,多半是晚清和北洋政府时期的‘前朝旧事’。因此在人们的心目当中,便构成了文史资料是仅供怀旧的‘老人读物’的印象。”

五、《文史资料选辑》的示范效应

编印《文史资料选辑》的主要目的,“是编选一部分质量较高的史料稿件,作为示范,以启发、引导各方面掌握史料的人士撰写史料,推动征集工作的深入开展。”这样,按照《文史资料选辑》的创设思路,很大程度上那些《文史资料选辑》的读

者都是将来撰写史料的潜在作者。文史高官期待《文史资料选辑》能成为特定作者们撰写史料的范本。

这样,《文史资料选辑》的出版对于全国范围内的史料征集和撰写便具有非同小可的示范和导向作用。而且这种作用被越来越自觉强化。1963年的《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总结》指出要“加强《文史资料选辑》的示范作用”。因为它对“推动工作的开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会议号召“今后应该努力提高这个刊物的质量,以充分发挥其对各方面人士撰写史料的鼓舞示范作用,为深入组稿创造有利条件。各地方除了继续支持政协全委会的《选辑》外,各地方自己编印的资料刊物也应密切配合组稿工作。”

显而易见,《文史资料选辑》的示范效应的实质在于为人们制造出一种标准化和格式化甚至公文化的史料书写模式。这种模式的形成具有互动性。从全国文史委角度看,“选辑的出版使我们同全国各地政协组织以及其他文史工作部门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并且在全国范围内起着介绍情况、交流经验和推动工作的作用。选辑的出版也使我们同撰写史料的各方面人士保持了联系,以具体的范例来向他们指出了撰稿的要求和方法——应该写什么和怎样写,从而对于不断扩大稿源和提高稿件质量具有促进的作用。”(《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一年的工作报告》,《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从地方文史机构角度看,《文史资料选辑》的典型示范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据云南文史机构介绍,他们将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给那些经历较多的人士传阅,“以启发他们撰写的方向和方法。”桂林市文史机构也说,他们将订购的一批《文史资料选辑》分发给有关人士阅看,“这对启发他们如何写好文史资料很有帮助。”

在某种意义上,似乎可以说,《文史资料选辑》几乎改变了传统性质的史料定义和学术意义的史料文本。它使史料成为一种文章,一种表态,一种检讨,一种攻讦,一种抒情。怪异的是,在工作开始和工作过程中,各级党委负责人“一再把撰写历史资料的目的要求向大家说明,要求大家是写资料,不是写历史;是写资料,不是作文章,更不是写书”。(《政协广西僮族自治区委员会关于文史资料征集工作的初步总结》,《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

但这种主观要求和客观效果之间的悖论只是一种幻觉。因为,文史资料的指导思想、编纂原则和体例规定,都决定了它必然将史料写成一种特殊的历史和政论。而这种特性恰恰强化了《文史资料选辑》天然具有的广泛示范作用。就其本质而言,尽管《文史资料选辑》给人们提供了一种历史的新写法,但并没有展示出历史的另一面。因为,它只是与正史匹配的官方野史。

但官方野史的底盘毕竟要大得多。它降低了进入历史的门槛。这样,被正史排斥的人们便有可能通过这一渠道进入历史。尽管极度扭曲,但它毕竟唤醒了人们的部分历史记忆。通过阅读、学习和模仿《文史资料选辑》,人们开始尝试着用一种疏离而不悖逆的方式来对自己的历史小心翼翼地重新叙述和谨慎定位,以便获得官方历史谱系的认同和接纳。《文史资料选辑》凭借强大的官方权力,把自己打造成一架强悍的超级抽水机,从全国各地搜寻稿源和吸纳稿件。不管自己有没有史料刊物,向全国《文史资料选辑》供稿都成为第一要务。至于那些自己没有办史料刊物的地方文史机构,向全国《文史资料选辑》供稿更是当务之急。在这个过程中,地方文史机构与《文史资料选辑》的关系自然变得越发紧密。

据河北省暨天津市文史委介绍,它们向全国政协提供的许多重点稿件,经过全国文史委审核后,提出具体修改意见,发还回来重新改写或补充,这不但能提高稿件的质量,而且也帮助了他们做好组稿、审稿和培养写家的的工作。该会成员阎子奉原是阎锡山的亲信,经文史官员动员,他花了很长时间,写成《阎锡山四十年的经济活动》史料4万余字,“内容相当丰富”。此稿经全国政协审核,“指出稿内将阎锡山家族企业活动同官僚资本以及阎锡山的政治活动糅在一起,眉目不清,主题不够明确。”希望文史委为阎子奉配备一位写家,帮助他“分成三个题目重新整理”。河北暨天津文史委依照此法操作。整理好的《阎锡山家族经营的企业》一稿后来刊登在《文史资料选辑》第49辑。

但就整体而言,按照后来者的评价,前50辑《文史资料选辑》的不足或缺陷,“就是多样性还不够。”■

(本文注释见第84页)

从历史实践看民主与专制的关系

○ 施京吾

自《炎黄春秋》2009年第9期发表邵建《民主与专制的百年迷途》以来,计有4篇文章对民主与专制关系问题进行了探讨。其中尤其是许良英、王来棣两位老人的大作《评“专制的对立面”之争》(2010年第12期),有着更深邃的思考,表达也更为全面,耄耋之年依然关心中国的民主事业,十分令人感佩。

民主制作为人类社会的重要政治制度,不仅存在于理论中,也存在于历史中;不仅要进行理论的表达,也要进行历史的表达。理论,既要能够阐释理论,还要能够解释历史。因此,对民主与专制的关系仍有必要进行仔细辨析。

本文主要介绍现代民主制在理论与实践中的历史演变,希望通过小文对民主与专制关系问题能有基本廓清,并请方家指正。

一、“民主”果真没有“问题”吗

许良英先生文章中指出了卢梭“公意”理论的缺陷,却无法解释为什么会法国人在大革命中的集体狂热。卢梭对法国大革命、对拿破仑的意义极为重大,他是大革命精神导师,罗伯斯庇尔将他请进了贤人祠,拿破仑则到他墓前拜谒。如果认定民主的对立面就是专制,那么如何解释雅各宾专制的蔓延?当三级会议变成“国民公会”的时候,议会代表全部来自第三等级,他们可是地地道道的“人民”(有少部分议员是宣布脱离第一、二等级,加入第三等级而进入国民公会的),大革命走向暴力无不是“民意”在起作用。同时也无法解释拿破仑专制,他不论成为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终身执政还是第一帝国皇帝,都是法国人一票一票选出来的(参见拙作:《拿破仑的失败与专制之痛》,载《炎黄春秋》2007年第8期),不能说这是他们欺世盗名、蛊惑人心的结果,那不符合历史

实际。20世纪德国希特勒极权统治同样具有强大民意基础,希特勒政权是一个独裁政权,但他的政权却合法地来源于魏玛政权,魏玛共和国是民主政体。希特勒被兴登堡总统任命为总理完全符合德国宪法程序——而魏玛宪法竟然是那个时代最具民主色彩的宪法。为什么最民主的宪法却能产生希特勒这样的政治怪胎?德国人民为什么会在国家意识和种族选择面前彻底丧失理性?

上述事件,对整个人类社会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甚至改变了人类社会进程,毫无疑问都是“民主制”的结果,以至后人反思这些历史时,对“民主”进行了异常尖锐的抨击。

法国政治评论家勒鲁瓦-博利厄说:“如果不是以自由之名加以克服,民主会成为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愚昧的专制。除了以自由方式解决问题,民主所能提供的只是两种专制间的选择,而且两者同样压倒一切,羞辱人心:民众的暴政,这就是国家与公社(指巴黎公社——笔者注)的暴政,通过至高无上的议会表现出来;或者是独裁的暴政,一个民事的或军事的主子,体现着人民的力量。”博利厄是专制主义者吗?他是自由主义者。

可见,“民主制”在历史上确实造成过严重后果,我们不能一厢情愿地认为,民主的历史与现实都是不容置喙的“好东西”,否则,宪政理论家们对“民主”的大量批判,岂不成了捕风捉影?

比较而言,邵建与周拓文章更接近现代宪政理论,但也存在因果关系不明、理路不清和表达不确的问题,会给读者产生一些错觉,需加以澄清。

二、现代民主制产生的“国家”背景

许良英先生文章已详述民主政体的渊源,这里仅谈近现代民主制的起源与实践。“民主”这个

词的含义即“多数人统治”。它是古希腊罗马时代的政治基础,与后来欧洲国家组织形式已大不一样。

英法百年战争之后,现代国家基本形态出现,关于国家治理的方式和理论有了根本性变化,但王权力量在各个国家表现并不一致。到17、18世纪,法国王权力量最为强大,是专制性最突出的国家(参见拙作《辩护与批判——法兰西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载《书屋》2004年第6期,对法国革命前的社会状况有着全面但不详细的介绍);英国王权则在与贵族斗争中节节败退,“光荣革命”后成为立宪国家,德意志从来没有形成由一个统一王权主导的“国家”,在17世纪最高峰时,德意志内部曾分裂为多达314个邦和1475个独立骑士领地,为后来狂热的国家迷信提供了历史理由。

现代民主制的理论兴起是以“国家”为依托的,它紧密依附于近代国家形态,没有近代“国家”,民主制就无法展现其现代意义。国家权力具有多重性和复杂性,民主制演变也具有相当的复杂性。

现代民主制的实践首先在法国,因大革命而传播欧洲,渐次世界,却因各国发展不同表现大不一样,其变革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越变越复杂,而且还存在由欧洲西部向东部“民主制”被不断扭曲、专制性越来越严重的现象。

既然民主是指“多数人统治”,与之对应的自然是“少数人统治”。在法国大革命前欧洲国家中的“少数人统治”有着明确的政治环境——君主制。近代民主制起源与君主制息息相关。

三、民主制是为解决什么问题而产生的

“君主制”的政治学意义是关于国体的问题。欧洲君主制国家中,国家主权从属君主,它来源于基督教兴起后的“君权神授”,是政教合一的产物,君主是上帝在世俗国家的代理人。欧洲的封建时代,君主登基有一个比较严格的加冕仪式,特别是一些比较重要的国家,罗马教皇要亲自参加加冕仪式,并给国王戴上王冠。仪式的作用就为表明君权来源于上帝的恩赐,国王代表的是上帝的威权,“国家”是国王的私人领地,所以路易

十四直接宣称“朕即国家”。君主对国家主权具有支配作用。

经过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世俗力量得到普遍加强,基督教势力开始衰落。在法国,教会沦为陪衬,贵族又被王室收买,对领地统治力大大下降。路易十四时代,王权专制达到最高峰。与此同步,是人的自我意识苏醒,“君权神授”受到普遍怀疑。到启蒙运动时期,“君权神授”政治理念已经动摇。

英国思想家洛克在《政府论》上篇中详细论证了“君权神授”的荒谬性,以人民主权理论(更早的霍布斯也提出了这一概念)推翻了“君权神授”理论——人民主权,是指国家主权从“少数人”——君主转移到“多数人”——人民的过程。“主权在民”即“多数人统治”的开始,同时又使人民获得“平等”地位。洛克在《政府论》下篇阐述了人民主权下的政府形式。有意思的是,许多读者只读下篇而不读上篇,也即,只关心政府的组成形式,而不关心为什么会是这样。

洛克的“平等理论”来源于基督教“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教义。不过,其政府理论的基础是基于财产权的代议制政府,这既与当时欧洲等级制度有关,也与英国实际政治格局有关。因而《政府论》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民主制著作。

卢梭接过人民主权的概念,并大大加以深化。他摒弃了“平等”的神学意义,转而以“天赋人权”概念为基础,指出人民的权利不需要得到任何人授予,是天赋权利(“人是生而自由的”),人民主权是符合自然法的一个根本规则,他通过《社会契约论》(又叫《政治权利的原理》),阐述了人与人之间、人与国家之间的契约关系。既然叫“原理”,讨论的就是人民在国家中到底拥有什么样的权利、为何拥有和如何拥有的问题,这是关于民权的根本问题。“人民主权”理论由此成为民主制的理论。

在《社会契约论》中,卢梭预设了一个绝对正义的概念——“公意”。其大致意思是,由人民意愿结成的公意是最高法则,一旦形成最高公意,人民则将自己的自然权利完全交给公意(“主权者”),人民从自然人变成“公民”,由“公意”实施人民意愿。公意的代表人叫“主权者”,由公民通过选举产生,如果主权者违反了全体人民意愿、

剥夺了人民的自由,那么人民有权通过暴力革命推翻它,并重新获得自由。

因此,民主制的对立面当然地是君主制,是直接针对君主制的反动,它的基础是“国家”,针对的是“君权神授”的实际状况,“选举”是实现民主的手段,选票是“人民主权”的象征,同时还具有“平等”的内在诉求,人民以公民身份成为平等的人。洛克和卢梭的思想在人类思想史、政治史上具有重大革命性和进步意义。尤其卢梭基于民主制的人民主权,对漫长的欧洲封建社会构成巨大冲击,有着极强鼓动性。

到这里已经形成比较完整的制度性民主,有人民意愿结成的最高“公意”、有公民、有选举、人民有推翻主权者的权力。国家主权不再由君主支配,而由全体人民支配,平等由此得到体现。

这,不是已经很好了吗?

四、为什么民主会导致专制

君主制下,由君主个人支配国家权力的时候容易导致专制,这是比较容易理解的,许多思想家因此直接将君主制与专制画上等号。如果君主制与专制具有同等意义,那么,民主制的对立面是专制也应该是成立的。可对立的东西是怎么以因果律呈现的呢(民主是因,专制是果)?这一点令人比较难于理解也难以接受。

君主制与专制之间的关系是种或然性关系,即,它可能专制,也可能不专制,特别是由于欧洲封建制度的自由契约关系,欧洲王权远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强大(这需要通过欧洲史和国家内部结构才能了解,这里仅表明存在这样的现象)。在或然性关系中无法建立一个肯定型(必然性的)的模型,所以,民主与专制的绝对对立性并不成立。但不论君主制专制与否,主权在君却是肯定的。

那么,主权到底是什么?

不论洛克还是卢梭都把主权指向立法权,它有权制定国家法律法规和决定国家性质。人民主权意味着人民具有制定不损害自己权利和利益的法律,也有权决定选择自己喜欢的政治制度。现代国家中,具有制定法律功能的权力机构只有议会,议会具体的“主权者”。

“主权者”依据什么行使自己的职能?卢梭把

这个任务交给了“公意”。卢梭的“公意”是绝对命题,“是永远公正的,而且永远以公共利益为依归”,这样,主权者不仅成为立法者,同时还具有了无限性特征。

此时法国是个拥有约2500万人口的欧洲大国,直接民主已很难实施。但卢梭的主权是一种结合在“公意”中的绝对权力,“为了很好地表达公意,最重要的是国家之内不能有派系存在,并且每个公民只能是表示自己的意见”。在议会中,卢梭既反对党派政治,又反对代议制,他的公意不仅不能被代替行使,也不受任何约束。一个既不能“代议”,又不接受制约的民主制,和专制的距离还有多远呢?

“公意”本身是抽象的,是一种“道德理想”,它是康德所说的那种“纯粹理性”,必须通过实践理性的检验。“公意”所表达的最高的“善”,是“人”的意向的最高综合,它与上帝是最高的“善”有着重大区别,上帝的“善”是彼岸的,它不可验证、不容验证、也不必验证,但人却是此岸的、世俗的。虽然卢梭口口声声认为公意“不可摧毁”,事实却是他自己创造并自命的一个“概念”。在这种状况下,谁能保证“公意”的绝对正义性?保证其不被歪曲和利用?

实际上,卢梭并非没有意识到直接民主在法国的现实困境,但他的眼光不是向前,而是向后——“民主制”随同他的眼光一起回到两千多年前的雅典。所以伏尔泰讽刺到:卢梭将把人类带回丛林里——雅典的民主制,不论是手段还是路径,都不再适应现代国家的治理,国家体系、社会结构、经济方式与雅典时代已完全不同,两千多年前的制度怎么能在现代国家中有效实施呢?它必须要加以重大改造。

能够实行对国家和社会的管理职能的不是抽象的“主权”而是具体的人或组织。“人民主权”的政治实践存在着巨大障碍,既然都是“人民”,那么到底该由谁来行使主权?虽然选举产生了一个“主权者”,但它毕竟是具体的个人或者组织,当他们独占全部民意、以民意为基础行使权力时,则具有更大潜在危害性——这与选举产生一个君主几乎没有任何区别。如果这位被选举出来的“主权者”,依然集立法权、行政权甚至司法权于一身,难道这不是一位“民主帝王”吗?纳粹思

想家卡尔·施密特就认为由“公民表决的独裁”是合法的。这样的“民主帝王”正是“人民”选举出来的,是公意的表达,一旦他借助民意实行独裁统治,结果就是专制。这种情形下,“人民”更要为自己的政治选择负责。

民主制导致专制的可能性不能被排除。

五、“民主制”的实践结果是怎样的

法国大革命正是对卢梭“民主制”的忠实实践,结果大大出乎意料:从最初的三级会议变成国民公会,再变成山岳派,再变成雅各宾党,再变成公安委员会,被裹挟到革命洪流中的“人民”越来越多,“主权者”却越来越少,最后权力落到了罗伯斯庇尔、圣鞠斯特等个别人手中,直至大屠杀产生。

大革命使“多数人暴政”问题立刻成为一个现实问题。按卢梭理论,以罗伯斯庇尔为首的雅各宾党代表着“多数人”形成的“公意”,它由不得少数人指手画脚,个人权利在“被代表”中抽象成“公意”并消失在“公意”中。“公意”中从来没有为个人权利预留任何位置。如果我们无条件地相信“人民意愿”,这和卢梭不是没有任何区别吗?

民主制能直接带来“多数人暴政”的另一个现实原因是,欧洲社会是等级社会,贵族和教士都不属于“人民”,是被排除在“人民”之外并与人民对立的阶级,这些少数人一旦有了反对意见立刻变成与多数人的对抗,而多数人则可以根据“民意”对他们实施从精神到肉体乃至生命的迫害。这样,“多数人暴政”不仅成为逻辑结果,也成为现实结果。没有多数人统治,何来“多数人暴政”?这是大屠杀产生的内在依据。可这个世界上永远都有“少数人”、有利益的对立和冲突以及思想的异端存在——他们是不是也应该被消灭?

从雅各宾专政、拿破仑统治直至希特勒极权,他们的政权相当程度上都是通过民主制选举产生的,都拥有“民意”基础。尽管这些暴力统治最终被推翻,但付出的代价异常惊人。

法国大革命作为民主制的第一次实践,就彻底展现了它的历史局限性。

但我们别忙责备和否定“民主制”。从“民主制”的现代起源我们认识到,出现如此令人震惊

的后果原因在于:君主制是主权问题,其专制性是或然性问题,因而民主相对专制也只能产生或然性结果,它自身的无限性特征却反而暴露其专制性,拥有选票同样也能选出一个暴君。

六、专制的对立面是什么

国家权力除关于国体的“主权”外,表达国家权力的还有另外一个重要“权力”,这就是治权,它是一个具体权力,直接应用于国家管理和社会组织。

我们经常使用这样一个词:“统治”。它包括了两种权力,一种叫“统权”,一种叫“治权”,统权是关于国体的权力,它可以制定法律、选择制度;治权是行政权,是依据制度和法律对国家进行治理(即法治)的权力。统权是治权的基础,治权是统权的表达。启蒙运动的伟大意义在于,它从多方面对现代国家权力进行了构建。

我们再看“专制”这个词。专制是对权力特性的描述而非归属关系的表达,所谓“专”,有集中、统一、整体性的意思(极权制更有“绝对性”的意思,因此,凡提到权力绝对性多半是极权的),与其对应的词则是“分”、“散”,因此,专制的对应词是“分治”,即对权力的分散和制衡。

19世纪30年代,法国政治家和历史学家梯也尔兴高采烈地宣布,他发现了英国治理的“秘密”:首要者不承担责任,次要者承担责任,说英国国王原来是“统而不治”的。这在英国早就不是什么秘密。梯也尔的意思却表明,分权治理才是解决专制问题的根本出路。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提出分权与制衡正是基于英国治理经验,尽管英国同样为君主国,他却不认为英国是“专制国家”,原因就是分权体制的存在。分权的意义在于给权力划定边界,它们相互作用也相互制约。权力一旦有了边界,专制便自动瓦解。

解决了“专制”问题的英国还不能成为一个“民主国家”。三权分立来源于英国古典自由主义传统,古典自由主义的本质是一种等级自由主义,“自由”是一种不可相互僭越的等级权力,虽然主权——即立法权归议会所有,但选票只掌握在少数贵族手中,英国贵族能够制衡国王、分享

权力,既因为他们处于相同等级,也是相互间力量的均衡结果,是通过与王室多次较量获得的。1688年“光荣革命”后,詹姆斯二世开始虚君统治,议会也走上政党政治道路,1721年出现英国历史上第一位议会选举的内阁首相。法国则过早失去这种平衡。

随着英国资产阶级力量不断壮大,选举权也渐渐扩大。不过,英国人民既没有获得统权也没有获得治权,也就没有取得在国家中的应有地位,被剥削、被压迫同样是个现实问题。特别是近代工业兴起,资本的原始积累造成英国工厂主对工人阶级空前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当然对这一问题也存在不同的看法和见解)。早期空想社会主义名著如《乌托邦》、《大洋国》、《乌有乡消息》等,主要来自英国,比较实在地反映了英国社会下层的企盼。因此,“民主制”对一个国家的政治现代化依然有着重大、并且是根本性的意义。

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统治对整个欧洲产生巨大冲击,英国王权的加速下移正是目睹大革命造成的严重后果,他们意识到,即便“三权分立”也必须要把主权扩大到全体人民。维多利亚女王统治时期实现了彻底的虚君制:王权既不制定法律也不参与治理。而法国在大革命近百年后才真正解决分权问题,所以出现许良英先生文章中例举的拿破仑三世的统治并不奇怪。

“民主制”对现代民主产生具有深远影响,它不能被草率地斥之为“坏东西”。

七、现代国家的宪政治理

进入19世纪后,思想理论家们对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民主、自由理论进行大量反思和检讨,其成果汗牛充栋。但这是一种缓慢而艰难的嬗变。现代宪政理论的提出,并没有得到具体落实,也就无法阻止20世纪斯大林专制和希特勒极权统治的出现,他们操纵民主,玩弄自由,给人类文明带来空前灾难。

宽泛地说,现代民主制度是卢梭民主理论和孟德斯鸠分权理论的综合产物(特别有意思的是,洛克《政府论》上篇引出卢梭“民主制”,下篇则引出孟德斯鸠分权治理,但洛克理论远没有后两者明确,这也证实许良英先生所指出的,启蒙

运动是对洛克思想的发扬)。人民主权使人民能够通过选票获得自己人权保障,对由“人民主权”结成的各种国家权力进行严格限制,以保证个人自由不被公权侵犯。同时,还要建立各种确保民主与自由的保证类型对权力进行监督。法国政治理论家贡斯当在《立宪主义政治的历程》一书中指出:“个人独立生活的开始,就意味着主权控制范围的终止。”

一个怎样的国家才是现代性国家?它以宪政民主取代直接民主,以自由民权为根基,以宪政为框架,以法治为平准器,以巨大的多样性和利益差异进行制衡,它限制民意代表乃至最高首长的个人情趣和偏好,用自由保护少数人的合法利益,防止绝对多数的出现,以防“多数人暴政”的可能。人民由此享受充分自由。贡斯当在《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一书中写到,现代民主与自由对每个人而言“只受法律制约、而不因某个人或者若干个人的专断意志受到某种方式的逮捕、拘禁、处死或虐待的权利,它是每个人表达意见、选择并从事某一职业、迁徙和结社的权利。最后,它是每个人通过选举全部或部分官员、或通过多数者或多或少不得不留意的劝告、申诉、要求等方式,对政府的行政施加某些影响的权利。”

现代宪政理论更进一步认为:自由和民主从来不是“天赋”的,而是在人类生活中被创造出来的,如果人们不去争取自由和民主的权利,它就不会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作为人类一分子,必须要用自己的行动为自己而创造。

上世纪20年代,意大利政治思想家拉吉罗为现代民主制度提出了一个更为科学的名称:自由的民主政体——简称:民主制。■

(作者为文史学者)

(责任编辑 杨继绳)

本刊启事

凡未收到稿酬的作者,请将联系地址、邮编和身份证号码告知我社。

联系人:肖林 电话:010-68525374

如何理解“尊孔读经”与杨继绳先生商榷

○ 彭国翔

《炎黄春秋》2011年第1期发表了杨继绳先生的《我看“中国模式”》一文,文中对目前流行的有关“中国模式”的论调进行了有力的回应。杨先生将近年来一些学者宣扬的“中国模式”论总结为以下几个要点:一、肯定和赞扬中国的现行政治体制;二、肯定和赞扬改革前的30年;三、主张中央集权和“大政府”,肯定“威权体制”;四、排斥现代民主制度,否定普世价值;五、否定“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对皇权专制的批判,掀起了新一轮尊孔读经高潮。“中国模式”的持论者们是否接受杨先生总结的这几点,笔者不得而知。但杨先生的所指,在当今的思想和知识界应当不是无的放矢。如果“中国模式”不必专属于某些学者以及某种特定的倾向和立场,而是对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在内中国现状的一种概括和论证,那么,中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现状是什么?其中存在怎样的问题?未来的发展方向又当如何?

在杨先生看来,中国目前的政治是“威权政治”,经济是“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二者结合所构成的现有的“中国模式”,杨先生称之为“权力市场经济”,这种“权力市场经济”的“中国模式”非但不能给予中国人民以希望,而且已经危机频仍,陷入了困境,因此其合乎逻辑的出路是建立“宪政民主政治加完善的市场经济”。什么是他所理解的“民主宪政”和“完善的市场经济”,杨先生文中没有细说,笔者未敢遽然引为同调,但对于建立民主宪政和完善的市场经济这一基本方向和主张,笔者是完全认同的。不过,在文化方面,杨先生对于“中国模式”的一些观察和判断,笔者认为还有进一步分析和展开的必要。“反西化”是否就必然意味着“维护占统治地位的政治体制和思想体系”?如何理解当前所谓的“尊孔读经”现象?这两点,是笔者希望着重探讨的。

杨先生文章的最后部分谈到了文化问题。其

中,杨先生似乎将晚清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作了一个“两分”。一方是“激烈地批判中国皇权专制的政治传统,大力提倡学习西方的先进经验”,另一方则是“以保护中国传统文化的名义反对‘西化’的力量”。一方是西化派,一方是反西化派。在杨先生看来,晚清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一个主要线索和动态,就是学习西方和反对“西化”的持续不断的争论。

严格而论,杨先生对于晚清以来中国思想文化史的观察,虽足以得其大端,但未免失之简约。那种“一分为二”的思维方式,或许无形中仍是长期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潜移默化的影响所致。不过,将晚清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发展聚焦为学习西方和反对“西化”的不断争论,这还不是问题的重点所在。关键在于,杨先生在这种“一分为二”的观察的基础之上,又进一步指出:“反对‘西化’,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容,其共同点都是为了维护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政治体制和思想体系。”这样一种判断,笔者以为过于简单和绝对,既不符合近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史的实际,对于眼下和将来思想文化界不同谱系的配合,构建文化意义上真正有价值、有远景的“中国模式”,不免会产生非所期待的消极影响。

晚清以来,反对“西化”的确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内容,但不能将其共同点等同于“都是为了维护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政治体制和思想体系”。此外,所谓“反西化”,对于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含义。在什么意义上“反西化”,更是需要加以分析辨别的。上世纪20年代开始迄今的现代儒学运动,最能够作为澄清这两点的例证。熊十力是辛亥革命的元老。梁漱溟即使在“万马齐喑”、“一言堂”的时代,仍敢于触犯龙颜、直陈己见,即使失去说话的权利也不放弃自己的原则。作为中华民国宪法的起草人,末代翰林张君勱一

生主张民主宪政,任职翰林院庶吉士时即因反对袁世凯而流亡;后来既不为当时的国民党独裁政权所容,也不认同马列主义的政治思想,终成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势力”。唐君毅、牟宗三无论1949年之前在大陆,还是之后在港台,都自觉与国民党政权保持距离;而他们离开中国大陆,也是出于和张君勱同样的选择。徐复观虽然曾经参与政治,但由于其强烈的批判精神,终于在中年以后脱离政治,投身学术,成为一个现实政治的彻底的批判者。至于如今仍然健在的余英时先生,为了一个人文与理性、公平与正义的中国,从1950年代迄今一直对专制和极权进行不遗余力的批判,其铮铮风骨,更是当今儒家知识人的典范。显然,这些现代儒学的代表人物在相当程度上都是反对“西化”的,但是,无一例外,他们不是要“维护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政治体制和思想体系”,而恰恰是“占统治地位的政治体制和思想体系”的批判者。

就学习西方来说,杨先生格外重视民主宪政。同样,这些现代儒学的代表人物不但不是民主宪政的对立面,反而都是主张充分吸收的积极推动者。就此而言,他们不但不是“反西化”,反倒是主张“西化”的。事实上,“五四”以来,肯定民主和科学,一直是中国知识、文化界的主流。这些往往被视为文化保守主义者的现代儒学人物,在这一点上也毫不例外。他们的“反西化”,只是指出中国人长期在其文化传统中赖以安身立命的价值系统自有其值得肯定甚至殊胜之处,不应当简单地抛弃,为西方具有浓厚宗教背景的价值系统所化而已。所以,这些人物所代表的现代儒学的“反西化”,绝不能理解为肯定“威权体制”,排斥现代民主制度,否定“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基本价值。就“五四”以来对于中国皇权专制的批判来说,他们也一直是内在的参与者。也正因为如此,对于20世纪以来中国的现实政治,他们都是“能识庐山真面目”的局外人。当然,他们对于民主政体尤其选举政治的局限也看得很清楚。而他们立足儒家传统对于现代民主政治的修正,比如指出政治制度与道德修养虽然各有其相对独立的领域,不容彼此化约,但后者对于政治制度的实际运作,仍然有不可估量的影响。这一看法,与当今西方世界内部对于民主的反省与改进在相

当程度上也恰好不谋而合。

西方一些从社群主义角度批评自由主义的学者之所以对儒家传统情有独钟,大体都在于感到了儒家传统与社群主义的彼此共鸣。只不过这些社群主义的西方学者有时不免顾此失彼,没有看到儒家传统中也同时兼有丰富的自由主义的精神资源而已。从政治思想的角度来看,如果一定要以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两端之见作为观察的视角,儒家不是非此即彼,而是亦此亦彼、兼而有之的。也正是因为儒家传统两方面兼而有之,现代儒家人物在肯定民主政治的同时,才没有照单全收,而是有所因革损益。

对于中国皇权专制的批判,杨先生文章中只论及晚清以降,因此笔者以现代儒学为例,指出往往被视为“反西化”的现代儒学一直是中国皇权专制的批判者。事实上,作为一种参照系统,西方民主政治的观念资源固然使得近代以降的儒家知识人对于中国皇权专制的批判更为自觉和深入,但是,儒家人物对于专制极权的批判,却并非晚清以来西方民主政治影响的产物,而原本就是儒学历史上一贯具有的一个重要传统。这种政治和社会批判的精神,可以说是儒家传统的鲜明特色之一。作为儒家理想人格的“君子”,一个不可或缺的身份就是政治和社会批判的主体。孔子“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第十六》)以及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的言论,大家早已耳熟能详。专制君主的代表人物朱元璋曾经罢黜孟子在孔庙的配享,并删除《孟子》中“民贵君轻”的文字,足见孟子的一些主张与专制政治势同水火。20世纪90年代新出土的古代文献中,有孔子之孙子思的言论记载。当鲁穆公问子思何为忠臣时,子思的回答是,“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这可以为儒学的批判传统再下一注脚。胡适曾将范仲淹《灵鸟赋》中“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与美国独立战争前争取自由的名言“不自由,毋宁死”相提并论,并非偶然。而纵观整个中国历史,儒家知识人的政治和社会批判持续不断,前仆后继。顾炎武所谓“依仁蹈义,舍命不渝,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可以说是中国历代心系家国天下的儒家知识人所具有的批判精神的写照。这种精神和风骨,虽一再受到打压,至今仍跃动不已。

也正因为真正的儒家知识人几乎无不具有这种“从道不从君”和“以德抗位”的精神和实践，所以历代大儒几乎无不处在现实政治权力中心的边缘，甚至成为现实政权排斥和打击的首当其冲者。孔、孟都未能实现其政治上的抱负，只能退而著书立说，从事教育，以“施予有政”的方式在后世发生影响。当时孔子甚至以“丧家之犬”自嘲。宋明理学传统中，从程颐到朱熹再到王阳明，都曾经被朝廷宣布为“伪学”而遭到明令禁止。秦汉以降，中国古代批判专制的儒家知识人，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或许仍然可以称之为“体制内的持不同政见者”。但是，明末清初鼎革之际，当时的一些儒家知识人对于皇权专制的批判极为尖锐，几乎已经越出了体制之外。譬如，吕留良（1629~1683）即明确指出：“天子之位，乃四海公家之统，非一姓之私。”（《四书讲义》卷26）在他看来，极权者及其体制的本质即是“谋私”而非“为公”。所谓“自秦汉以后，许多制度其间亦未尝无爱民泽物之良法，然其经纶之本心，却总是一个自私自利，惟恐失却此家当”（《四书讲义》卷29）。显然，这已经不是专制体制之内说话了。在吕留良这样的儒家人物的心目中，政府的存在只是为了促进与提升人性的价值，而不是为了满足统治集团的利益。随着晚清专制皇权的解体，秉承儒家传统批判精神的儒家知识人几乎立刻很自然地“从体制内”转到了“体制外”，上述现代儒学的发展及其代表人物的经验，即是明证。这种转换之所以顺理成章，是因为儒家传统与专制体制本来不仅不必然具有同构的关系，反而在本质上相互抵触。朱熹认为儒家的政治理想从未真正落实，“千五百年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朱文公文集》卷36），并非高调理想主义之下对现实政治的愤激之词。汉代以降中国传统政治运作模式的实际，在朱熹之前，早已为汉宣帝的“霸王道而杂之”（《汉书·元帝纪》）一语道破。也正因此，在现代儒学人物彻底摆脱“体制内持不同政见者”的身份之前，晚清第一批到欧洲游历的儒家知识人如王韬、薛福成、郭嵩焘等人，已经在接触到西方的民主制度之后，众口一词地表示赞同了。

了解了儒家传统与专制政治之间的紧张和对立、儒家传统内在一贯的批判精神与实践，以及现代儒学在什么意义上反西化，对于如何理解

“尊孔读经”，我们或许可以多一些思想的助缘。

严格而论，杨先生文中并没有对他所理解的“尊孔读经”加以明确界定，只是如本文开头所引，在总结近年中外“中国模式”论者的要点时将“尊孔读经”视为其特征之一。所谓“否定‘五四运动’以来对中国皇权专制的批判，掀起了新一轮尊孔读经高潮”，杨先生将“尊孔读经”和维护专制政治联系起来，不无历史根据。晚清袁世凯等军阀，就是试图利用“尊孔读经”来维护专制皇权。杨先生文中提到20世纪30年代陶希圣等人的“中国本位论”，也与当时的国民党政权确有干系。不过，杨先生所谓的“尊孔读经”，主要针对的恐怕还是近十年来的现象。当前的“尊孔读经”现象十分复杂，实非“中国模式”论者一方“掀起”。对此，这里不能深论。但杨先生反感目前的“尊孔读经”，也是事出有因。

历史进入21世纪，儒学似乎由“山重水复疑无路”步入“柳暗花明又一村”之境。如今神州大地的“尊孔读经”，竟也如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破四旧”和“批孔”那样，在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了。如果说当前形形色色的“尊孔读经”不免于“乱花渐欲迷人眼”之“乱”，半个多世纪与中国文化传统的疏离，使得眼下“儒学”、“国学”的迅速普及注定了难逃“浅草才能没马蹄”之“浅”。然而，假如仅仅是由于长期与传统断裂造成一时不能深入儒学的内在精神价值，大概还不会成为杨先生批判的对象。杨先生批判“尊孔读经”，是因为在他看来，“尊孔读经”是他所谓“中国模式”论者反对政治民主化的手段。

如今的“尊孔”现象中，确实有一股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原教旨主义潮流。基于这种立场之上的“尊孔”，无论真诚与否，孔子和儒家都不免被塑造成了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和原教旨主义者。民族主义本身未必是一个完全负面的东西，对任何一个民族来讲，民族主义都或多或少存在。但狭隘的民族主义与原教旨主义相结合，就会产生很多负面的问题。当前狭隘民族主义的“尊孔”有两种形态。一种是基于无知而盲目排斥西方。或是来自于非理性的情绪，或是人云亦云的随波逐流。总之，是将自由、民主和人权仅仅视为西方价值加以排斥，认为接受这些价值就无异于臣服于西方。对于这种浅陋之见，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

度裔的思想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早已提出驳斥,指出了印度传统中源远流长的民主传统。同样,中国学者从胡适到余英时,西方学者如狄百瑞(W. T. de Bary)等人,也一再提醒中国传统中同样不乏自由、民主的精神因子。另一种则是基于现实原因而刻意借“尊孔”来反对西方。或是迎合现行政治权力,为的是上达天听,遂其“鸿鹄之志”,或是原本一心要去“西天取经”,却因种种不如意,一变而成莫大的国粹派,或是二者兼而有之。如果说基于无知而盲目排斥西方多少还有些情感上的真实性,基于现实因素而刻意贬抑西方、颂扬儒学,只能说是伪“尊孔”了。然而,无论是“无知”的“坐井观天”,还是“有心”的“取径终南”,作为狭隘民族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的“尊孔”,都只能成为专制与极权的附庸。这一点,假“尊孔”之名而有意迎合政治权力者,自不必言。学植浅薄、“气魄承当”、一味排外的“尊孔”,即使没有主观意愿,客观情势上也很难不被利用。

此外,在商业化大潮的裹挟之下,在“儒学”、“国学”已经从昔日批判的对象变成一种流行甚至时尚的今天,“读经”也成为一种谋取商业利润的途径。名为传播儒学,实为敛财渔利的现象,也已比比皆是。讲经者未至知行合一的境界,不能以身作则,“只是滕口说”,充其量为“经师”而与“人师”的境地相去甚远。等而下之者,不免近乎江湖郎中。在这个与传统隔绝已数十年的时代,信口开河虽然有时也可以“炫外以惑愚瞽”,日进斗金,但最终毕竟只能是自欺欺人、误人误己。

当前“尊孔读经”现象中这两个值得检讨的问题,一是政治化的危害,二是商业化的腐蚀。前者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与政治权力合流、为其所用,后者是丧失了儒家精神气质的庸俗化与不完善市场经济下的商业化合拍。如此的“尊孔”、“读经”遭到正直之士的侧目,是很正常的。不过,即便当前的“尊孔读经”存在上述问题,不加分析地一概否定“尊孔读经”,将其等同于“反西化”尤其是反对政治民主化,笔者以为有失片面。

杨先生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反对‘西化’的种种理论常常被执政当局作为维护既得利益和统治地位的工具,特别是用来反对民主、维护专政的理论工具。”这句话说得很好,历史上的儒学至今仍被很多人视为皇权专制的帮凶甚至同谋,

除了那些“曲学阿世”之辈为了追求富贵而主动趋附之外,专制统治者刻意利用儒学作为“缘饰”的工具,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是,从前文所述儒家历史上一贯的批判精神以及现代儒学对于民主的充分肯定来看,专制统治者充其量是选择儒学中那些对其有利的观念“为我所用”,不可能真正接受和实行儒家的政治主张。专制极权与儒家的“王道仁政”根本是“不同道”的。汲黯(?~公元前112)当面指出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就是揭露了专制统治者利用儒学的真面目。真正的有识之士,对此都能洞若观火并加以区分。譬如,1930年身在狱中的陈独秀即指出:“每一封建王朝,都把孔子当作神圣供奉,信奉孔子是假,维护统治是真。……五四运动时,我们提出‘打倒孔家店’,就是这个道理。但在学术上,孔、孟言论,有值得研究之处,如民贵君轻之说,有教无类之说,都值得探讨。”(郑学稼《陈独秀传》,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960页)陈独秀是批孔先锋,却能看穿统治者利用孔子的伎俩,在孔孟学说和被专制统治者利用的孔孟符号之间做出区分,是很深刻的观察。

事实上,上述政治化和商业化的“尊孔读经”,非但不能代表现代儒学的发展,反而恰恰与儒家传统一贯的精神背道而驰,是现代儒学首先要加以批判的对象。孔子本人周游列国、甚至“欲居九夷”、“乘桴浮于海”,是对狭隘民族主义的嘲讽。宋明理学吸收佛教,现代儒学吸收西学,则是对原教旨主义的否定。儒家的义利之辩,更是强调“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如前所述,现代儒学发展的一个基本线索,就是要充分吸收民主政治的精神,进一步完善民主政治的思想和实践。尽管儒学本身是一个内在多样化的传统,从来具有不同的流派。儒学传统也一直不断吸收外部的资源,从而丰富和发展自身。但是,对于鱼目混珠、以假乱真者,儒家和古今中外任何一种精神和思想传统一样,都是深恶痛绝的。清儒颜元(1635~1704)说过这样的话:“天下宁有异学,不可有假学。异学能乱正学而不能灭正学。有似是而非之学,乃灭之矣。”种种“似是而非”的“假学”、“伪儒”,无论在官方还是民间,对于真正的“尊孔读经”和复兴儒学,只能是“死亡之吻”(kiss of death)。如果说“五四”对于儒学的批判有助于

澄清关于儒学的种种误解,“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尊孔读经”,反倒正是儒学最大的危害。

杨先生在文章中虽然提到了“‘孔化’近代也分裂为传统儒学和现代儒学等多种派别”,但没有表明他对现代儒学的理解,特别是他对于现代儒学与他所谓的“尊孔读经”之间关系的理解。如果说现代儒学自然“尊孔”,也不反对“读经”,那么,从前文对现代儒学发展的历史回顾来看,真正长期接受儒家古典熏陶,具有深厚学养,并认同儒学核心价值的知识人,原则上都不会反对民主政治的精神方向、主张公平合理的市场经济。同时,如果“读经”有助于儒学价值深入内心,成为一种人们真正内在的精神资源,他们无疑会赞同“读经”。如果“尊孔”意味着拨乱反正,彻底走出以往激进反传统的偏颇,在精神价值的层面不再“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托钵效贫儿”,在植根儒家以及整个中国文化传统根本的基础上“吐故纳新”,“海纳百川”,那么,他们无疑会赞同“尊孔”。这种意义上的“尊孔读经”,不知杨先生是否还会反对?事实上,这种意义上的“尊孔读经”,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之交马一浮创办复性书院,50年代钱穆、唐君毅等人创办新亚书院迄今,一直是现代儒学发展的精神方向。作为新亚书院的旨趣,“上溯宋明书院讲学精神,旁采西欧大学导师制度”,正是立足儒家,同时吸收西学的明证。这样一条历史线索和精神谱系,虽然上世纪50年代之后一度“花果飘零”,被迫在大陆之外的华人世界保存和发展,但是毕竟薪火相传,不绝如缕。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深入儒学、认同儒家的有识之士,自然闻风而起。当今一些提倡“尊孔读经”的人士,正是继承和发扬了现代儒学意义上“尊孔读经”的线索和谱系。譬如,台湾“儿童读经运动”的发起人王财贵博士,就是这样一位不惜自己捐资的儒学价值理念的实践者。这样的“尊孔读经”,对于中国建立民主宪政和公平、正义的市场经济来说,非但不是阻力,反倒正是推进的一大动力。

杨先生之文,似乎秉承了已故李慎之先生的自由主义的精神和思路。李先生生前就一直严词批判儒学传统,要求儒家对中国的专制极权负责。杨先生文中虽然并没有直接批判儒家传统,但未加分析地将“尊孔读经”视为阻挡中国民主

化的一种“反西化”现象,恐怕既没有看到政治民主化早已成为现代儒家知识人的一项内在的自我诉求,更没有想到这种在儒家传统中渊源有自的诉求和批判精神本来可以与杨先生自己所继承的自由主义的批判精神相得益彰。

澄清了“尊孔读经”现象中的问题,了解了现代儒学的立场,杨先生或许不再会将儒家传统与反对政治民主化等而视之了。事实上,在追求政治民主化这一点上,中国的现代儒学和自由主义这两个传统,应当是“所异不胜其同”、“合则两美,离则两伤”的。当年徐复观与殷海光之间的争论,就是非常值得思考的一例。可惜的是,在儒家传统、专制极权和民主政治这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上世纪40年代之后中国大陆的一些自由主义者,其认识往往有失偏颇。这一点虽然是特定的历史原因造成,但毕竟令人遗憾。“五四”时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虽然大都批判传统,但对传统文化却能有相当深入的了解。其严厉批判传统文化,往往是为了“矫枉过正”。作为自由主义旗帜的胡适,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在中文写作中对中国传统文化时常言辞偏激,但在英文著作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叙述和评论却往往平情而客观。“五四”时代指出并强调中国传统内部具有自由和民主因素的自由主义代表人物,正是胡适。如今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要想真正进一步发扬“五四”以来中国自由主义知识人的精神传统,不但对西方自由主义的了解、消化和吸收要更上层楼,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和掌握,至少也要不逊于“五四”时代的前贤。像余英时先生那样将自由主义的精神与儒家传统的价值水乳交融地结合起来,才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康庄大道。

回到“中国模式”的问题,依笔者之见,现在总结“中国模式”,恐怕还为时尚早。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分别来看,如果不远的将来的确可以发展出某种可资借鉴、与众不同的“中国模式”,大概最有可能的还是文化的方面。而文化方面“中国模式”的建立,只有在进一步吸收西方、印度等文明传统的长处的同时,对中国传统文化下“掘井及泉”的功夫,继续发挥“因革损益”、“吐故纳新”的精神方可达成。文化上认同自己的文化传统,绝不意味着固步自封。而(下转第60页)

1960 年公民肖森的上书

○ 任复兴

笔者 2000 年在太原旧货市场淘到 1 册太原市公安局废弃档案。这 54 页故纸 ,有太原公安局及个别分局文件 17 份 29 页 ,复制笔迹等罪证 25 页。立案 23 件 ,包括投寄反动、污蔑信件 12 起 26 封 ,散发反动传单 6 起 136 张 ,书写反动标语 2 起 3 处。发案时间 1956 年 6 月 1 起 ,1959 年 2~3 月 4 起 ,时间不明 1 起 ,其余 17 起均发生在 1960 年。文件形成时间是 1960 年 4 月至 1961 年 8 月 ,诱发主因是严重饥饿。涉案者身份和文化水平差别很大 ,有的很有政治头脑。有对大饥荒惨象的描述 ,也有对错误政策体制的诊断 ,有对不挨饿日子的怀旧 ,也有对自由的憧憬 ,有对灾难制造者的诅咒 ,也有对夺命元凶人性的拷问……这些良知未泯的人 ,一致诉求是改变。为了改变 ,不惜牺牲个人生命 ,展现了悲壮的人格美。在只允许歌颂形势大好 ,庐山会议进而阻断言路以后 ,以公安档案这一特殊形式 ,保留了特殊年代山西严重饥饿时的民间声音 ,弥足珍贵。

以下是该废弃档案的最后 6 页 ,是其中因粮食和三年大饥荒引发的 23 个“反革命”案件的最后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肖森”给国家主席上书 ,是完全合法的 ,但成了“污蔑信件”。太原市公安局 1960 年“11 月 26 日接到市委转来中共中央办公厅收到署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肖森’写给中央刘主席的信件一封”后半年多 ,仍发出“关于查找给中央主席写污蔑信件肖森下落的通知” ,当作危险分子广泛追查。这种危险遭遇在肖森意料之中 :“本来不敢写 ,害怕自己被用犯罪的名义而处死”。

有人说肖森是当时山西粮食厅的副厅长 ,待核实。这位有良知和独立见解的公民 ,对大饥荒情况的反映 ,对干部特权、走后门等现象 ,对军事与民生、农业与工业、学校比例的失调的失误 ,看得很准 ,不久上面也做出了政策调整。而肖森洞察到的个人崇拜、对人民压得太严等根本性、体制性问题 ,则变本加厉 ,酿成了不久之后文革的悲剧。

信封如下。4 页信纸上写(为保留原貌 ,原文中不规范的字、词用法不做改动)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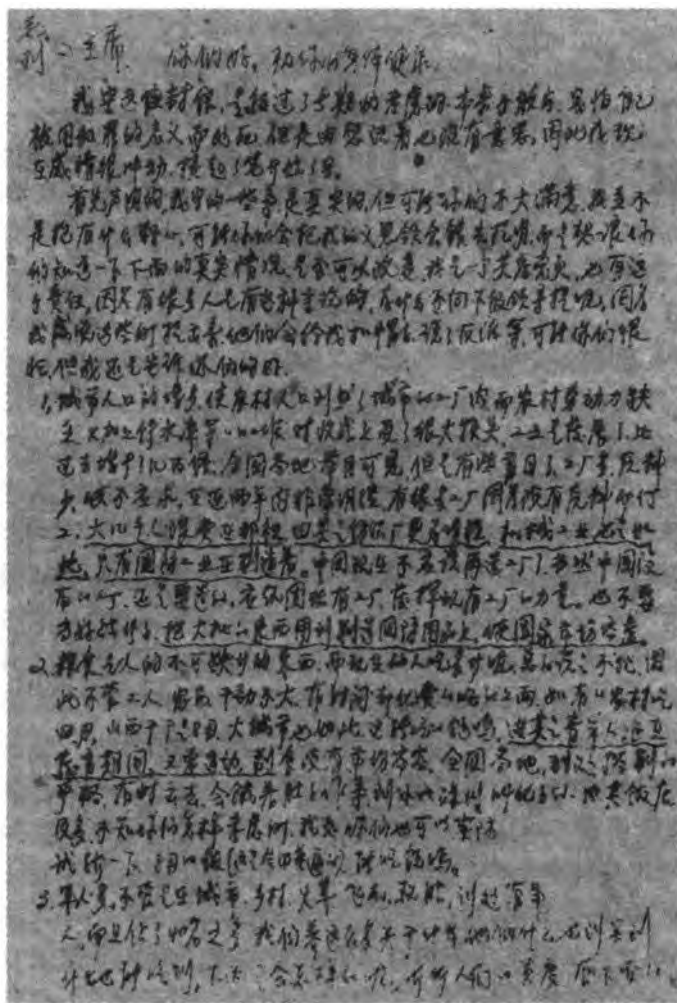


毛
刘 主席： 你们好 ,祝你们身体健康。

我写这封信 ,是经过了长期的考虑的 ,本来不敢写 ,害怕自己被用犯罪的名义而处死 ,但是由想活着也没有意思 ,因此我现在感情很冲动 ,提起了笔开始了写。

首先声明的 ,我写的一些事 ,是真实的 ,但可能你们不大满意 ,我并不是抱有什么野心 ,可能你们会把我的意思领会错 ,先提明 ,而是想让你们知道一下下面的真实情况 ,是否可以改变。我是一个共产党员 ,也有这个责任 ,因为有很多人是有这种言论的。为什么不向下级领导提呢 ?因为我感觉这些问题提出来 ,他们会给我扣帽子 ,说了反派等。可能你们很忙 ,但我还是告诉你们的好。

1.城市人口的增多 ,使农村人口到了城市的工厂内 ,而农村劳动力缺乏 ,又加上修水库等等的工作 ,对收成上受了很大损失 ,工业是发展了 ,比



肖森致毛泽东、刘少奇信(部分)

过去增长了几百倍,全国各地举目可见,但是有些盲目了,工厂多,原料少,供不应求,在近两年内非常明显,有很多工厂因为没有原料而停工,大几千人浪费在那里,尤其是纺织厂更为明显,机械工业也是如此,只有国防工业在制造着。中国现在不应该再造工厂了,当然中国没有的工厂,还是要造的,应巩固现有工厂,发挥现有工厂的力量。也不要当好战份子,把大批的东西用到制造国防用品上,使国家市场空虚。

2.粮食是人的不可缺少的东西,而现在的人吃多少呢,总的说是不饱。因此不管工人、农民,干劲不大,有时间都化费在吃的上面,如有的农村吃四两,山西干部是八两,大城市也如此。这能吃的饱吗,尤其是青年人,正在发育期间,又要运动,副食没有,市场空空,全国各地,到处控制的严格,有时出去,会饿着肚子作事。到处的碰到叫化子,尤其在饭店极多。不知你们怎样考虑问题?

我想你们也可以实际试验一下,八两的饭(这是全国普遍的)能吃饱吗?

3.军人多,不管是在城市、乡村、火车、飞机、轮船,到处有军人,而且占40%之多。我们养这么多兵干什么?他们什么也能买到,什么也能吃到,下面会怎样的呢?听听人们的态度。有下面的歌谣,这也可能是坏份子干的,但人们是有感触的,你们也可听听:

黄皮到处是,吃饱没有事。

我们饿着肚,果实喂猪罗。

事实也如此,现在不但军人多,而且公安人员也比以前多了有三倍。

4.从市场上看,到处是空市场,没有一点生气,全国一样,大城市内是有东西不卖。毛衣、毛线买不到,布买不到(因为节约了),毛料买不到,而高级一些的官员可以买到。难道说冬天是高级人员怕冻,一般人员就不怕冻吗?好的布,如东方呢、灯心绒、卡其、华达呢都买不到。最普通的东西,人们用的小手巾也没有(在山西没有看到)。号召人们讲卫生,却买不到肥皂、碱。人们连糖、点心、饼干也吃不到。自行车、手表更不用说了。常用品、香烟、酒、醋等东西也是无有,供应极少,还都是不良品,与过去对比(54年)相差了很远。水果在近二年都见不到,东西都那里去了呢?为什么中国一天

天是发展了,但这些东西却看不到?说是人多了,这是事实,购买力大了,这也对,可是都没有买到,那怎么是购买力大呢?而根本市场上就看不到。总的说在人民公社后,人民生活是下降了,工业是发展了。中国的风景区很多,但不能游玩,因为要饿肚皮。有些领导人用苏联卫国战来比,我看了书,人家也比现在的中国要强三倍。虽然他们吃的是四两粮,但是公两,每人都是八市两,比我们还多。而我们现在无有战争,在前几年生活很好,但经过建设发展,生活却不如以前了。这说明什么问题呢?主席可考虑一下。如不信,可仿前人,施公暗访来下面看。如果只听汇报,那全是虚伪的。现在人们是无精神,作事也不带劲。如农民种粮,吃不饱肚子,喂猪却吃不到肉,养鸡吃不到蛋,想想看是否能提高人们的精神呢?有些人为了完成分配任务,到农民家里逼着卖蛋,尤其是一些农村干部,现在作风很坏,采用压制的办法,

连中农也看成是不顺眼的人了。在业工人们吃不饱,发展不了力量,比过去差多了,但报的还是超额完成。这都是什么问题呢,说明了什么?你们可分析一下。

就拿这个信纸来说,在市场上是好纸,你们看好不好呢?有些书的纸还不如这个的,这是一个具体你们能看到的,其它多的很,我也不能全部写在这里。

5.对病人,现在医院开设的多了,对一些急病人的确是方便多了,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对病的休养上来说差的多,从营养上吃不到什么,也是每天那么些粮食,副食没有,连药都不全,这对病能好吗?从表面上看,是关心病的,但从内视来分析,得病后是不容易好的。虽然当时好了,但营养上的不足,造成死亡是不可估量的。当然高级官员例外。

6.干部与群众关系。在农村中,生产队长就能吃的饱,在工厂中,科长以上能吃的饱,在机关中也是一样,因为他们另设有小灶。不但这吃的上,而且生活用品等都是多,如烟还比一般人好,供应品,群众没有,而他们有。难道不都是人吗?你们想想人们的意见是什么?现在从服务业来看,人们对列车员和饭店恨极了,给人们一种影响极坏,没有过去的服务态度好。这是从那里来的呢?有好多人都想作这个行业,因为能吃的饱。如火车上,有供应旅客的点心,长途供应,但是有铁路证章的坐一站也供应,而多余的下了自己腰包,有些旅客坐了五个小时的火车却吃不到,这又是什么问题呢?

7.以上仅有的几个问题,我是在思想混乱中写的,并没有把所有情况全部的说出来,因为也不可能。仅这些代表性的问题,主席也可以考虑了。我认为这不是一般问题,而是大问题。有些党员嘴上当面不说背后乱说。现在我国处于一党专政,一切都是党员吃的开。在工作中,有极明显的例子,如不是党员的领头人几年不动,有些还换掉。而就是不动的一些人,也是有职无权,作什么还的请示支部,才能行动,否则就不行。因为吃不饱,山东曾有三、四次的群众运动,这是不是你知道否?有饿死人的现象,如在东北、山西等。再者是我也认为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也很严重,中国现在没有什么民主作风。实际有些人是不敢说,并

不是没有问题。为什么会压制的这样呢?这你们也值的考虑。

我想你们也知道过去的历史发展的情况,作官者爱民。而现在呢,不管什么官,尤其是农村干部,恨极了。人常说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现在实在是管理的好,否则早反了。再说现在对人民也太压的严,有一点不合的言语,就带一顶大帽子,不是死即是牢。我在全中国看到今年枪决人和一九五零年差不多,每天都有。有些青年人,一时对国家的政策想不开,说几句不利国家的话,却就要受到以上的制裁。因此有些人(包括党员在内)有话不敢说。如果人们吃的好,不会像现在饭店那样人多。再是人员的流动,全是南调北、北调南,使人们离乡背井造成的。这些现象我想在国际上各国是不会有。我认为目前对全国人民的生活问题,国家应考虑,工业应适当的发展,不应再吸农村的人,学校也适当的控制,不宜多发展工、学,应当发展农。市场上的水果、点心、布等,发挥些自由市场,像以前一样(五三年为例)繁华起来,现一个样子。如果拿五三年来说,真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生活,而现在连殖民地生活都不如。尤其现在市场紧张,而走后台的也特别多,有些东西全从后门走了,市场上看不到。而现在的市价也膨胀的厉害,过去二元钱的东西,现在卖六元多,增长了三倍。到街上看,凡是水果,不要证,不要布票者,人排队的有上百、上千,全是一种不良现象。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应民生为主,应使人民生活提高,像现在的吃不饱,穿不暖,算什么社会主义社会呢?如果再要下去,真不敢想结果是什么?是否还能是这么个国家呢?有时回去时,我也听一下台湾的消息,当然这是国家禁止的,但要是公开让听,那中国我看早反了。所以我写这封信,是出于我在祖国看到一种情形,及人民的反映,提供你们参考,及早解决现在生活问题,不要为了出口,支援其它国家,而让我国人民受这样的苦。应恢复五三年的生活。

我乱七八糟的就写在这里,希主席考虑呢。

此致

敬祝 主席身体健康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肖森 10/21

另外学习毛选,但买不到书。

【民标 24 号】

红笔批示:请耿局长阅,李贞乾同志阅查 左 4.5

机密

太 原 市 公 安 局 关于查找给中央主席写污蔑信件肖森下落的通知

(61)64 公二字第 12 号
(加盖 00.94)

各分局、县局、内部保卫组织,专、兼职保卫干部:

去年 11 月 26 日接到市委转来中共中央办公厅收到署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肖森”写给中央刘主席的信件一封。内容认为政府不关心人民生活,把大批东西用到制造国防用品上,污蔑我国“好战”。发信地址只写山西两字,从信戳上查出是 60 年 11 月 5 日由太原五一路邮局平检信箱发起的。信内所

写的问题大部是属于工厂、机关内部和粮食、市场供应方面的。写信人认为:“在农村中生产队长就能吃饱,在工厂中科长以上能吃饱,在机关中也一样”。在列举粮食吃不饱时,特别强调青年人吃不饱,同时还提到因为吃不饱,山东曾有三、四次群众运动。根据具体内容分析,此人好象是一个经济企业、机关、学校内部的人员,而且很可能是一个山东籍的一般青年干部。再信内还提到一些国防工业方面的问题,此人在国防单位以及接触国防单位的基建、财贸部门的可能性较大。从书写程度来看,此人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字迹没有伪装。为迅速查找此人下落,现将原文复制附发各单位,希结合当前以摸清各种危险分子开展的调查摸底工作,广泛寻找线索,认真核对笔迹,发现怀疑对象,及时报告市局二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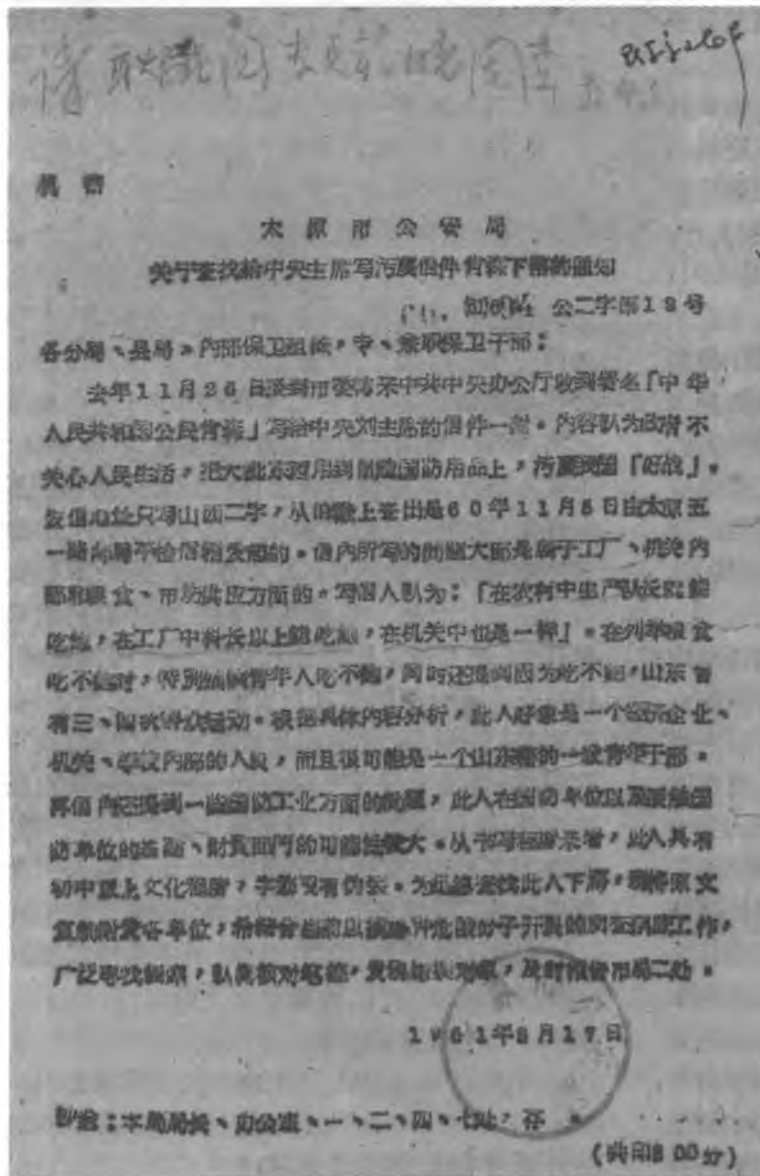
1961 年 8 月 17 日

抄送:本局局长、办公室、一、二、四、七处,存。

(共印 800 份)■

(作者为高级记者、山西省忻州市徐继畲研究会会长)

(责任编辑 洪振快)



周巍峙回忆周恩来

○ 徐庆全

一、认识周恩来

徐庆全(以下简称“徐”) :周老 ,建国前您就是革命文化战线的战士 ,建国后先后担任过文化部艺术局局长、文化部代部长并兼任党组书记。建国后文化部门一直是周恩来总理领导的 ,您长期在他的领导下工作 ,一定有许多鲜为人知的事情可以告诉世人。请问 ,您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什么时候 ?

周巍峙(以下简称“周”) :我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同志 ,是在 1937 年 8 月。那一年 ,已经在上海搞了几年救亡活动的李公朴、柳湜等人和我 ,一起奔赴华北前线做抗战宣传和组织工作。我们到过即将失守的大同 ,后来驻在太原。我那时一边开办音乐训练班以推进抗日救亡音乐活动 ,一边在我党领导下的全民通讯社任编辑和前线记者。

敌人在不断进攻 ,太原的上空几乎每天都有敌机的袭扰。各机关驻地都修建了防空设施 ,以躲避空袭。当时我所住的太原国民师范院里也修了防空洞。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住在太原市成成中学 ,周恩来副主席和由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也住在这所中学里。在几天前 ,这个大院已遭到敌人的轰炸 ,落下的一颗炸弹 ,炸了一个大坑。有一天 ,我到西战团驻地教歌 ,顺便到办事处采访八路军挺进敌后的最新消息 ,空袭警报又疯狂地响了起来 ,西战团的同志纷纷向防空洞跑。突然 ,我看见一个穿灰土布制服 ,留着大胡子的人仍然站在防空洞边上 ,招呼大家快躲起来。警报声叫得人心直发慌 ,可那个穿灰布制服的大胡子仍然不厌其烦地关照那些动作慢的人。我进防空洞后 ,看见院子里那个人还在那里。我就问别人 ,那个人是谁 ?有人告诉 ,那是周副主席——周

恩来。

徐 :在随后的几年里 ,您作为西北战地服务团的副团长 ,一直辗转于敌后根据地 ,在晋察冀边区及华北组织开展各种革命文艺活动。而那时周副主席在国统区工作 ,想来您再次与他相见应该在抗战胜利以后吧 ?

周 :抗战胜利前一年我就见到他了。那是 1944 年 5 月 ,我率领西北战地服务团回到延安 ,就再次见到他了。那时他从重庆回来 ,似乎是准备参加“七大”会议。周副主席一直是非常关心文艺工作的 ,他来过鲁艺 ,听说西战团从前方回来 ,也知道了我这个搞文艺的人。当他在鲁艺讲话时说道 :你们要写抗战前线的人 ,就要尊重前方回来的同志 ,认真听他们的意见 ,在座的周巍峙就是刚从前方回来的 ,经验很多的嘛。

徐 :周总理工作的细致是有口皆碑的 ,他大概是在听别人汇报工作时听到有关您的情况的吧 ?

周 :是的。稍后 ,当他找话剧《粮食》的作者陈荒煤等戏剧家谈他对剧本的意见时 ,也把我找去了。我看他戴着老花眼镜 ,坐在窑洞的矮凳子上翻看剧本。见到我们 ,他就站起来打招呼。我也与他打招呼。这是我第一次与他面对面交谈。

徐 :您的感受如何 ?

周 :我发现他是一位和善的长者 ,不像是一位身居高位的党中央副主席 ,在他的身边 ,感到亲切、自由。当时我对《粮食》这个剧本 ,也简单提了一点意见 ,如有些地方不生动、不感动人 ,没有多说话。他又说了些什么 ,我记不清楚了 ,但他提意见时的商榷的口吻 ,亲切的态度 ,虚心听取意见 ,平等待人的精神 ,却给我很深的印象 ,似乎一下子就亲近起来了 ,好像见到了一位想念已久的老朋友。我的思绪早已离开那个正在讨论的剧本 ,而被他独特的风度所吸引。

二、周总理与文艺上的“中西关系”讨论

徐：我看到的有关材料中，经常提到您在建国后与周总理的交往。这些事情既有工作中的交往，也有妙趣横生的生活琐事，看后使人感觉：一、您与周总理的接触是比较多的；二、您与他的接触，好像没有上下级那样严格的局限。

周：周总理极为平易近人。我给你说件小事：有一次，我同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一道跟周总理谈戏剧改革和民间职业剧团的问题。碰巧的是，三个姓周的人聚在一起，没有旁人在座。周总理诙谐地说：我是老周，你是小周。周扬呢？就是大周吧。于是大周、小周和老周相视而笑。周总理就是这样平易近人，像一个亲切的师长，一个让人受益匪浅的朋友。在我的心态中，对周总理也始终保持了亲切甚至亲近得就像“老周”、“小周”的称谓一样随意平常的关系。

徐：不过，作为周总理的部下，您尽管有这样的心态，但在一些有关业务的具体事情上，比方说，周总理的指示如果您的具体意见不一致的时候，您是否也以这种心态提出不同意见呢？

周：当然提了。提意见，一方面有你提到的这种心态的原因，另外还有的是，要对工作负责嘛。我给你说一件与民族音乐如何借鉴西方音乐相关的事吧。

徐：那是不是发生在1956年？那一年被文学史研究者称之为“百花”年，上半年的时候，关于文艺的“中西关系”问题有很激烈争论。

周：当时，周总理认为，民族的东西一定要善加保护，不能轻易与别人融合，破坏民族特色。在音乐上，他不主张民歌独唱家学习西洋发声方法，学西洋唱法的也不要勉强他们民族化，搞得不中不西。当时确有轻视民族艺术的倾向，尤其在国画、民歌唱法等方面，有的则在吸收、融化当中搞得不够成熟，受到攻击，说是“不中不西，非驴非马”。周总理强调民族艺术应受到重视和保护的基本思想是十分正确的。我是土生土长的音乐工作者，当然也十分重视民族艺术的保护和发展，我也为此做过大量的工作。不过，在具体工作中，我认为民族艺术，如民歌唱法也应提高，向西

洋唱法吸收一些有益的东西。西洋音乐也应很好地介绍与借鉴，以发挥一些专家之所长。而且，我还有个考虑，就是作为一个中国的作曲家和歌唱家，更应学习民族音乐，达到“民族化”，为中国人民所欢迎。因此，我曾建议学西洋唱法的歌唱家以及声乐教员都来学习民歌和曲艺，从中吸收营养。

1956年，我代表文化部与苏联舞蹈专家一起筹划建立北京舞蹈学校。有一次，在和平宾馆的一次会上，我向周总理汇报舞蹈学校的教育方针和教学方案时，提到一个“全面培养”的问题。周总理听了很生气，说，什么“全面培养”、“全面发展”？就是把民族的东西挤了、搅乱了、洋化了。他激动得拍了桌子。当时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在座，赶快为我打圆场，说那是苏联专家的意思。钱俊瑞说得没有错，当时主要是由于苏联专家不了解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的特点以及和欧洲芭蕾舞、民间舞有着完全不同的风格。他们提出“全面培养”的方针，要所有学生把芭蕾舞、外国民间舞和中国古典舞、民间舞先共同学习一个时期，然后再分科学习，各有所专。事实上，我也是不同意这种做法的。我主张根据学生考试情况及个人志愿，分到民族舞和芭蕾舞两个系。民族舞系以学习中国民间舞和古典舞为主，也学习一些芭蕾舞和外国民间舞。芭蕾舞系的学生，也学习一些中国古典舞和民间舞。具体方案正在商定。我把这些情况也向周总理作了汇报，他听了后，气也消了。当时，周总理提出“中西并存，民族为主，各自发展，先分后合”的十六字方针。我当然遵照执行，以此作为组织上保证民族艺术独立发展的必要措施，会后立即贯彻执行。我首先把自己领导的中央实验歌剧院的演出团分成民族唱法和西洋唱法的两个团，学习也分开，使两者都能按照自己的特色，得到更好的发展和提高；再后来，音乐学院分成两个院，也是根据这一精神实施的。作为一种措施，我是同意的，可是，在具体问题上，这样做也有“一刀切”的倾向。因此，事后我也仍然很坦白地对周总理说，有的作曲家用西洋的合唱形式唱了中国古诗《阳关三叠》，结合得很好，也很动人，已经“合”了。像聂耳、冼星海、贺绿汀等著名作曲家，在创作群众歌曲、大合唱及器乐曲等方面更是创造了十分成功的经验。我虽然没有说“一刀切”之类的话，但是意思是明白的。

徐：周总理已经生气、拍桌子了，您还这样提意见，您不担心再次挨批评？

周：是啊，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担心，但是我知道，周总理绝不会因为艺术思想上的争论，而影响工作，更不会因为分歧意见而牵涉到对人的看法。所以，我还是提出来了。周总理没有表示意见。但此后，有一次在政协礼堂举行鲁迅纪念会时，歌剧演唱家张权在台上唱了民歌，周总理在观众席中笑着说：“这是周巍峙派！”

徐：这当然暗含着对你的建议的鼓励了。

周：此后，我也继续按照我的想法去做。到1963年，随着许多新手法尝试，文艺舞台上出现了不少经过提高的民族化的音乐佳作，中西艺术技巧适当吸收、融化，又有了一些较成熟或成功的经验。这时，周总理的观点有些改变了，他看到，民族唱法和西洋唱法之外，的确还有第三种样式。1963年10月，有一次，他在西花厅同齐燕铭、张致祥和我们一起谈对外文化交流工作时，他很有兴致地说：“看样子的确有第三种唱法，不是一般的民族唱法，跟西洋的也不同。有些西洋唱法的歌唱家，既有精湛的西洋演唱技巧，又能学习民族风格，咬字也清楚，唱中国创作歌曲很动人。有些民歌演唱家在唱现代创作歌曲时，也唱得很好。这叫什么唱法呢？可不可以叫‘现代歌曲唱法’？”接着他又幽默地对我说：“我是国务院总理，是国家的总理，管的工作很杂。你是艺术局局长，工作也是包罗万象，是艺术总理，也姓周。现在我这个总理也成了‘周巍峙派’啦！”

三、周总理与《东方红》

徐：您提到1963年，这使我想起了1964年诞生的那部著名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您当时是这部音乐舞蹈史诗演出和拍摄电影的总指挥之一，而这部作品是周总理倡议创作的。您能介绍一下关于这部作品创作过程中的情况吗？

周：《东方红》创作是令我终生难忘，也是收益最大、最受教育也最愉快的一次创作。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拿出那么大一台歌舞，除了责任以外，没有心情舒畅、大胆创造，那是不可能的。周总理对这部史诗性的作品也是倾注了许多

心血的。

1964年党中央毛主席决定隆重庆祝建国十五周年。那时文化部、对外文委和中国音协正在筹备“北京音乐节”，重点介绍亚、非、拉的民间音乐。按照当时的惯例，举行这样大的演出而且涉及外国音乐节目的音乐节，除应当报外事部门批准外也应报请中宣部，但是，对外文委、文化部既没有向中宣部通气，也没有向周总理请示。1964年7月17日，周扬同志在中宣部检查这一工作时，对文化部和对外文委提出了意见，认为这类重大涉外的文化活动要慎重考虑处理。可能是周扬向周总理汇报了这件事，在17日以后到7月底以前，周总理召集了中宣部、文化部、对外文委、中国音协等方面的负责同志和部分专家连续开了几次会，也批评了文化部和对外文委。他认为，“北京音乐节”的安排考虑不周到，怕效果不好，周总理提出，在国庆时要演出表现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长期革命斗争取得全国胜利的歌舞节目。这些会我都参加了。

此前的1964年5月，我在“上海之春”音乐节期间，曾经看过一部歌颂党和毛泽东主席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大型歌舞节目，看过空政文工团、中央歌舞团，还有其他文艺团体也先后演出过“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舞蹈《大刀进行曲》、《飞夺泸定桥》等。另外，不论是大革命时期、红军时期，还是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都产生过大量的革命歌曲和新民歌，在人民群众中间广为传唱，把这些节目和有关历史资料，更好地进行选择 and 编排，加工提高，可以创作成一部表现革命历史进程的、高质量的大歌舞。我把这个想法向周总理作了汇报。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商量之后，同意了我的建议。

徐：在那个时候，毛主席关于文艺的第二个批示已经下发了，文艺界人士的日子也不好过。

周：是的。那时，文艺界十分紧张，文化部已经开始检查，全国京剧现代戏汇演正在举行，江青、康生对文化工作提出了许多蛮横无理的批评和极“左”的要求，搅得中宣部和文化部难以正常工作。在这时候，周总理却决定搞这次大活动，我事后回想起来，很可能是周总理为了给文艺界一个表现机会，说明这支文艺队伍在革命文艺工作和创作方面是很有成绩的，是可以信赖的，能够搞



1964年10月,周恩来观看《东方红》演出后,祝贺演出成功

出一台意义重大的有较高水平的大歌舞,给国庆十五周年献礼的。

事情定下来后,我经过和周扬同志以及部队领导等有关同志仔细研究,提出了抽调创作人员和演员、舞台工作人员名单,并迅速拟出了创作方案和排练计划,再次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总理7月31日批准了我们的计划,并成立了以周扬为首的领导小组,负责日常领导工作。此时,距国庆还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实际上,全体人员完全集合起来召开动员大会是8月12日,而进行彩排审查是9月15日,可见工作节奏是多么快了。

徐:《东方红》是一部政治性、历史性都很强的作品,对某些历史事件的评价,某些历史事件所占的比重,都不是单纯的技术手段所能解决的。像这类问题,我想,您是要直接向周总理请示的。

周:是的。周总理自始至终都亲自领导着《东方红》的创作,说他是这部大歌舞的总导演一点也不过分。据我的日记和有关材料,周总理至少参加过17次有关《东方红》创作的活动,讨论、观看排练及演出,讨论《东方红》电影的拍摄方案等等。那时,我每天都要和总理办公室联系一次,向总理汇报排演过程中所遇到的重要问题,向总理请示,或总理办公室的人通过我向剧组传达周总理的指示。可以说《东方红》每一重大问题的解决,每一个重大情节的安排,都有周总理的一份心血。

党的诞生、秋收起义、遵义会议这几次历史

事件怎么在大歌舞中表现出来,这是周恩来总理最关心的,他不但要求突出地表现这几次历史事件,还要求艺术上的尽可能完美。那些日子,周总理晚上接见外宾或者参加晚宴后,只要稍微有点时间,准要到人民大会堂的《东方红》的创作现场,有时候是认真地看演员的排练,但更多的时候是和创作集体的同志讨论问题。

在创作中国共产党诞生的“东方曙光”这一场时,剧组没有找到现成的描写和歌颂共产党诞生的歌曲,我就亲自跑到音乐研究所去查资料,终于找到了当时一首民歌的歌词,题目叫《北方吹来十月的风》。我兴冲冲地拿给总理看,总理看了,觉得这首歌的歌词说明了马列主义传播和中国革命的关系,也表达了毛主席所说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历史性结论。后来,作曲家李焕之参考大革命时期群众歌曲的风格,为这首歌的歌词谱了曲。周总理反复读了歌词后,又对舞台布景提出了建议。他说,在这场天幕的左侧,要出现马克思、列宁的画像,在光芒四射的画像前,同时升起两面旗帜,一面是党旗,一面是绘有毛泽东青年时代头像的红旗,在这两面旗帜的导引下,行进着中国革命的队伍。当时代表党的正确路线的是毛泽东同志,所以决定在红旗上加上他的头像。总理的这个建议,现在被完整地保留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里。

徐:您的亲身经历和有关材料都表明,在这个大歌舞中,处处都有周总理的关心、建议、设计的心血,大到一个历史事件的取舍,小到一个幻灯的绘制,都力争符合历史真实。

周:在《东方红》描写解放战争这一场里,我们没有看到炮声隆隆、硝烟弥漫的战争场面,只看到解放大军气势磅礴的渡江场面和占领南京时的欢乐场面,这也是根据周总理的建议设计的。

当时北京群众欢迎解放军入城的热烈场面十分感人,按原来的设计,这一场入城式就想落脚在北京。而周总理认为,南京的解放标志着蒋家王朝的覆灭,有着更为特殊的意义。当时,蒋介石曾经企图凭借长江天险,与共产党划江而治,解放南京粉碎了蒋介石的梦想。而且这样的改动

从整体上看,也照顾到了南方的城市,因为写北京还有末场中天安门广场盛大的各民族的聚会。这场戏按总理的建议改动了。

还有一件事,是总理说的一番话,最终决定了《游击队歌》的取舍。是否在《东方红》里唱《游击队歌》,当时有不同意见。有人觉得,这首歌过于轻松,抗日、跟鬼子斗争哪有那么轻松?总理却认为这首歌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情绪,好听,群众爱唱,当时对动员学生参加革命起了很好的作用,是人民批准的作品。总理还说:有的时候需要雄壮的东西,有的时候也需要轻松的东西,有刚有柔,有统一也要有变化,革命是广阔的,革命的感情也应该是丰富的。

在那短暂而紧张的两个月里,我不仅一次又一次聆听了周恩来总理的精辟见解,更加深深感受着总理的人格力量。总理从来不认为自己的话是金科玉律,反而常说:我生活在这个社会上,对很多问题不能没有感触,我也有看法,但不一定是对的。我说错了,大家议论改正,说得不充分,大家补充,说得对的供大家参考。人不可能不说错话,不做错事,我谈这些问题,就是提倡互相切磋,造成民主的气氛。

徐:可以说,正是周总理这种民主的领导方式,造就了这部不朽史诗。

周:我再给你讲个小故事,你就可以知道周总理的工作是多么的细致。一次,周恩来总理邀请来中国访问的日本芭蕾舞团清水正夫和松山树子,一起到人民大会堂《东方红》演出的后台。我也陪同。参观中,松山树子提出了一个灯光设置上的技术问题,她以为,这样的问题,肯定是陪同参观的技术人员回答了,可是没想到,周恩来总理随口就解答了她的问题。她很惊奇,一位总理怎么会了解这么细小的事情呢?当她知道,整个大歌舞都是在周总理细致入微的关怀指导下完成的时,松山树子泪光闪闪,她说:“你们是幸福的,只有你们中国才有这样的总理啊。”的确,能在周总理领导下做工作,我们真是幸福的。

四、周总理的领导作风

徐:我记得您曾在一篇文章中说到领导的工作作风问题:“领导和被领导的互不理解是很麻

烦的,领导老怕底下出事,被领导的也老不知道上边有什么东西下来。……有人说在我领导下就没有这个顾虑。我当年在周总理面前也没有什么顾虑,因为周总理有话讲在当面,不隐蔽自己的观点,被领导者就心中有数,大胆放手去干。我知道他会对一些事有意见,但是他从来不强迫人接受意见。周总理还有一个特点,是对艺术家比较宽容的,而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却是十分严格的。”读这段话,我有这样的感受:一、周总理的工作作风的确给您很深的影晌;二、这种影响也直接形成了您的那种在别人看来在您手下工作没有“顾虑”的感受。

周:你说的这段话,的确是我亲身的感受。谈到周总理的领导艺术,或者说是工作方法,有很多话题。这里我只谈谈周总理给我三次来电话的事情。

第一个电话是在1963年。1963年,文化部组成了一个小型艺术团,准备赴日本访问演出,临行前照例要请周总理和其他有关领导审查节目,其他都顺利通过,只有曲艺演员杨乃珍的打扮出了点问题。她穿了一件大红旗袍,旗袍的门襟上还绣了只金光闪闪的凤凰,一条黑亮的大辫子搭在胸前,这打扮可说是端庄富丽。可是演出结束,有的领导干部提出来,说一条大辫子是旧社会的女子发式,凤凰也有封建色彩,这么打扮合适吗?我当时是不同意这种看法的。我当时就说:我几次去云南就看到有些姑娘是一条大辫子,广东妇女也有这样梳辫子的,这是妇女们的审美趣味表现,谈不上什么封建不封建。可是杨乃珍经人家一说,虽然没有决定改妆、换服装,可心里却开始打鼓了,她害怕自己的打扮有损新中国的形象。带着这种忐忑的心情,杨乃珍随团出发了。

她们先到广州,然后由香港转道去日本。杨乃珍没有想到,她到广州的那天夜里,领队就向她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告诉她要大方、端庄,说大辫子和凤凰是中国传统风格,不是旧社会的打扮。一下子,杨乃珍心里踏实了。可她哪里知道,为了传达这几句话,我却忙活了大半夜。

就在艺术团出发的当天夜里,我接到周恩来亲自打来的电话,他说审查节目的时候太匆忙,没有仔细谈他们的安全问题,林林同志对日本很

熟悉,也有不少日本朋友,希望他多关心团员的安全,不要单个人出门。另外,有人给杨乃珍提了意见,恐怕她会有顾虑,也要做做工作,大辫子是中国的传统风格嘛。最后,他似乎还提到杨乃珍演唱评弹《晴雯之死》时,要强调晴雯的反抗精神。

接到总理的电话,我马上行动,先找广东省,再查广州市,曲曲折折,才找到艺术团的驻地,等我向林林同志传达完周总理的指示,已经是后半夜了。

第二个电话是在1964年,也是夜里打来的。

这一年,海政话剧团排演了一部反映非洲人民革命的话剧《赤道战鼓》。我陪同周总理看了这出话剧。可能是总理看过话剧的第二天的夜里,我在解放战争时期落下的头痛病又发作了,疼得在床上翻来覆去,十分难受,忽然电话铃响了,我知道这么晚来电话准是找我的,极有可能是周总理。可我实在一下子起不来,就让我的夫人王昆先接一下电话,果然,是周总理。我强打精神接过电话,总理说:“我是周恩来,你查一下,《赤道战鼓》里有个情节,非洲黑人革命者学《毛选》,你看看是在斗争前学的呢,还是在斗争中学的?”

放下电话,我明白了总理的意思,周恩来一直反对大国沙文主义,也不同意“革命输出”,他觉得如果黑人是在革命前学习《毛选》,就有一种“革命输出”的味道,而在革命中的相互借鉴就另当别论了。

接到这个电话,我不顾疼痛,赶忙连夜找人查询,连夜给周总理回电话。

徐:您病成那样,不能第二天再找人询问吗?

周:总理交代下来的事,我从来都要马上去办,而且一定做好。我有个感受是,对于他交办的事情做不好,就觉得对不起他。你可能不理解,这不光是一种工作关系,更是一种感情的联系,这就是我常说的“情系周公”。其实,并不仅仅是我有这样的想法,还有很多艺术家同周总理之间都有一种深深的感情联系,那是一种相知、相融、相通的感情联系,为了这种感情,很多人会愿意为周总理赴汤蹈火,而周总理,也时时关怀着每一个人。周总理对曹禺的关心,就让我感触良深。

话剧《文成公主》演出之后,有一次在民族文化宫举行了个宴会,宴会上自然而然又谈到了民族关系问题。曹禺自告奋勇地说,他想写一个《王

昭君》。周恩来兴奋地说:“家宝,写好它。”

过了段时间,周恩来想起了这件事,他知道我和曹禺的关系比较好,就找到我说:“你去看看家宝写到什么程度了,去看看就行,别催他,家宝是慢工出细活。主要看看他身体怎么样,不要因为赶写戏把身体累坏啦。”

我不动声色地去“侦察”了一下曹禺的写作进度,表达了总理对他的关心。周总理的细致,对艺术家深刻的了解。

周总理给我打的第三个电话,也是像朋友那样请我去关心一下另一位艺术家。那是在1965年。

由于各自的工作太忙,我和王昆是一个住在和平里东方歌舞团,一个住在文化部宿舍,只有星期六才共谋一聚。那个星期六,我到王昆住处那里,碰巧又让煤矿文工团的同志撞上,非拉着我到团里排演厅去帮着审查节目,因为那时所有中央领导审查节目,我常常是陪审的,所以许多文工团的节目都愿意在中央领导审查之前,先让我过目,提提意见。节目开始没多久,忽然有人来叫,说总理来电话找周巍峙。

这次电话是为舞蹈家白淑湘。总理对我说,前几天白淑湘不知什么地方得罪了江青,江青一直不依不饶,说她的立场有问题,还牵扯上家庭出身问题,白淑湘感到压力很大。周总理让我告诉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林默涵,让他找白淑湘谈谈,给她做做工作,说如有缺点改了就是,家庭问题和她无关,如不信任她,就不会让她首演《天鹅湖》和《红色娘子军》的主角了。总理还让我给芭蕾舞团打招呼,不要扯她的家庭历史问题,去掉她的压力。

我用最快的速度分别转达了周总理的指示后,又到芭蕾舞团了解情况。原来,前几天在江青拍《红色娘子军》剧照时,白淑湘并没有什么错处,而是江青突然变脸,不高兴,有意找茬儿。我又把了解的情况侧面向总理作了汇报。

徐:1965年,江青已经开始在文艺界兴风作浪了。

周:转过年就“文化大革命”了,我也成为“黑线人物”了。我和周总理见面的机会也没有了。最后见到总理,竟是去北京医院向周总理遗体告别。我清楚地记得,遗体就停放在北京医院一间

并不宽敞的告别室里 ,瞻仰遗容的人很多 ,队排得很长 ,我在寒风中等待了很久。最后见到总理遗容时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又黑又瘦 ,这还是他吗 ? 我的心脏急速地跳起来 ,感到腿软了 ,眼前金星也乱进 ,只能对自己说 ,坚持着 ,坚持着。我忘记了是如何走出那狭小的灵堂的 ,而总理黑瘦的脸庞和连成片的老人斑 ,却一直在我

的眼前晃动。那天 ,我的夫人王昆和二儿子(大儿子那时不在北京)一定要一起去。他们一直在医院门前等着 ,企求进去 ,给他们再看一眼总理的机会 ,可是没有得到允许。我出来后 ,向她们描述了总理最后的样子 ,一家人就在医院门口痛哭失声 ,久久不能停止。■

(责任编辑 洪振快)

书 名	作者或主编	定价	邮 费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	150.00	12.00
苏联真相——对 101 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陆南泉黄宗良等	246.00	20.00
难忘一九五〇——志愿军入朝参战 60 周年图文实录	丁 伟	48.00	7.00
中国国情读本	中国年鉴社编	30.00	6.00
我这九十年——一段革命家庭的私人记忆	任均口述王克明撰写	38.00	7.00
国学大师之死	同 道	29.00	7.00
人生三路向 :宗教、道德与人生	梁漱溟	28.00	6.00
走向革命 :细说晚清七十年	雷 颐	29.80	7.00
最后的皇族	龙翔 泉明	38.00	7.00
我与中国民主同盟	梁漱溟	43.00	8.00
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杨奎松	88.00	10.00
何方谈史忆人 :纪念张闻天及其他师友	何 方	39.80	7.00
直译中苏高层会晤	顾达寿口述 郑少锋执笔	28.00	6.00
党员、党权与党争	王奇生	48.00	8.00
望九琐忆——一位老者的 20 世纪	白永达	22.00	6.00
底层的叩问——肖复兴人生笔记	肖复兴	25.00	6.00
国家记忆	章东磐	98.00	10.00
地狱门前——与李真刑前对话实录(内部发行)	乔云华	58.00	8.00
王光美私人相册	罗海岩编著	42.00	7.00
共和国大审判(二)——特别法庭内外纪实	王文正口述 沈国凡采写	38.00	7.00
蓝衣社——中国法西斯运动始末	丁三著	32.00	7.00
大国悲剧 :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	49.00	8.00
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	金以林著	48.00	8.00
红墙知情录(一二三)	尹家民	95.00	10.00
历史 :何以至此	雷 颐	28.00	6.00
直言无悔——我的“右派”经历	徐 孔	29.80	6.00
一个国家的崛起与崩溃	沈志华主编	148.00	12.00
苏共亡党十年祭	黄苇町	26.00	7.00
三野名将	吴东峰	28.00	7.00
四野名将	吴东峰	28.00	7.00
张闻天在 1935~1938	张培森主编	17.00	6.00
张闻天与二十世纪的中国	张培森著	20.00	6.00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 :蒋介石日记解读	杨天石	60.00	8.00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 :蒋介石日记解读	杨天石	38.00	6.00
“中间地带”的革命	杨奎松	54.00	9.00
抹不去的记忆 :老三届新三级	张 琦主编	48.00	9.00
牛棚杂忆	季羨林	29.00	7.00
烙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集体记忆	林贤治主编	38.00	7.00
中南海人物春秋	顾保孜	78.00	7.00
元帅大将的最后岁月	李立宁 孟新	48.00	7.00
历史大转折中 22 个首任省长、市长和自治区主席纪实	孟庆春	49.80	7.00
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注解集评	侯井天	98.00	11.00
沧桑十年——共和国内乱的年代	马识途	38.00	7.00
1957 年的夏季 :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	朱 正	26.00	7.00
三十年河东 :权力市场经济的困境	杨继维	39.80	8.00
庐山会议实录	李 锐	18.00	5.00
潜规则 :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	吴 思	28.00	6.00
血酬定律 :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	吴 思	28.00	6.00
无声的群落——文革前上山下乡老知青回忆录	邓 鹏	97.00	10.00
《名家书札与文坛风云》	徐庆全	45.00	7.00
国史札记(史论篇)	林蕴辉	38.00	7.00
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	萧 克 李 锐 龚育之等	28.00	7.00
流逝的岁月——中央党史研究室前副主任李新回忆录	李新著 陈铁健整理	39.00	8.00
官场怪圈定律	李茗公著	46.00	8.00
走出个人崇拜	冯建辉	16.50	5.00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薄一波	88.00	11.00
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	张秀山	43.00	7.00
夹边沟记事	杨显惠	34.00	7.00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	沈宝祥	39.80	8.00
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	戴 煌	21.00	5.00
1978 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	于光远	36.00	7.00

代购代邮

《潜规则》 一本普及读物。作者对历史准确的剖析 ,为我们打开了中国传统历史真实游戏规则的秘密。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 一场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讨论 ;一场突破禁区与僵化的思想解放运动 ,身处核心地带、参与和直面大讨论的亲历者 ,以第一手资料回顾 30 年前的讨论内幕。

《烙印》——“可以教育好子女”的集体记忆 1949 年后的多次政治运动 ,积累了一批又一批“阶级敌人”和“阶级异己分子”。“以阶级斗争为纲”人为地制造种种敌人并实行专政 ,不但“黑五类”分子受到严厉的制裁 ,连他们的子女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和打击 ,有的被迫害致死。他们带着屈辱和创伤生活在那个年代 ;他们被施以暴力或遭受凌辱 ;那种近乎“生而有罪”的困境使他们因家庭关系在政治上遭受不公平的对待 ,历尽坎坷……

本书分别记述了他们不同的身世故事 ,表达了对抗遗忘的集体意志和社会变革的共同渴望。

《“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 本书比较完整和系统地讲述了中共夺取政权的决策过程和影响其决策的种种复杂的内外因素的作用。它清楚地说明 ,中共革命的成功和新中国的由来 ,很大程度上都是得益于整个世界大环境和国际政治理念的改变 ,包括俄国革命、二战及战后国际关系的改变 ;得益于毗邻的共产党政权的大力援助。具体到中国 ,对于正在崛起的毛泽东来说 ,还离不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日本入侵的影响。否则的话 ,在接连遭遇了 1927 年和 1934 年惨重失败的中共 ,何以能由极度弱小而一步步壮大 ? 原本足够强大的国民党 ,何以会一步步削弱、瓦解 ,以至于无法适应战后的新形式、新条件 ,最终竟被中共所推翻 ?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 蒋介石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人物之一 ,2006 年 3 月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首次开放蒋介石日记 ,作者阅读了蒋介石日记的手稿本 ,复以各种文献、史料比证、勘核 ,对于人们一直想知道又得不到正确答案的历史议题廓清迷雾。寻找真实的蒋介石 ,正确评价其功过是非 ,揭示其本相 ,对于正确认识历史上的国共关系 ,正确认识和书写中国近代与现代的历史是必要的 ;对于建立两岸的和平关系 ,实现中华民族的和解与和谐也是必要的。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 69 号

邮 编 :100045 收款人 北京炎黄春秋杂志发行部

(注 邮购三本书以上 ,可按总书价的 10%付邮费)

我参与王佩英平反工作的回忆

○ 张松林 口述 郭宇宽 整理

我是河南人,家在郑州边上的荥阳,穷苦人家的孩子,出身好。解放后,大概别人看我比较老实,1952年被选送铁道部专运处当保卫员。专运处是专门为最高首长服务的,主要是毛主席专列,还有刘主席、朱总司令,他们出行都是由我们负责,有苏联专家来培训我们,要我们为了首长的安全不怕牺牲。

我们工作有一条纪律叫做“知道的不能说,不知道的不能问”,所以我在文革中几乎没有参与,也没有受到什么打击,就是给下放了几次,有一次还是陪滕代远部长。

到了文革结束以后的1977年,在胡耀邦同志的大力推动下,铁道部也成立了“落实政策办公室”,把我抽调来参加落实政策工作。我想组织上选我的原因,是因为我在专运处,基本上没有参与文革,没有牵涉到派性问题。我们当时一个小组3个人,除了我,一个代明德,一个李志克,负责铁道部专业设计院的落实政策工作,我是最年轻的,当时大概40岁左右,人家叫我小张。当时耀邦同志推动的力度非常大,我记得听他说“不仅文革中遭受迫害的同志要给落实政策,还有延安时期、长征时期等一系列冤假错案也要给落实政策”。我当时都没有想到,原来还有这么多冤假错案啊。

我们在专业设计院很快就了解到了王佩英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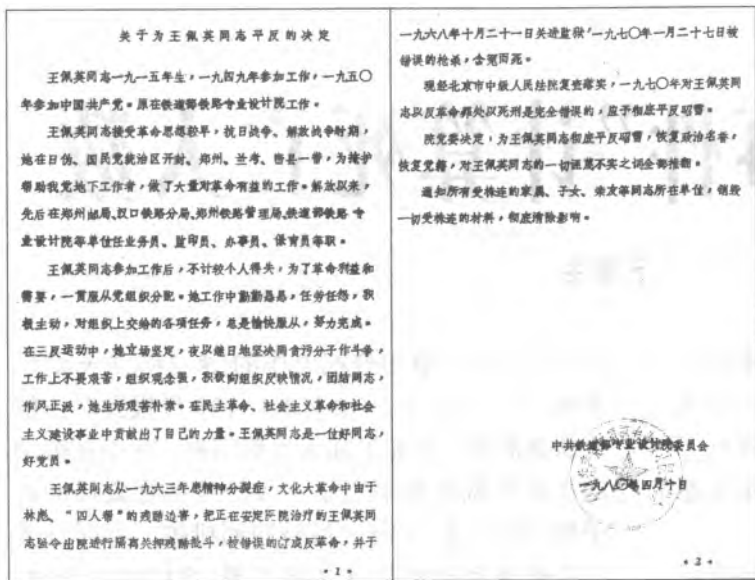
王佩英,生于1915年,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帮助从事地下党工作的丈夫张以成做了大量工作,1949年郑州解放后先后在郑州邮局和郑州铁路局秘书室工作,1950年成为中共党员,1955年随张以成调入北京,在铁道部工厂设计事务所托儿所、铁道部专业设计院托儿所任保育员,60年代后认为大饥荒等重大失误应由毛泽东负责,张贴“毛泽东应该退出历史舞台”之类的

标语,因而遭受残酷迫害,1970年初被判处死刑,同年1月27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公审”后遭杀害。(关于王佩英的事迹,详见本刊2010年第5期《寻找王佩英》一文——编者)

最先是一个叫林克明(文革前曾任铁道部专业设计院航察处处长,文革中被打成“走资派”,1968年曾是王佩英“牛棚”难友)的大姐跟我反映,说王佩英可真是冤案啊,他们家孩子多,太可怜啦,组织一定要管啊。初步了解了情况,我们就前后召开了两次群众座谈会。我们工作组有纪律,一是不能记人家名字,二是不能发表意见,要让群众畅所欲言。当时对王佩英的观点有鲜明的两派,不能统一。一派意见是说,王佩英好冤啊,佩英是个好同志啊,还有人讲王大姐被关押,被批斗中受到了惨无人道的折磨,一个叫王××的造反派,几次下狠手打王佩英,还有一个叫林××的女同志,拿烟头烫王大姐,法西斯作风啊。另一派就说,王佩英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还不算现行反革命啊?别人就说,人家王大姐就是否定毛主席的部分文革政策,也不是全部否定毛主席啊。造反派一边就说,她都公开喊“打倒毛主席”了。我记得在第二次座谈会上,有一个人,撂下一句话:“她不算反革命,还有谁是反革命。”就摔门出去了。

群众意见不能统一,我们工作组就很犯难了,我们组长说,你看这事情咋办呢?她都喊“打倒毛主席”了,这事怎么定性呢?

我当时听了群众的反映,就对王大姐有特别的同情。她有两条言论,说到我心坎上了,一条是说她坚持讲“我是河南人,我老家就是饿死人啦”,这是她后来一个罪。是反对三面红旗,给无产阶级司令部抹黑。我家也在河南,1960年,我爸从老家来投奔我,关着门跟我说,我是来逃荒的,老家连树皮都给扒光了,到处都是死人,民国



王佩英平反文件

闹饥荒也没这么厉害啊。我们家有 13 亩地，都叫充公了，现在毛主席是最大的地主了吧。我爸问我，毛主席是不是光顾自己坐金銮殿，不管老百姓死活啦。我赶快堵他嘴，说你可不能出去乱说，给人听见就坏了。

还有一条，是王大姐跟别人说“彭德怀为民请命，是大好人”。她还说“毛泽东是卸磨杀驴啊！”这个话，我一听就明白了。我们河南人最爱说这个话，说谁不仗义，就说，他卸磨杀驴啊。其实文革中我也有这个想法。罗瑞卿当年是我的顶头上司，对毛主席那是忠心耿耿啊，结果给打得腿都断了，装在箩筐里抬出来批斗，谁看了不寒心啊。滕代远，那是参加平江起义的老革命，就是沾了彭德怀的边也靠边站了。彭大将军给毛主席立了多大的功啊。所以“卸磨杀驴”这个话就在我心里打转，就是不敢说出来。王大姐给说出来了。

有这个说不清的感情在，所以我想怎么都得给佩英大姐平反昭雪。我就说，组织上给我们这个任务，来落实政策，群众又有反映，我们不能半途而废，至少也要把情况搞清楚。要不我来跑这个事情。大家一核计，好吧，正好小张，你有自行车，你就跑这个事情吧。

我跑了两趟安定医院，找到了那个主治医生，他跟我说王佩英是有神经官能症，不是精神病，当年专业设计院把她送来的时候，刘海燕院长特别说我们是为了保护她啊。后来我本来意见是说，可以继续治疗，可上面一定要把她交出来，

那是逼着我签字的啊。

我还找了公安局，接待我的同志态度很客气。他大概以为我是代表单位来找公安局麻烦的，一见我就说“我们逮捕王佩英，可是因为有群众举报，我们的手续都符合政策啊”。还说“我们可没有虐待王佩英啊”。当然，那是他的说法。我说我们单位都炸锅了，现在就是来找你们落实政策的。我一共去了两次，最后公安局的态度是说，这个事，他们办不了，要我去找法院。

我又去找法院，法院一个男的和我年龄差不多，我也找了两次，后一次，他给我一个文件，说经过研究，免予追究刑事责任。我不干了，我说你们应该平反昭雪才行啊，人都叫你们枪毙了，什么叫免予追究刑事责任啊。他训斥我不懂法，吵起来，最后让我出去。

不过至少有了这个说法，我们回去就可以落实政策了。当时刘建章部长，一听说王佩英这个事情，就说这个同志我认得，她在郑州局跟我干过，做机要保管员。当时的文件稿都是我起草的，当时我们讨论过，因为王佩英的处理留了个尾巴，没有被评为烈士，所以不能叫抚恤金。当时我们一共凑了三笔钱，一笔是铁道部有个老干部苦难补助基金，最高标准 3000 元，我们就按最高标准领出 3000 元，我又找刘海燕院长请示，铁道部拿了 3000 元，研究院是不是也出一些，刘院长说没问题，我们也出 3000 元，再加上佩英大姐被关押期间被扣的工资，算起来大概 1000 元左右。这样加在一起，我们一共凑了大概 7000 元，给了佩英大姐的子女。

最后给佩英大姐的平反追悼会，也主要是我操办的，我记得有几个标准：一是刘建章部长出席；二是在八宝山办；三是铁路系统各单位要派代表参加，总人数要超过 300 人；四是《人民铁道》报要发消息。

通讯稿是我写的，我文学水平也不太高，但很动了感情，用了很多词语，比如违法之徒的迫害、惨无人道的折磨等等，最后都给删掉了，只给发出来大概 100 字的小消息。■

（口述者为铁道部专运处退休干部）

（责任编辑 洪振快）

我为“遵义事件”计算死亡人数

○ 王录生

1959~1961年的大饥荒，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悲惨的一页。我们经历过这场灾难的人是刻骨铭心的，是再也不会忘记的。“饱饱地吃上一顿白米饭”，这是当时我在那几年里的最大愿望。现在看来好像很可笑，但那是真实的。

《炎黄春秋》2010年第8期曾刊登当年贵州省粮食厅厅长王民三同志的《1959~1960年贵州粮政日记》，其中写到1959年12月19日“党中央召开紧急救灾电话会，彭真主持……彭讲话态度严肃，语气很重，说省里死了人是一个省的问题，北京死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要求顾全大局保北京……”当然，省里要保省会，地区要保地区首府。笔者当年在贵州省遵义专员公署计委工作，靠了这一条，我虽然也饿得患了“浮肿病”，但总算捡了一条命。可怜的是广大农村的农民。

贵州省也是重“灾”区。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曹树基教授的一项研究，以1050种地方志中关于人口的统计数字为基础，认为21个省（按照清代的政区）的“非正常死亡人口”为3245.8万人（见曹树基：《1959~1961年中国的人口死亡及其原因》，刊于《中国人口科学》2005年第1期，详见附表）。其中，贵州全省死亡174.6万人；死亡率10.23%，位列全国第三。笔者所在的遵义地区是重中之重。已经记入历史的、被称为“遵义事件”的死亡人数就是由笔者计算的。

我是1958年中南财

院毕业，10月中旬分配工作的（原留校，因大跃进，贵州去要人，我是被补分配到遵义），21日报到时正值大跃进高潮。参加了几天大炼钢铁。我参加劳动的土高炉就建在刚成立不久的地区物资局的院子里（现遵义会议广场），后被叫回机关。那时计委的工作也十分紧张，天天要加班（编计划）。开始，机关食堂的伙食很好，四菜一汤，白米饭尽吃。后来办公共食堂，8人一桌，围着吃。先是一个大木桶装饭，大家随意打。后来不行了，改吃“大头稀饭”（干稀饭），还是敞开吃。再后来，变成稀饭。因为大家抢，有时把稀饭洒在人的身上、头上，就改为吃罐罐饭，按人定量。机关干部的口粮定量也逐渐减少到每人每月21斤。因为定量太少，又长期没有肉、油吃，肚子很快就饿了。上级要求食堂设法“多出饭”。机关干部轮流监厨，看着炊事员

1958~1962年全国各省灾区非正常死亡人口

省名	全部府数	灾区府数	全部县数	灾区县数	灾前人口(万人)	非正常死亡人口(万人)	比例(%)	排序
安徽	13.0	13.0	74.6	73.6	3446.0	633.0	18.37	1
四川	26.0	23.0	201.0	188.0	7191.5	940.2	13.07	2
贵州	16.0	15.0	81.0	74.0	1706.4	174.6	10.23	3
湖南	17.0	17.0	96.0	91.0	3651.9	248.6	6.81	4
甘肃	13.0	12.0	108.0	87.3	1585.7	102.3	6.45	5
河南	13.0	13.0	128.7	106.7	4805.8	293.9	6.12	6
广西	12.0	12.0	75.0	72.7	2009.9	93.1	4.63	7
云南	22.0	22.0	132.0	112.0	1918.3	80.4	4.19	8
山东	12.0	12.0	140.0	126.0	5343.5	180.6	3.38	9
江苏	12.0	11.0	84.0	63.0	5296.3	152.7	2.88	10
湖北	11.0	11.0	79.8	72.6	3074.9	67.5	2.20	11
福建	11.0	11.0	70.0	56.0	1517.9	31.3	2.02	12
辽宁					1931.0	33.0	1.71	13
广东	15.0	12.0	110.0	72.0	3839.3	65.7	1.71	14
黑龙江					1564.0	19.0	1.21	15
河北	18.0	17.0	183.0	135.0	5544.6	61.0	1.10	16
江西	14.0	13.0	89.0	51.0	1713.6	18.1	1.06	17
陕西	12.0	4.0	101.0	30.3	1832.0	18.7	1.02	18
吉林					1280.9	12.0	0.94	19
浙江	11.0	10.0	91.0	51.4	2570.3	14.1	0.55	20
山西					1621.1	6.0	0.37	21
合计	248.0	228.0	1844.1	1462.6	63474.9	3245.8	5.11	

说明：(1)江苏松江府（包括上海）、浙江温州府、江西袁州府、广东高州府、雷州府和佛冈厅，贵州普安厅、四川懋功厅、杂谷厅和松潘厅、河北（直隶）口北三厅、陕西西安府、干州、邠州、鄜州、同州府、延安府、绥德州、榆林府、甘肃庆阳府等20个府未经历灾荒。(2)清代“府”境辖1953年的县，因县有合并分析，故有小数。

分米装罐。又要求“生产自救”。因为是地委、专署的机关食堂，安排了用大米加工糖稀的任务，留下糖糟加到面粉中做馒头（机关干部轮流当工人，我也去做了一个月的糖厂工人）。还做过“连泡霉”，在水里养“连泡霉”菌，将其掺到馒头中。有一次，遵义市的赵一曼饭店“发明”了一种增加粮食的办法，我随领导去验收，才知道是在面粉中加进磨细了的谷糠粉，做馒头。推广了一阵，后因解大便困难才停止。那时，因为饥饿，我和很多机关干部一样都得了浮肿“病”。1959年秋冬，农村吃树皮、死人、甚至人吃人的消息已开始悄悄传播。

后来，上级要求机关工作尽量减少，以“保命”为主。我就利用这段空闲时间将前一段工作中积累的数字，编成《遵义地区国民经济统计资料汇编（1949~1957年）》（后内部出版）。

有一天，计委副主任吴山同志把我叫到办公室，单独交待任务，非常严肃地对我说：“王录生，现在组织上交给一个政治任务，你到遵义宾馆去，那里正在开‘县书’（县委书记）会议，他们都带来了现有的人口数，你去计算一下各县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是多少。这件事不得告诉任何人，包括你的家人，做完以后就把它忘掉。有没有什么困难？如果没有，你马上去。”我边听边盘算，接受了这一任务。

在那本《资料汇编》中，已经收集了各县分年的年初人口、年末人口、出生人口、死亡人口等，并计算了各地各年的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等。应该说1957年以前的各种统计数（包括人口数）是比较准确的，根据这些资料，可以用1952~1957年正常年度平均的出生率、死亡率，计算出正常情况下，现在应有的人口，再与县委书记们带来的实际人口数相减，就是非正常死亡人口了。那时人口迁移是非常少的，大跃进中从各地农村抽调去“大办钢铁”、“大办水利”等的劳动力已先后回到了原地。人口的机械变动可以忽略不计。出生率，由于饥饿，也是要下降的。1960年为零，不予计算，1959年和1961年只计正常出生率的三分之一。我按以上办法计算的饿死人数，可以说是基本准确的。

我把各县的饿死人数计算出来后，立即送给领导，连一张纸都没有留。我怕泄密，数字也不敢往脑子里进。只是当我将遵义地区各县的现有

人口加起来，只有310多万人时，大吃一惊，因为1957年末人数是370多万人，这个数字我是经常用的，所以印象非常深，想忘也忘不了。

这件事，一方面我觉得是领导对我的信任，另一方面，又怕因泄密，犯错误，成为我此后的一个心理负担。

直到“文革”开始，有一天，有同事从街上回来，说地委造反派贴出了一张大字报，揭发李苏波（“遵义事件”前的地委书记）罪行，公布了从档案中找到的“遵义事件”饿死的人数。我立即赶去看，看到的就是我计算的那组数字，才松了一口气。因为，此后我不再有犯泄密错误的可能了。但是李苏波这个“死老虎”，并不能引起造反派的兴趣。他们要打倒的是正在走的“走资派”。新的大字报很快就把这组大字报覆盖掉了。

“遵义事件”后，撤销了李苏波的地委书记职务，枪毙了湄潭县（遵义地区死人最多的县）的一个县长。（湄潭县的事，见《炎黄春秋》2007年第11期《贵州湄潭事件》一文）。“遵义事件”的后果是很严重的。记得第二年春耕时，抽调地专机关的干部去农村帮助插秧。我参加了去遵义县新卜区一个生产队的插秧。该队90多个人，饿死了一半，只剩下2个大男人（一个生产队队长，一个生产队会计）。就由他们两人犁田，我们机关干部帮助插秧（当地妇女不下田），可见农村饿死人的惨状。

半个世纪以前的大饥荒，虽然已经过去，但是只要一提起，往事仍然历历在目，记忆犹新。这一段惨绝人寰的历史，不应被后人忘记。■

（作者为贵州省政协原副主席）

（责任编辑 洪振快）

启 事

《炎黄春秋》杂志尚有少量过期刊物零售，有需要的读者可电话咨询购买。

联系人：崔秀岭 手机：13611159388

电话（传真）010-60342528

汇款地址：北京市102488信箱

3分箱

收款人：崔秀岭 邮编：102488

吴江在拨乱反正中

○ 沈宝祥

吴江同志是我的老领导。

在兔年来临之际,我和二位同志一起去看望了他。94岁的吴江同志精神很好,思路清晰。我们一起回忆往昔,颇有感慨,也很愉快。我早有写吴江之意,这次会见,促使我立即动笔,将我经历和知道的事,略加叙述。这既是讲公道,也是还原历史。

一、揭批“四人帮”,发表高水平的文章

在“文革”期间,我就听说吴江同志来到了中共中央党校,但无缘谋面。粉碎“四人帮”之后,胡耀邦同志在1977年3月来中央党校主持工作。4月7日,由耀邦同志主持的中央党校整风会议开始,吴江和我都是参加者,但我们之间仍没有接触的机会。

整风会议开了一个来月,与会者揭发了许多问题。胡耀邦在5月5日的会议上,在充分肯定会议的成绩后指出,会议也有不足的地方,从思想、理论、政治上批判不够。他说,只有从思想、理论、政治上深入批判,才能在毛主席路线下搞好教学工作,不犯或少犯大的路线错误。必须要通过自己的批判,才能弄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

在5月5日下午的整风会议全体会议上,吴

江同志就作了长篇发言,批判“四人帮”搞“批儒评法”的反党阴谋活动,他列举历史事实,揭露他们“歪曲历史,把古代史按照自己的需要重新塑造,把古代史现代化,用来影射说明他们要说明的问题”,为打倒以周总理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和大批老干部制造舆论。吴江的发言有理有据,分析深入透辟,提高了会议的水平,使与会者受到了很大的启发。胡耀邦很赞赏他的这个发言。《中央党校简报》第35期作了详细报道。

吴江以这篇发言为基础,写成题为《现代复辟派和古代变革史》的文章,在《红旗》杂志第6期发表。6月4日《人民日报》从第一版开始,第二版整版,直到第三版,全文转载这篇文章,对深入揭批“四人帮”起了推动作用。

6月4日上午,整风会议开全体会。会议开始,胡耀邦就说:今天早晨广播了吴江同志那篇文章的摘要,今天《人民日报》转载了。那篇文章是长文章,一万一千多字,希望各个组各个教研室好好看。据我看,我们批判“四人帮”,从思想理论上肃清他们放的毒,远远没有肃清。今年一年,明年一年,要好好清算“四人帮”在各个方面反革命的谬论。在批判他们的谬论中来提高我们自己。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破修正主义的东西,立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这就要求我们一面学习,一面研究材料。学马克思主义,一面要研究收集资料,下苦功,一篇好东西,有说服力,是要下苦功

(上接第44页)即便文化上采取保守主义的立场,也未必意味着不能在政治、经济方面认同其他的价值。2011年1月刚刚去世的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即是一例。作为现代美国批判社会学和文化保守主义的重要代表,他自称自己是“经济上的社会主义者,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者,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事实上,现代儒学甚至《学

衡》派的经验都充分表明,认同儒学的核心价值 and 追求民主宪政,两者非但能够完全并行不悖,而且更可以相得益彰。

(作者为北京大学哲学系/高等人文研究院教授)

(责任编辑 洪振快)



吴江(左)、沈宝祥近照

的。我们一定要按照毛主席教导我们的、《五卷》413页上说的,现在有些文章,神气十足,但没有货色,讲不出道理,没有说服力。“四人帮”搞的许多文章就是装腔作势,是吓人的东西,并没有什么货色。吴江同志这篇文章据我看,很有说服力,他是下了苦功夫的。

在后来的一次会议上,胡耀邦说,吴江同志的文章我是报告了华主席、叶副主席的。由此足见胡耀邦对这篇文章的重视。

二、理论上拨乱反正的第一个行动

1977年7月12日,胡耀邦召开小型理论座谈会,讨论中央党校复校开学后,怎样辅导《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学习问题。吴江作了关于继续革命问题探讨的发言。胡耀邦很赞赏吴江的这个发言。

当时,胡耀邦正和我们一起筹办《理论动态》,已经准备了几期稿子,但还没有比较理想的创刊第一期文章(当时已决定每期刊登一篇文章)。听了吴江的发言,胡耀邦立即决定以吴江的发言为基础,写成文章,作为《理论动态》的第一期文章。他对吴江说,把你的发言写成文章,在《理论动态》第一期刊登,行不行?吴江回答,行!胡耀邦又转身对我们说,现在第一期的文章有了,7月15日出刊,以后5天出一期,逢5逢10,

风雨无阻。

7月15日,《理论动态》第一期出刊,刊登的就是吴江的文章:《“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这篇文章对当时还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继续革命理论”提出探讨,实际是质疑。文章认为,继续革命的主要对象应是技术革命。文章说:“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不首先抓好技术革命是不行的。”这同当时领导人讲的是另一个调,问题异调。文章还指出,认为继续革命就是不断反右,这不是毛泽东思想,文章说,现实情况是有“左”,也有右,应当是有什么反什么。这篇文章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否定“继续革命理论”,但提出探讨的几个问题,都是这个理论的要害。

《理论动态》创刊号发出以后,首先在中央党校引起强烈反响。在7月19日召开的第二次小型理论座谈会上,胡耀邦说:我们本来是讨论五卷的辅导问题,吴江同志提出如何理解继续革命问题。这个问题提得很好,是五卷的中心问题,对我也很有启发。吴江同志,再写他一篇嘛!胡耀邦又说:对吴江同志那一篇听说议论纷纷,这是好现象。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我是没有完全弄懂。探讨,继续研究,是好现象。理论问题要探讨,争论,是好现象。马克思讲,科学的入口处,好比地狱的入口处。胆怯没有用处。

胡耀邦将这一期《理论动态》送邓小平。胡耀邦说:小平同志完全同意这篇的观点,这是我和小平同志在理论问题上的第一次接触。我还记得,在《理论动态》第一期发行几天之后,我和孟凡同志两个人在办公室,孟凡接了一个电话,他放下电话后高兴地对我说,老沈,这是中央办公厅来的电话,说小平同志看了《理论动态》后说,基本同意文章提出的问题。以后,孟凡将这件事写进了向校委汇报的“汇报提纲”。

胡耀邦后来回顾这篇文章时说: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开始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口号。1977年7月吴江写了一篇短文《“继续革

命”问题的探讨》，提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继续革命的主要内容应是文化、技术革命、生产力的革命。1977年7月那时候提出这个论点是不容易的，可以说是理论上拨乱反正的第一个行动。

吴江撰写的《“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一文，胡耀邦称之为理论上拨乱反正的第一个行动，也是推进思想解放的启蒙文章。实事求是地讲中国的拨乱反正史，应当提到这篇文章。

三、牵头撰写关于“三次路线斗争”的提纲

党中央要求中央党校认真总结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经验。1977年12月2日，胡耀邦召开的中央党校党委会专门研究这个问题。胡耀邦指定由吴江牵头，建立一个小组，撰写一个学习文件，定名为《关于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

吴江和小组的同志们紧张地工作，到1978年1月中旬，就写出了第一稿。1月18日，吴江将这个文稿报送胡耀邦审阅。1月20日，胡耀邦就审阅了这个文稿，并写了如下批语：“路子是对头的。只是太简略了。应该意气风发地同时又严密周详地加以充实。现在大约是14000字，可扩充到30000字。”吴江等人经过努力（3月6日吴江与杨西光等六位省部级学员进行座谈，征求意见），于1978年4月完成了这个文稿。

他们在这个文件的“应当遵循的指导原则”部分，提出“应当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这是具有突破性的，第一，明确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第二，实践不但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也是检验路线正确与否的标准。这个文件强调，路线的正确与否，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要由实践的结果来证明。这正是当时问题的焦点所在。因为讨论“三次路线斗争”，就是要解决“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是否正确的问题。

1978年4月，胡耀邦将这个文件作为“征求意见稿”，发给全校高级干部读书班、中级干部读书班、理论宣传干部培训班共八百学员，进行讨论。这是一个大胆的举措。

四、作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论断，并具体指导撰写文章

各个学员小组对这个“征求意见稿”的讨论都很热烈。多数学员同意实践标准，不少同志以实践为标准，检验了十年“文革”，提出了许多尖锐的问题，甚至对“文革”提出根本的质疑。中央党校八百学员的讨论，是彻底否定“文革”的起点，也是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前奏和酝酿。

吴江参加了学员的讨论。他发现，讨论虽然很热烈，但反映出来的情况却相当复杂，不少人认为，毛泽东思想也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即使同意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人，对实践的理解也不很清楚。吴江同理论研究室研究组组长孙长江商量，要写文章进一步阐述这个问题。吴江决定，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题，写一篇文章，他让孙长江执笔。

孙长江刚写出文章初稿，正在征求意见准备修改的时候，《光明日报》送来《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文稿（胡福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修改稿），要求帮助修改并希望在《理论动态》刊登。吴江让孙长江将这两个文稿“捏在一起”，题目还是用原来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孙长江很快拿出一个稿子，吴江做了修改后，即报送胡耀邦审阅，时间在1978年的4月底。胡耀邦约于5月初审阅批回这个文稿。吴江开列校内外专家名单，让孙长江征求意见，再做修改。吴江对这个文稿又做了不少修改。5月6日，在胡耀邦家开理论动态组会议（冯文彬、吴江参加），胡耀邦再次审阅这个文稿，并同大家一起研究，由胡耀邦拍板定稿。这篇文章在《理论动态》第60期刊出，日期是1978年5月10日。《光明日报》于5月11日作为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发表，引发了一场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这场大讨论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基本语言。所谓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实际就是向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宣讲这句话，就是用这句话来推倒“两个凡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将这场讨论称之为

“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吴江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基本观点的概括和表述。这句话,简练、准确、鲜明、通俗、排他性地表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标准。“唯一标准”是这篇文章的点睛之笔。胡耀邦提出,这十几年的历史,不能根据哪个文件、哪个人的讲话,要看实践,这就是讲唯一标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的表述,体现了胡耀邦的思想,又深化了胡耀邦的思想。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已经过去了30多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被历史留下来了,成为党的思想路线的重要内容,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成为他们辨别真伪、判断是非的根本标准。

五、撰写重头文章,有力推进真理标准问题讨论

1978年5月13日,胡耀邦在他富强胡同6号的家里召开理论动态组会议,由《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介绍那个攻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电话内容。在随后的议论中,胡耀邦和大家一起批驳了“凡是论者”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指责,吴江表示要写文章。在很短的时间内,吴江在孙长江协助下,写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文稿。

这个文稿由《解放军报》负责人送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罗瑞卿很赞赏这篇文稿,但要求再作修改加工,他提出的要求是:“立论要稳,无懈可击”。这篇文稿在罗瑞卿和胡耀邦的指导下,修改加工定稿。

1978年6月24日,《解放军报》发表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署名是:本报特约评论员。《人民日报》于同日刊登,新华社全文转发,25日,《光明日报》全文转载。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这篇文章,有16000多字,是全面批驳“凡是论”的第一篇文章,也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的第二篇重点文章。

这篇文章指出,林彪、陈伯达、“四人帮”搞乱了许多基本问题,最值得注意的是两个颠倒:一

个,是在政治上根本颠倒敌我关系;另一个,是在思想上根本颠倒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文章进而指出,思想理论上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不能不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这个问题开始。文章结合历史和现实,阐明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深入批驳了“凡是论者”强加的所谓怀疑论、不可知论、“砍旗”等指责。这篇文章的发表,有力推动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六、在中央党校首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课程

中央党校复校后的第一期高中级干部轮训班,于1978年4月30日结业。1978年5月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开展之时,中央党校正值假期,没有学员。这年6月30日,第二期开学。开学后,从各地来的学员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十分关心,提出不少问题,要求学校给他们讲这个问题。

校领导决定,由吴江给学员讲真理标准问题。吴江做了充分准备,于8月5日向学员讲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这一课。

吴江的讲稿,题目是《关于当前的一场讨论》,共讲了三个问题:(一)实践标准是怎样提出来的,什么性质?(二)强调实践标准,会不会减弱理论、思想、党的决议指示等等的指导作用?(三)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怎样对待毛泽东思想?这都是当时大家很关心又弄不大清楚的重要问题,吴江的讲稿都作了明确的回答。针对当时的实际情况,吴江在讲稿的最后说:有的地方的宣传部门还在压制下面的自发讨论,把实践标准划为禁区。现在这样干未免有些违背历史潮流。历史潮流滚滚向前,压是压不住的,禁区迟早要被潮流冲破的。

对于这次讲课,胡耀邦很重视,他审阅了讲稿,并加写了重要的内容。胡耀邦对这个讲课稿的评价是:“总的来说,很好,很好。”

过了多年以后,一位毕业学员在写给我的材料中还说,他们对吴江这一课的印象很深。

七、提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补课的要求

1979年8月23日和9月6日,吴江应刘澜

涛和宋任穷二位部长的邀请,分别向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和全国组织工作座谈会的同志作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演讲。以后,又将这两个演讲稿整理印发(我翻阅日记发现,9月10日的记载是:“加工吴江在统战部的讲话记录稿”,原来我是整理者)。

吴江的这两次演讲引起新华社的重视。新华社的《内部参考》第80期(1979年10月1日),以《吴江同志认为真理标准讨论补课重点要解决领导问题 补课要补到实处》为题,详细报道了这个讲话内容。报道说:中共中央党校副教育长吴江同志,最近分别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和全国组织工作座谈会上谈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他在谈了前段时间全国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经过后,又讲了关于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补课问题。他认为:进行真理问题讨论的补课,重点要解决领导问题,补课要求补到实处。

我以为这次补课,从思想上始终要抓住两个问题。哪两个问题呢?一个是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怎样对待毛泽东思想?另外一个肃清极“左”路线的流毒。当前补课要解决好这两个问题。

《内部参考》发行到地市级和中央各部的司局级,影响较大。

八、协助胡耀邦办《理论动态》

1979年12月,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以后的工作重点到组织部,但他放不下《理论动态》。1978年12月17日,胡耀邦召集理论动态组同志开会,开始就说:

我后天到组织部上班。

要满怀信心地提高、前进,一切要延期、降低的想法,都是不符合实际的,第一,从这个范围来讲,人越来越多,水平越来越高;第二,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投稿的人越来越多;第三,马文瑞同志来了,吴江也抽出时间来;第四,我还和大家共命运。有此四条,应该继续前进,不要后退,应该提高,不能降低。降低的担忧是没有根据的。

从此以后,吴江就承担了具体领导《理论动态》的工作,实际上是协助胡耀邦办这个刊物,前后有四年多时间。

依照胡耀邦的提议,1978年4月,中央党校组建了理论研究室,吴江任主任。理论动态组成为理论研究室的一个机构,而且是重点。在这四年多时间中,吴江出题目,设计写作方案,修改文稿,为办好《理论动态》倾注了很多心力,是胡耀邦的得力助手。

在拨乱反正中,《理论动态》有多篇文章遭到非议和指责,吴江也未能幸免。我作为参与者和知情人,很清楚,那些指责都是不实之词。

吴江是哲学家,在中央党校先任哲学教研室主任,后又任理论研究室主任、副教育长,他的工作内容很多,他的学术活动和学术成果很多,以上所述,仅是我接触和所知的一些事。

吴江同志是一位学识丰富、思想深邃、能够独立思考的学者。在胡耀邦同志这样的领导人的直接领导下,他的才华得到了较好的发挥。怀才知遇,值得庆幸。

胡耀邦同志1979年1月在中央党校的一次讲话中说:这两年多以来,多少同志,多少英雄夜以继日地用全部精力,为拨乱反正、扭转乾坤作出了贡献。吴江同志无疑是作出了独特贡献的人。■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责任编辑 洪振快)

本刊稿件选用标准

一,本刊重点关注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特别关注亲历者的叙述。

二,内容真实可靠,不可有任何虚构。文中重要引语,请注明出处。

三,篇幅不要过长,一般四五千字,长篇最好在八千字之内。

四,原则上稿一投。如一稿多投请予说明。

五,投稿三个月以上,未接到采用通知,请作者另行处理。作者请自留底稿,本刊无力退稿。

本刊社址:北京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政编码:100045

本刊电话:010-68534879

传 真:010-68532569

编辑部邮箱:yanhcq@sina.com

卢芷芬之死：语文教材改革风波的余波

○ 卢元镇

读叶永和夫妇《1957年语文教材改革风波》一文(见《炎黄春秋》2011年第2期),触动了我隐藏在心底50余年的一处伤痛。叶文所言的1957年语文教材改革风波,简言之,就是当年由中宣部指令搞的将中小学语文分为“文学”与“汉语”的改造,而时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的叶圣陶先生曾表达了不同意见,未被采纳;因这一改革有模仿苏联教材的倾向,在中国与苏联关系恶化后,怪罪下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人大常委会扩大会议上倒打一耙,称是人教社“一意孤行”所为;叶圣陶先生在接受《教师报》记者采访过程中略谈了这一经过,表达了愤慨,之后就有了6月4日胡乔木登门婉商撤稿,6月8日教育部副部长董纯才直言不讳的恫吓,和6月9日人教社副社长辛安亭的婉转暗示等一系列动作,迫使叶先生罢手。这在叶圣陶先生当年的日记中有详细记录。其实这一事件到此远未终止,因这场语文教材改革风波,在人教社被打成右派者竟有14人之多。其中包括孙功炎(语文专家)、李贻序(历史学家)、陈尔寿(地理学家)、凌伶(图书馆长)、徐保衡(财务处长)等多人。叶圣陶先生在悲愤中说了一句:“主帅无能,三军受困。”

而这14人中以我的父亲卢芷芬命运最为凄惨,不但因为他是14人中职位最高、与叶圣陶先生关系最为切近的一个,而且更是因为他在一次整风会议上对“一意孤行”之说做了彻底澄清,因此成了一只“替罪羊”。为了这一番仗义执言,他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上世纪20年代,卢芷芬肄业于无锡国学专科学校,后投到上海开明书店王伯祥先生门下。在此期间,他协助伯祥先生编纂了《二十五史》、《二十五史补编》,又与周振甫先生合作编撰了《二十五史人名索引》,卢、周二长期合作中结义为兄弟。抗战期间,他奔赴云南昆明,任开明书

店分店经理,不久与同去的伯祥先生的六女王汉华结婚,婚礼的主婚人是朱自清先生。他们夫妇苦心经营书店,与西南联大的沈从文、罗常培、唐兰、华罗庚等一批知名教授结为朋友,为他们出版文稿,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当年巴金先生就住在卢家完成了小说《火》。著名美籍友人李敦白的这一中文名字也是由父亲为他起的。

抗战胜利,父亲与叶圣陶等一批开明同仁从重庆乘木船返回上海,迎接解放。1949年8月他赶到北平,为解放区的中小学筹办编印新教材事宜,他自告奋勇按照地下党预先安排好的路线,先到香港,然后乘船到山东石岛,护送叶圣陶夫妇等一批民主人士。在穿越解放军防线时,假称“被俘”,辗转来到开国大典前的北平,出席全国政协会议。建国后,他先后参加了华北联合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筹建工作,后任人教社总编辑室主任。

50年代中期,他曾多次与我们兄弟讲到,他每年要负责千万册教材的签发,责任太大,作为一个党外人士很不相宜,多次提出辞去总编辑室主任的职务,但终未获准。此时他联系了古籍出版社,取回一套线装《晋书》,开始做圈点注释工作,做好了随时从岗位上退下的准备,以重操文史研究旧业。

1957年夏天,在中国图书发行公司做财务工作的母亲因传达民进中央关于帮助党整风的精神,被认为是“猖狂向党进攻”而被划为右派。母亲性格刚烈,争辩了几句,终被划为“情节严重”、“态度特别恶劣”的“二类右派”。此时王伯祥先生的女儿、儿子、女婿中已有5人被打成右派,他们大多是民进会员。父亲时任民进北京市委常委。

母亲要发配到北大荒853农场劳改,这趟发往东北的右派专列上有艾青、丁玲、吴祖光等人(吴曾与我母亲在一个伙房磨豆腐)。专列不允许



卢芷芬 1952 年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出入证

在前门车站始发,众右派被集中在通县双桥农场的货场,火车月台是一溜土墩,绝大多数家属未敢前往送行。父亲和我们三兄妹骑自行车赶到农场,当专列出发后,站台上空留我们四人向列车招手。这一镜头给车上的右派难友留下深刻印象,每每向我们提及。

到了 1958 年的秋冬之交,反右斗争的狂风恶浪已经过去多时。一天凌晨,人教社莲花池东侧的席棚突然贴出了一组大字报,通栏横幅是“坚决打垮右派分子卢芷芬的猖狂进攻”。当晚,父亲对我说:“上面说了,你一个非党人士在这么一个要害岗位上不合适,所以决定要把你打成右派。”

当时,社领导通知他说因为你的妻子已经到了北大荒,考虑到你的孩子还小,就不让你去劳改了。于是,父亲就从工字楼办公室被赶了出来,到图书馆做勤杂工,负责搬书、打扫卫生。

不久,“上面”又追查下来:为什么还不把卢芷芬轰出北京?于是,出版社领导又找父亲谈话:“现在要叫你去北大荒,不是劳动改造,是‘下放干部’,为期一年,回来就给你摘帽子”。

父亲服从了这一安排,一方面有一年可摘帽子的诱惑,一方面他以为到北大荒有可能见到母亲。出发前一天,我陪他去向外公伯祥先生辞行,因外公与叶圣陶先生是几十年的世交,此番女婿去替挚友受过,他心情十分复杂,两人长时间对坐无语。临别说了一句:“去看看汉华吧。”出发那天,我到教育部大院送父亲远行。

父亲走了,当时我正在北京八中念高中,从

此负起了主要的家庭事务,负责给他寄生活费,打点包裹,转送信件,记录家庭账目。离家最近的一个邮局在沙滩北大红楼门外。每次给父亲汇寄钱物的时候,营业员都一应拒绝,说在北大荒的都是劳改犯,不能寄钱物。我回到人教社人事处询问,几经请示终于获准,开出证明,写明“下放干部”的字样方可到达他的手里。父亲写回不少信来,但出言十分谨慎,从未流露出任何怨言,这些信件为他身后的摘帽子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1959 年的暑假,我哥哥元锴曾去北大荒看望过他。在极其繁重的伐木劳动中,他不堪重负,人极度消瘦,心力交瘁,这是父子之间最后的一次见面。一年的时间到了,无人兑现召回的允诺。父亲仍然在北大荒度日如年。这时已进入困难时期,北京城已经出现了遮掩不住的饥馑,北大荒的灾荒更是可以想见,正常人已经难饱三餐,谁还怜悯这些强劳犯?父亲工作能力虽强(据说他离开总编室后,由四个人共同接替他的工作),但是生活能力极差,他过去身体偏胖,很快就突发了风湿性心脏病,写信、拍电报回来要求返京治疗,但无人理睬。

1960 年,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再次写信给人教社,要求回京看病,得到的答复始终是:“就地治疗!”元锴为此去哀求人教社的人事处长杨定远,遭到他厉声叱责。

当年年初,由于周总理的过问和干预,文化部发配到北大荒劳改的右派们得以返京,我的母亲终于回家。但“下放劳动一年”的父亲却难离苦海。同年 11 月的一天擦黑时分,叶圣陶先生的儿媳夏满子急匆匆跑到我家,告诉母亲“芷芬去世了”,母亲呆坐,欲哭无泪。

又过了一段时间,一位陌生的客人来到我家,他自称是生物科学家童第周的外甥,曾和卢芷芬一起在大兴安岭的密林里烧炭,那时到山上还常有老虎和狗熊出没,他们二人经常遇到危险。他们住在密林深处的一个阴冷低湿的窝棚里,靠采食野果度日,过着野人般的生活。他目睹了卢芷芬临终时的惨状:在零下 30 摄氏度的雪地里,窝棚四处透风,没有粮食充饥,没有冬衣御

寒,父亲离开人间的最后一句话是:“给我一碗玉米糊糊喝!”而竟不能如愿。

他带回的父亲遗物证明了一切,那是一口皮箱,几十年来曾随父亲从上海到昆明,从昆明到重庆,又经上海到北京,最终面目皆非,盖子已经掉落,箱底残破,用几道草绳勉强捆扎起来。打开箱子,里面已无一件完整的衣裤,但完整地保存着一摞书信。这位没有留下姓名的难友放下皮箱,叮嘱我们千万不要和他联系,便从此隐去。

父亲的遗体被草席一卷草草埋在荒坡上,电话通知单位,单位告知家属,年仅50岁的他就这样“入土为安”了。完达山的一面山坡布满已故右派们的坟茔,每个坟茔前插着一块木牌,几经风雨就字迹难辨了。我的父亲卢芷芬究竟何时何地病故?遗骨究竟留在何方?都是一个无人知晓的谜。

1978年终于开始了对右派的“改正”,但父亲的冤案仍然石沉大海。我们兄妹三人去人教社理论,当时人教社和高教社合并,很多当事人都不在了,人事处一位叫张可宽的瘦长个子一直推诿不办,我们只好找到原副社长戴伯韬先生。一听我们的来由,戴立即说:“你们父亲的冤案我是亲身经历的,我非常清楚,非常清楚,一定要改正,一定要改正,你们放心。”以后他十分动情地讲了在文化大革命中自己在安徽劳改时被造反派殴打“致死”,已经抬进太平间,准备火化,负责签署死亡证明的医生竟是他的学生,赶到太平间来向他的“遗体”告别,发现一息尚存,才抢救了过来。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了政治运动害人害己的教训,以及他为我父亲伸张正义的决心。

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这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1979年巴金先生写的《关于龙·虎·狗》一文在美国《侨报》发表,文中提到他与父亲在昆明的一段交谊,文中感叹我的父亲在反右斗争中遭受不公平待遇,客死他乡。这篇“出口转内销”的文章,引起中国青年出版社原社长李庚先生的注意(他在1957年也被打成右派),转到教育部一位副部长的手里,教育部终于做出按司局级待遇在八宝山举行卢芷芬骨灰安放仪式的决定。那天来的人很多,因为取消了致悼词的程序,仪式静悄悄地进行。大家都默默地移动着脚步,叶圣陶先生由至善和满子搀扶也拥在人群中,他

神色凝重,自始至终未说一句话,虽然已时隔20多年,其悲痛之情依然至深至切。在鸦雀无声中,母亲突然爆发了一句“芷芬,你终于回来了!”这是对父亲唯一的一句悼词。

大约一个月后我们到人教社去接受教育部党委关于父亲的改正决定。这个决定让我们大为震惊,通知列举了1958年卢芷芬被打成右派的八条所谓“右派言论”,其中三条经查证属“查无出处”(如发动隋树森等人向党进攻,纯属当时罗织捏造),有三条属于对教育部个别领导的正常批评,有两条属于一般工作意见,“均不做右派言论”,故予改正。而对1957年语文教材改革,则只字未提。■

(作者为华南师范大学教授、中国社会学理事)

(责任编辑 洪振快)



2011年第5期目录

学界新论	谁最害怕宪政?	黄波
	文化保守主义能治今日中国之偏吗?	
	——试论文化保守主义兴盛的危险性	金岱
	大文化从小国家崛起	许博渊
流年碎影	杂忆赵家	黄培云 赵新那
	他留下的绝笔……	陈丹晨
说长论短	小说鉴赏是胡适的软肋	古 昶
	宋诗会意	邹金灿
	风从哪里来?——敬原素描	老 村
	流年零墨	李厚光
书屋品茗	史铁生四题	郭勇健
	荒江野老之趣	
	——读《现代学林点将录》	李廷华
	平淡表象下的悲凉空虚	陆山花
	《漂流瓶》沉思录	杨经建 周 舟
人物春秋	枉抛心力作哲人	王开林
	陈炯明与孙中山	肖洪泳
	与毛泽东有关的流行词语(三)	胡松涛
灯下随笔	卖国与爱国	
	——重读民国政治领袖的历史评价	顾 土
	“左”思	王 纲
	独抱“清商”	李源田
史海钩沉	辛亥革命时期的文艺作品	李长林
来稿摘登	吾侪所学关天意	易鸿劲

邮发代号:42-150 月刊 每月6日出版 定价:6.00元
地址:长沙市韶山北路443号《书屋》杂志 邮编:410007
电话:0731-85791300 85486812 传真:0731-85790197
邮箱:nlh5314@263.net

徐孔：因直言而落难

。 白 石

2010年5月,徐孔同志去世。

一位83岁的老人走了,好像不应该使人感到意外。可是他虽然83岁,但一直忙碌在重要的岗位上啊!以前我到北京,经常去他家看望,他总是忙于处理稿件。他早就在原来的工作岗位上离休了,不过他没让自己下岗,而是进入了一个更繁重更重要的岗位,协助杜导正同志办起了《炎黄春秋》。虽是几个人白手起家的民间刊物,却赢得了大量读者的热爱,我知道年老的年轻的同志不少人都订了《炎黄春秋》。它的内容经常引起人们的热烈评论。在境外也很有影响。香港凤凰卫视经常介绍《炎黄春秋》的重要文章。一个民间刊物,能得到这么多读者的厚爱,当然是社长的有力领导和刊物同仁的集体努力,但是和创办人之一,一直担任副社长、总经理,又长期负责终审工作的徐孔同志默默无闻的劳动、无私奉献的精神也是分不开的。

我和徐孔同志曾两度长时间相处。一是在华北联大文艺学院文学系学习期间相处3年。还有是两人都打成右派被劳动教养时,在劳改队一起劳改达12年之久。

华北联大在张家口时,我们俩住在一个房间,朝夕相处。解放战争时,长途行军到了河北束鹿(现在的辛集市),同学们分散住在农民家里。系里除系主任和一位管组织工作的助理员外,就是几位教员,没有行政工作人员。日常事务工作如分发生活津贴、日常用品、衣物、学习资料(没教材书籍),通知上课、开会,收集讲课以后的讨论情况和同学们有什么要求、意见等,都由学生会负责。系学生会经选举选出马琦、徐孔和我三个人。主席马琦又是院学生会的负责人,后来留院部工作;系里日常事务工作,主要是我们两个承担。我负责学习方面的问题,任务相对轻一些,大量事务性工作,都是徐孔一人承担。因为住得分散,有时他一天就不知要跑遍全村多少趟。但

他积极性很高,任劳任怨,从无怨言。虽然很大一部分精力倾注于工作,但是并没有影响他的学习成绩。那时没有考试,每次讲完课小组进行讨论,我每天到各小组收集讨论中的不同意见和提出的问题,整理后交给系主任陈企霞,他或者是讲课教师针对大家意见给予评论和解答。徐孔经常提出很有见地的意见,受到教师们的重视。

他在各方面的优异表现,说明了他对党的忠诚和对革命理想的热烈追求。文学系只发展了有限的几个党员,毕业后只留下了7名研究生,他都在其中,这是对他各方面表现的充分肯定。

1948年,他调到华北野战军新华分社。抗美援朝时到朝鲜做随军记者,虽然有时看到他写的通讯,不过我们却从此音信隔绝了。

令人惊异的是10年以后,我们竟然在劳改系统的劳动教养所相遇了,而且一呆就是12年,直到把这“牢底坐穿”。

当时的劳教比劳改还厉害,劳教是无期的,管理也比劳改队严格,刚见面时都不允许随便交谈。我还奇怪,怎么他也来了?

那时我还糊涂着,相信党的文件上说的话都是真实的,右派都是鸣放中有问题。只是认为自己是例外,因为鸣放中我没说过什么过头话,机关开展反右几个月后,我还一直在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身边写材料。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报纸上却公布我为右派反党集团的头目和策划者,这明显违反规定和应有程序,是机关领导诬陷强加给我的罪名。认为这只是我们单位反右有问题,自己完全被冤枉,别的单位哪里会这样胡整?所以到教养所后,还不知好歹理直气壮地要求找党委书记谈话。

我想不会有那么多右派被冤枉吧!可是徐孔绝不会反党啊!也不会放出什么对党不利的话来。他为什么成了右派?这在我心中一直是个解不开的谜。后来管得松了一些,我们两个谈到了

过去,才知道他被打成右派比我更冤枉。我虽冤枉,但领导经过几个月千方百计地逼供,终究还有两个人承认了他们鸣放言论征求过我的意见。徐孔被冤枉则是毫无根据。

他被打成右派,既没有鸣放言论,也没有假口供的牵连,完全是源于为人正直和对党的忠诚。这还得从反右以前的“肃反”运动说起。“肃反”运动本来没有涉及他,他满可以平安无事的。偏偏他爱管“闲事”,打抱不平。

那时他在朝鲜前线二十兵团政治部的宣传部,在第一次让大家揭发问题的小组会上,有人揭发韩部长的亲信背地里讲过政治部丁主任的坏话,揭发的问题仅仅是一般的生活作风问题。不料主持会议的韩部长却气冲冲地说:这都是“反革命分子”徐逸人挑唆的,他成心破坏领导和干部的关系。

徐逸人是谁?宣传部的副部长,不久前已调解放军报社回国了。被揭发的人没事儿,却得来由地给徐逸人扣上一顶反革命的大帽子,大家都怔住了。过了一会儿,人们领会了领导意图,便纷纷揭发“反革命分子”徐逸人的“罪行”。

徐孔很早就和徐逸人在一起工作,对他的为人是了解的。徐逸人在副部长中比较年轻,有文化,对上有时不太尊重,和韩部长关系不太融洽。徐孔觉得这谈不上反革命,大家提的意见又都是工作和生活作风方面的一般问题,怎么能扣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他认为这明显是在误导下运动走火了。

徐孔知道韩部长对下边干部提的意见是不容易接受的。但他认为这么重要的问题,自己作为一个党员,又是政治部党支部的宣传委员,应该向韩部长把意见提出来。

晚饭后他见韩部长独自在大树下乘凉,便过去小心翼翼地韩部长说:运动刚开始,如果没什么证据,就说徐逸人是“反革命分子”,恐怕不妥当吧?

韩部长脸色突然变了,责问他:你和徐逸人是什么关系?为什么替他说话?徐孔辩驳了几句,两人不欢而散。

第二天小组会上韩部长便把矛头指向了徐孔,让他交待和徐逸人的关系,揭发徐逸人的反革命言行。并很快将他看管批斗。徐孔不承认和

徐逸人有什么问题。看押半年多才宣布他没有问题。二十兵团转去徐逸人许多材料,可是解放军报社置之不理,连一次徐逸人的小组会都没开过,因为谈不上什么反革命言行。

兵团政治部召开营以上党员参加的扩大部务会,总结肃反和部署工作。丁莱夫主任讲完话后,徐孔在大会上提出了意见:用武装看押我七八个月,这是为什么?没有任何证据,连一封诬告信都没有,这样做符合“肃反”的哪一条规定?

“肃反”中被错斗的人太多了,敢于在大会上这样质问高级领导是十分罕见的。一般领导也是受不了的,但丁主任高风亮节,他说这事责任由他承担,韩部长在运动中是积极的,就是有些偏激。

徐孔说我不同意这看法,在运动中敌我不分,毫无根据把同志当敌人打,这叫积极吗?如果我和韩部长换个位置,他会作何感想?

在兵团的营以上干部大会上,敢于对领导提出这样尖锐的问题,据理力争,这显示了一个共产党员对党的无限信赖和一片赤诚。这就是徐孔!

他不是个参加工作不久涉世未深的小伙子,而是在不同单位在高层机关工作多年的干部,经历过不少运动,不会不知道这里面的利害得失。尤其是在顶头上司、直接批斗、关押他的韩部长在场的情况下,他不会不知道无论在目前或是以后,都会给自己带来多大的危险。但是他还是这样做了,这显示了一个共产党员在真理面前的一种大无畏精神。

当时他这种精神,感动了主持会议的丁主任,他沉默了一会儿,终于当场要求毫无根据以反革命罪名批斗关押徐孔的韩部长,向徐孔道歉。一个军级领导,在一般干部当众质问下,做出这种决定,这也十分罕见。有些领导在这种情况下会暴跳如雷,对下级干部大加训斥的。这说明丁主任是非分明,原则性很强。

韩部长虽极不情愿,但还是召开了宣传部党小组会,气呼呼地只说了一句话,我向徐孔道歉,便散会了。正是这次道歉,给徐孔种下了祸根。

朝鲜停战以后,这些人都回国了,二十兵团宣传部这些人都回到了北京军区。韩部长等在政治部的文化部,徐孔分在了宣传部。但他一天班也没上,领导给了他创作假,并借调到总政创作室写长篇小说。1957年整风鸣放他也没参加,专

心创作。

“反右”运动开始以后,文化部长时间没打出右派,刘佳部长压力很大。韩部长提了个意见,他说有一个人,一贯对领导不满,攻击肃反,还是大右派陈企霞的学生,是个地道的右派,可以把他从总政要回来。徐孔回军区后,虽是宣传部的人,却让他到文化部挨批斗,而且批斗的人只有两个人是文化部的,其余全部是肃反时在朝鲜批斗他的原班人马。坐镇指挥的仍然是韩部长,这是韩部长组织了一个临时班子专门批斗他。

掌握全国意识形态的一位高级领导在政治运动中曾说过:现在是有冤的报冤,有仇的报仇啊!肃反时韩部长不得不给徐孔道歉的那口窝囊气,现在终于可以痛快淋漓地报这一箭之仇了。恶斗以后,还给以最严重的处理,开除党籍、军籍并送劳动教养。这是最重的一级,等于右派处理中的“极刑”。

就是在极“左”思潮严重泛滥的情况下,我们党内也有一些同志保持某些难得的清醒。劳教所是公安部门看押阶级敌人的地方,这里受极“左”思潮影响是很深的,管理非常严厉甚至是十分残酷。推打批斗是家常便饭,捆绑吊打也不少见。但是有些干部遇到一些明显的冤案,有时嘴上不说,心中还是有些分寸的。管教科冯股长后来和徐孔熟了,曾对他说白石那问题有什么呀?虽有两三个人的口供牵扯到他,可是几个人交待的矛盾重重,根本对不上口,根本不能定案哪!能够和他谈这种问题,就说明领导认为徐孔也不是什么真正的右派。所以他入所十几天后,便调到文艺组去办《劳教生活》报了。

这虽是每周两期的油印小报,却形同教养所的机关报。他不参加劳动,别人出宿舍门解小手都要向班长报告,他却可以自由地出入武装看守的大院,到各队采访。各队都想在小报上宣传自己,所以连队长们都对他高看一眼,热情接待。

他不仅办报,还经常为所领导起草讲话稿和大报告。重要生产任务的动员和结束,政治运动的开始、结束、季度、年终总结等等,所里都要开大会。冯股长把会议要求、领导意图告诉他,领导的讲话稿,他是主要的起草人。

1960年教养所职工子弟学校人多了,又有了初中班,领导又调他到学校担任教师组组长。

原有的老师和从劳教人员新调入的共6人,由他负全责,等于是学校校长了。一个还没摘帽的右派,竟然当了对右派专政的公安单位子弟学校的“校长”,可见领导对徐孔的重视和信任。

为什么对他这样信任?除了前边谈到的不相信他是阶级敌人以外,还因为不管让他干什么,他都会很好地完成任务。受了极大的冤枉,为什么还这样积极?他把分配给他的工作,都看作为党为人民应尽的责任。这说明他对党的忠诚,虽九死其犹未悔。

当时那种情况下,为取得领导好感想表现积极的不乏其人。尤其表现在“小报告”(告密)盛行上。往往是捕风捉影,无限上纲,甚至是无事生非,卖友求荣。几千“阶级敌人”关在一起,领导最需要的就是了解这些人的动态和有什么不轨行为,所以鼓励人们“密报”,把这种行为叫做“靠拢政府”。

他经常和领导接触,向领导密报会是神不知鬼不觉,不怕被人发觉。但他坚持做人的底线和良知,虽积极但不做伤天害理的事情。我知道不少有独立思想有见解对当时极“左”思潮不满的人,都和他议论时局。有人回家探亲了解了国际国内的动态,也敢于和他议论。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出他的正直,得到了人们的信任。他在里边是个消息灵通人士,像庐山会议批判彭黄张周的情况、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重要内容等,我很快从他那里得到了消息。

那时教养是无期的。不过人们认为自己没什么问题,呆个一年半载就会出去。所以初期人们都很积极,也规规矩矩。但年复一年,解教的稀少,解教了也不准离开教养所,许多人受不了啦!不仅不那么积极,而且精神衰退萎靡,甚至破罐子破摔,怪话连天,打架闹事,还有人精神失常。徐孔认为不能对未来丧失信心,使自己精神倒下去。我们经常谈论这方面的话题。认为历史进程虽曲折,但终究是会前进的。物极必反,否极泰来,乱到极点,就会有转机。八亿人口的大国,党内精英荟萃,是非颠倒的混乱局面总会解决,一定会有黑白分明的那一天。

他经常提醒要注意自己的健康,不要立着进来,躺着出去(经常死人,用小车拉出去一埋了事)。而且要不断进取,不能白白消耗自己的生

命,不要到黑白分明的那一天,自己一无所能一无所长。他在文艺组和学校都有一个安静的环境,终于写成了一部关于抗美援朝的长篇小说,恢复工作后几经修改,经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百万字的《朝鲜战事》。我后来也写了一部地下斗争的长篇,文革回农村后经常大搜查,妻子担心惹祸烧掉了。但锻炼了写作,为以后工作打下了基础。

1969年,教养所所在地的河北省黄骅县北大港划归天津市,天津市要农场不要人。劳教所撤销,我被押送回农村老家“群众专政”,徐孔随大流送唐山市南堡劳改队改造。但不久上级又提出不准这些摘帽解教右派还在劳改队吃商品粮,他也被强制回了东北农村老家。壮劳力吃得多,在公社劳动,维持自己的生活都难,他住在哥哥家,才能维持一个人的温饱。在劳改队每月还有40多元工资,能给妻子寄20元钱补助家中生活,现在却根本不能寄钱了。

他们等待、企盼了十几年,想夫妻团聚全家团圆,甚至曾想把妻子调到劳改农场,也在所不惜。想不到越盼离团聚的希望越远,妻子在贵州一个偏僻县城,他回了东北农村,一个收入微薄,

一个分文皆无。两人竟养不了自己的儿女。妻子只能带一个孩子,另外两个孩子无奈只能送到远在福建的亲戚家寄养。最后落得个夫妻天南地北,远隔万重山。幼子女远离父母,各奔东西。大人孩子都各自陷入深深的生活困境,而且一家人终年不能相见。

夫妻都长期在腥风血雨的朝鲜战场上出生入死,十几年中不管在什么环境,都是忠诚地为党工作,竟落到这样一个悲惨的境地!

最后不能叫平反叫改正。以前的冤假错案平反后,安排和以前级别相同的工作,恢复名誉,补发工资,等等。对右派虽然承认你没有任何问题,恢复原级别和党籍、军籍,但不准回军队,不补工资,没人承认错误,没人道歉,更让人想不到的是,也不给安排工作。这就是平反和改正的区别。徐孔费尽周折,才由过去的同事们帮助找到了工作。改正也罢,总算随着改革开放的好形势,过上了全家团聚的小康生活。只可惜呀!他又走得太早太匆忙。一身正气令人尊敬的徐孔同志,善良的人们会永远怀念你!■

(作者为河北省人大原副主任)

(责任编辑 洪振快)

读 者 来 信

贵刊2011年第3期《〈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发表前后》一文中有不少错字及不妥之处。罗列如下:

一、错字

1.第32页,左栏第3段第5行,“北京工作组”中“北京”应为“北大”。

2.第33页,左栏倒数第8行,“越快起身”应为“赶快起身”。

3.第34页,左栏第2段第2行,“其二”应为“若干”。

4.第34页,右栏第3段第6行,《毛泽东语录》应为《毛主席语录》。当时并无此名称。

5.第35页,右栏第3段第4行,“工人是”疑是“工人和”之误,请查对毛泽东的原文。

二、多余、缺字

1.第32页,左栏第1段第3行,“共产国际运动”中“运动”二字多余。

2.第32页,左栏第3段第8行,“不那么革命的中间半途而废的人……”在“中间”与“半途而废”之间,疑缺“派”、“和”二字,请查对毛泽东的原文。

三、与当时用语不同的

1.第34页,右栏倒数第2段第3行,“学生五大领袖”应为“五大学生领袖”。

2.第35页,右栏第2段第1行,“五大领袖”应为“五大学生领袖”。

3.第35页,右栏第2段第9行,“反动权威”应为“反动学术权威”。

4.第35页,右栏倒数第2段第2行,“成为工、农、兵、地、富、反、坏、右之后……”一语,把“工、农、兵”与“地、富……”并列,据我所知,“文革”中无此提法。若这样提,那时恐要被戴上“混淆阶级阵线”的帽子。记得当

时的习惯是“地、富、反、坏、右、资、叛徒、走资派”(可参阅《烙印》第317页“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条括号中的说明)。

四、标点符号不妥

1.第32页,左栏倒数第4~5行,“1966年8月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应为“1966年8月8日《中国共产党……的决定》,即十六条”。

2.第34页,左栏第3段第2~3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其二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应为“《关于……注释本》(修订)”。

五、重复累赘

1.第36页,右栏第2段第1行,“绝大多数数量是……”,“数量”二字多余。

2.第37页,左栏倒数第5段第2行,“江青‘四人帮’”,“江青”二字多余。

3.第37页,左栏倒数第5段第4行,“相背,背道而驰”,“相背,”多余。

六、其他

1.第34页,右栏第5段倒数第1、2行,“他一进会场见到毛泽东恸哭……”句有歧义。它既可理解为“他一进会场见到毛泽东(在)恸哭”,也可理解为“他一进会场见到毛泽东(就)恸哭”。若属于前者,应在“恸哭”前加“在”;若属后者,应在“恸哭”前加“就”。据毛的性格、经历看,在这种场合是不会“恸哭”的,当属后者。

2.第35页,左栏倒数第3段第3行“发明火”,“火”是自然界本来就存在的,不能说“发明”,只能说“发现”。所以,这里应该是“发现火”或者“发明取火”,请查对一下毛的原文。如果原文如此,亦应加个说明,指出其用词不当。

读者 钱家良

我对批斗“反动军官”的悔恨

。 李 华

2010年8月下旬，我怀着极其复杂的心情收看了中央电视台第10套播出的一个节目，里面介绍了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军队的一支远征军，浴血奋战在印缅的热带丛林中的历史，使我了解到在这支部队里有无数为民族抗日大业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其中就有我的一个乡亲熊俊昌。而这位英雄的大伯身经百战没有倒在抗日的战场上，却被我们这些忠于党和毛主席的红卫兵整死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运动中，真让今天的我悔恨不已。

我是河北省涿州市松林店镇黄家屯村人。1966年初冬的一个晚上，我村的红卫兵组织在村小学召开批斗会，批斗的对象就是所谓的“坏分子”熊俊昌。在我们的怒吼声中，他被押上了讲台，责令他交待所谓的“罪行”。可这一刻我吃惊地发现，这个平常言语不多的“反动军官”竟十分顽固。批斗会上他不但不诚恳地向我们低头认罪，而是用一个准军人的姿势站在台前。当我们让他交待他反人民的罪行时，他不是像有些被斗人员那么不堪一击，而是用军人的标准口语回答大家的逼问，并且回答得相当坦然和自信。当时他多次强调他是国民党党员不假，是个军官也不假，可说他手上沾满了人民的鲜血他坚决不承认。他说他不但没罪，在抗战八年中出生入死，身经百战，应该为他记功才是，让他交待他的反动历史，他就说他被派往印缅战场，在美军什么司令史迪威和国民党什么什么指挥下与日本侵略者殊死奋战，屡立战功，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立下了汗马功劳。“顽固！顽固！让你这摆功来了”，台下多次这样大吼。为此他的顽固和摆功多次招来了我们这些有志青年的仇恨与气愤，我们不会“相信”国民党军人真的会抗日，笑话！他的顽固与摆功只能招致我们拳打与脚踢。就这样，经过几次批斗，他就“服软”了，这个软服的很“真诚”，那就是一命呜呼了。到他

死时连口薄皮棺材都没得到，是装在一个破柜子里下葬的。因为那时还没有在农村实行火化。我们终于舒了口气，一个顽固不化的阶级敌人彻底地被“革命”群众斗倒了。

说到这，我应该详细介绍一下这个熊俊昌：他是1911年出生，由于家境贫寒，自幼就跟随父母逃荒讨饭，当小做活的。抗日战争爆发吃粮当了兵。在历次战争中作战勇敢，杀敌无数，从而他虽然是个大字不识的莽汉竟然混了个连副，用他自己的话讲：“我是行伍出身，当官也是靠和鬼子拼命拼出来的。”他说得确实是实话，因为在他从部队带回的那一堆奖章、勋章上就能肯定地证明这一点。熊俊昌比我父亲大几个月，按乡亲辈份我喊他“大爷”（也就是大伯）。由于我们居住得比较近，从我记事起对他的印象就很深。他为人和气，平常喜欢和我们这些小孩开玩笑。这时我们就不再喊他大爷而叫“大头鱼”，这样他也不恼火，仍然齜着两颗闪亮的大金牙冲着我们呵呵地笑。据说那两颗大金牙是因为作战时被敌炮炸掉后镶上的。我们都知道他胳膊受过伤，可当他夏天干活时或天热脱掉上衣，我们发现他的身上满是大大小小的伤疤。特别是他的右臂除了上段有一个大伤疤外，这只手握东西的姿势也很怪，大拇指不是和我们一样的朝前而是朝后，看起来特别滑稽，其原因是这只胳膊被敌人的炮弹炸断后手术时留下的残疾。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是我们村唯一穿黄呢子军衣的人。他是在淮海战役中投诚到解放军这边的。投诚后改编时被遣返回原籍。他唯一的胞弟熊俊龙收留了他。刚回村时他还带回一个比他年龄小很多的南方小媳妇。可他们回村后生活没什么着落，种地吧连施用的猪羊粪都没有，只能向别家借。同时又因为他是“反动军官”，回村后就戴上了“坏分子”的帽子受管制，小媳妇没多久就弃他而去了，从此土棚里就剩

介绍《爱的哲学》

○ 李 锐

最近南京农学院原院长高亮之又给我寄来《爱的哲学》书稿,我同他神交有年,至今无缘一面。

几年前,原杭州市市长钟伯熙将高亮之的《综合哲学随笔:一个中国科学工作者的哲学思考》(华龄出版社2005年版)一书推荐给我,读后使我大开眼界,许多思考过的问题得到进一步的启发。首先想到的是,我1990年写的《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那篇八万字的长文中,曾对毛的理论思想、哲学观点包括《矛盾论》、《实践论》作过探讨,剖析过他的“斗争哲学”思想。“动”与“斗”是他早年哲学思想的一个核心观念,既是宇宙观也是人生观,终其一生,好动喜斗,尤其实践了自己“与人斗其乐无穷”的诺言。他认为差异就是矛盾,世界无处不存在矛盾、对立,办任何事情都要经过斗争,去克服其中的矛盾,从而形成一种从理论到实践的斗争哲学。他认为哲学概念中“综合”一词,就是“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世界事物无处不存在变化、存在斗争,只有靠斗争才能最后解决问题。这样把斗争性绝对化

后,就完全忽视和排斥了同一性,只有斗争性了。于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不斗则修,不斗则垮”;“斗则进,不斗则退”;“八亿人,不斗行吗”。老哲学家杨献珍因主张辩证法还应当讲“合二而一”,大挨康生、陈伯达等人的批斗下放。当年在“斗争哲学”思潮的统治下,不仅从历次政治运动发展到“文化大革命”,我们的哲学教科书也几乎看不到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另一个重要范畴:“多样的统一”了。

高亮之是有卓越贡献的农业气象专家,有深厚的自然科学基础。他从江苏农科院院长岗位上退下来后,以一种高度的历史责任感,潜心研究哲学,读了上百部古今中外的哲学名著。他发现,不论古代还是现代,东方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还是非马克思主义,所有的哲学都有合理的部分,它们之间并非是互相排斥的关系,甚至可以有有机地结合。他这本书的基本思想是:在当代中国,应促进“中、西、马”哲学的大综合。唐、宋两代,曾有过“儒、释、道”的大综合,推动了中国文化的辉煌。“中、西、马”的大综合,应该能推动中

下他孤零零一个人瞎胡混了,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中一命呜呼。过后当我懂些事以后才弄清,像熊俊昌这样的一个人太冤枉了。抗战八年,出生入死,由于其命大,没有倒在血腥的战场上,却留下个残废之身还成了专政的对象,最后惨死在了我们所谓的革命行动中。

在动乱的1966年,我们这个仅千余人的小村,就有多达五六十人被打被斗被抄家,并且是一个挨批、株连全家,就连妻儿老小也会失去自由和尊严,自杀的就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死有余辜,甚至死者亲属都不准哭泣。在我的记忆里当时除熊俊昌惨死以外,还有服毒自杀的、上吊自杀的,家人悲痛欲绝,不但得不到半点同情与安慰,领导还派我们去制止家属哭泣,并在死者

棺木上贴满标语来指责其死是自绝于人民,是人民的敌人。我们还有人性吗?

后来,我当上了农村支部书记,“文革”后逐步地认识到自己在“文革”中做了很多错事,用自己的特权剥夺另一部分人的人权,实在是惭愧和内疚。虽然以后多次以个人的名义向以前遭我迫害过的乡邻赔礼道歉,并且也取得了受害人及亲属的宽容与谅解,但有很多时候回忆起那年代的所作所为,总觉得寝食难安。特别是面对惨死的那些乡邻,我个人的赔礼道歉更显得是那样的苍白无力。■

(作者为河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

(责任编辑 洪振快)

华民族在当代的振兴。当然,其中最重要的,是要认真吸收西方哲学中的自由、民主、法治、科学等积极因素。

我深深感到,不熟知自然科学,也难弄通社会科学;对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我们信仰的主义和理论,以及党本身的经验和怎样执政,都应有全面的反思。

高亮之 1999 年 70 岁离休后,除了写出《综合哲学随笔》这本书外,还写了《漫游西方哲学》、《浅谈中国哲学》,以《综合哲学随笔》影响最大。我向他要了十本,分别送给中央领导同志。后来我还为《综合哲学随笔》的再版写了序言。

《爱的哲学》是《综合哲学随笔》的姊妹篇。直到现在,党和国家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而马克思主义对于“爱”是持批判态度的,认为“爱”只是资产阶级的“人性”,对于阶级斗争只有消极作用。在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斗争哲学”中,更没有爱的位置。1949 年以来的一系列残酷无情的政治运动,以至疯狂的十年文革,提倡“六亲不认”,将所有人类之爱(慈爱、孝爱、恩爱、情爱、师爱、友爱等)践踏殆尽。毛泽东说过:“中国不怕核战争,准备死三亿人!”尽管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党的历史进行了反思,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提法,如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 年 6 月 27 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做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但是,在实践中却往往重复过去的错误,“斗争哲学”的阴影并没有完全清除。上世纪 80 年代,周扬、王若水等提倡以人类之爱为基础的人道主义,遭到胡乔木的狠批。当前,各地政府强征农民土地,强拆居民房屋,有的官员甚至说:“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各地拦截上访群众,甚至送入精神病院;从上到下,大小官员的腐败,已成普遍现象。

至今,人权、自由、民主、平等、法治、公正、正义、博爱等普世价值,还有人不予承认。我的理解,这些普世价值都是立足于人类之爱。普世价值有利于人类和人民大众的根本幸福,普世价值与人类之爱有密切的内在联系。

高亮之研读了两百多部古今中外的名著,著就《爱的哲学》,认真探讨人类的本质,探讨人的天性,探讨爱与真、善、美的关系,探讨爱在哲学中应有的位置。他认为,真、善、美是人类所追求的三个最高理想,爱也应列入人类的最高理想,柏拉图在《会饮篇》中,对爱有极高的评价:爱是人类一切最高幸福的源泉。但是,爱与真、善、美相比,有它独特的性质。真、善、美三者,主要存在于客观世界,同时也要与主观认识相结合。“真”是人的认识与客观事物规律的符合;“善”在客观上要符合社会利益,在主观上要使人满意;“美”在客观上有匀称、鲜明、活泼等特性,主观上要使人愉快。符合真、善、美的事物,主要存在于客观世界,它们本身,并不是人的一种感情。 $1+1=2$,这是一个符合“真”的数学法则,但是它本身并不含有人的感情。而爱不同,爱主要并不来自于客观世界,而是来自人的内心,或者说来自人的感情。对于不真的事物,人是可以爱的。例如上帝,从自然科学来说,并不是“真”的。但是基督教信徒完全可以爱上帝。对于做了不善之事的人,人也可以爱。例如你的孩子说了一次谎话,你完全可以原谅他,教育他,决不会影响你对他的爱。对于不美的人或事物,你可以爱。例如你的母亲可能长得比较丑,但是不会影响你对她的爱。爱或不爱,并不决定于外部世界的特性,而是决定于你的内心,或你的感情。费尔巴哈说:理性、意志和情感(爱)是人的本质。他是将爱和感情看成同一件事。应该说,感情与爱的含义还是有一定区别的。感情中也包括仇恨、厌恶、嫉妒等负面的感情,而爱是一种正面感情,并且是最重要的正面感情。爱也不仅是感情,而是感情与理智的综合。人的感情有许多种。有些感情,不一定带有理智,例如喜悦,人见到一朵美丽的花卉,或听到早晨的鸟鸣声,会感到喜悦,这里并不要求有理智。又如厌恶,人见到一堆粪便,或听到烦人的噪音,会感到厌恶,这里也并不要求有理智。爱,就是一种含有理智的感情。这是爱的非常重要的特征。夫妻之间的爱是人一生中最重要的爱。夫妻会共同生活几十年,长时期的共同生活中,不可能没有矛盾,不可能没有不同意见的争执,不可能没有不同性格的冲突。但是,夫妻双方的理智会告诉他们,所有这些矛盾、争执和冲突,都只能以相互的宽容、

相互的让步来对待，以维护夫妻之间的长远的爱。因此，夫妻之间的爱就是含有理智的爱。事实上，所有的爱，都是含有理智的。

书中谈人类爱的对象十分广泛，有自我、子女、父母、情侣、配偶、同胞、大众、家乡、祖国、艺术、科学、事业、自由、自然、人类等等。上述“爱的含义”中，最后提到“生命力”。怎样理解生命力呢？宇宙间物质的运动是由四种力推动的，引力、电磁力、强相互作用力、弱相互作用力。这是指的无生命世界。在生命世界中，各种生物的活动也是力所推动的，这种推动生命活动的力，可以称为生命力。生命力的根本来源是太阳能（属于电磁力），太阳能通过植物的光合作用，转化为植物和动物的化学能。对人类来说，人的各种本能性的欲望都会产生生命力，生命力驱动着人做出努力，去实现欲望。爱是一种生命力，这是爱的又一个重要特征。这个特征使它和真、善、美相区别。真、善、美，虽然是人类崇高的理想，但它们本身并不是人内在的生命力。而人对真、善、美的爱，就是一种生命力，这种生命力可以推动人类进行不懈的努力，去追求或实现真、善、美。前面提到，爱要对所爱对象进行爱护、帮助、照顾、奉献，这些都是要付出体力和心力的，是要付之于行动的。如果爱不是生命力，是做不到的。人的生命力有许多种。例如人有维持体温的生命力，有维持心跳的生命力，有走路或运动的生命力，有觅取食物的生命力，有追求并满足性欲的生命力等。但是爱这种生命力最有创造性。创造性是要创造出世界上原来没有的事物。人的生命力只有爱才有这种能力。例如将一个受精卵培育成为一个新生命，一个新的人，那就要依靠母爱、父爱、医生护士的爱、老师的爱、社会的爱。书中谈到，人类的一切文化、科学和艺术（文学、音乐、美术、戏剧、建筑等），都是由哲学家、画家、导演、演员、建筑师对自己专业的热爱所创造。柏拉图说：“爱的力量是伟大的、神奇的、无所不包的。”就是指爱的无穷而伟大的创造力。

十年前，建党 80 周年之际，我写了《做人当党员》一文，从自己一生三次同党发生矛盾冲突中写起。做人当党员应当是统一的，响当当做人，响当当做党员。可是，两者却发生矛盾。我这样写出来是提出一个问题：我们总是强调党性

高于一切是值得研究的。这来源于阶级性和阶级斗争，即过去所谓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决战，胜负攸关，你死我活。从而“党员一切服从党”，“要做党的驯服工具”，“党指到哪里打到哪里”。可是，一方面，党是历史时代的产物，不能离开人类历史发展尤其是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我认为自由、民主、科学、法治和市场经济，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市场经济如何变化还说不清楚）推动社会合理前进的动力；人类已进入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社会关系和国家关系起了很大变化，还将继续朝和平与发展的道路变化下去。因此，党离不开这个潮流，必须代表这个潮流，领导这个潮流。另一方面，党是由人组成的，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他受社会环境尤其是学校、家庭、亲属、朋友、上下级的影响，也受书本、传媒和个人性格等等影响，处在不断变动之中。恩格斯说过，任何人要受三种限制：历史时代，个人知识经验，思维能力。我认为还应当加上一条：人的良知即品德。这就是说任何人都免不了要犯错误，从而党也会犯错误。20 世纪社会主义历史告诉我们，第三国际的党无不由领袖当家，斯大林更做到极致，毛泽东是“君师合一”，全国人民曾长期高唱：“他是大救星”，“大海航行靠舵手”，他做到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毛泽东不去世，他的 20 年“左”的错误也无法做结论，也不可能纠正。过去我们只有党和党性，一切有关“人”的意义都是谈不得的，都是有违阶级性和党性的，如人性、人权、人道、人格、人情等等，都属于资产阶级的东西。甚至在毛泽东的教育下，亲情、爱情都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我的前妻范元甄就是一个典型，延安整风时，我因被怀疑关入保安处，她与我划清界限，并离婚；反右倾时，她不仅与我划清界限，还写了两大本揭发材料，和我断绝夫妻关系，试图从精神上彻底摧毁我。因此，1959 年庐山会议形成的“反党集团”，只有我被开除党籍。阶级斗争实际成为制造仇恨的学问。现在情况比过去好多了，尤其接受了市场经济，这是一大进步（原以为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提出了科教兴国，依法治国。从而国家和社会、个人有了生气，经济在向前发展。可是关于“人”的问题，关于人的本质是追求自由的问题（精神自由与物质自由，这是马克思主义也追求的基本原

理)。党性、人性、科学性、民主自由性(民主与自由分不开,是一对孪生子)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不能互相对立。以及关于治党治国要依靠民主、科学与法治的问题,这些最为根本的理论与实践,我们还远远没有弄清而至解决,还没有从毛泽东的阴影(专断独行,要一点个人崇拜)中完全解放出来。

高亮之从小爱而论及大爱,即人类之爱,或曰博爱。卢梭提出“每个人都生而自由、平等”。这句话的意思,被写进1776年的美国独立宣言与1789年的法国人权宣言。当前,平等与自由,已经作为普世价值,为全世界各国所承认。这一句话,在人类历史上,应该说有划时代的意义。然而,在西方与中国的历史上,事实上并不是每个人生而自由、平等的。相反,人自出生以来,并不是平等、自由的。那么,为什么这句话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赞同呢?因为它是符合真理的,是符合人类的本性的。卢梭提出:“要寻找出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力量来卫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产,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得每一个与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只不过是服从其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地自由。这就是社会契约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这就是“主权在民”的思想。而“民主”的意义,就是“主权在民”。法国《人权宣言》第三条:“整个主权的本原,主要是寄托于国民。”美国《独立宣言》中说:“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中华人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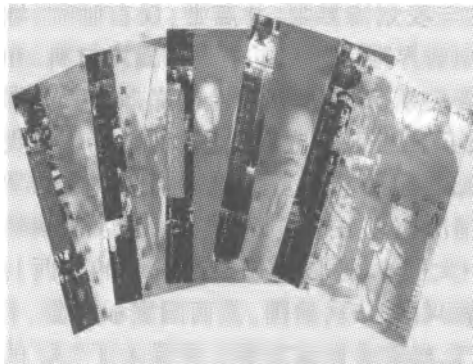
共和国2004年修改的宪法中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些庄严的语句,都体现着“主权在民”的民主思想。关于“法治”,英国哲学家洛克是法治思想的奠基人。洛克认为,法治的目的是指导并保护每个人的自由和权益。归根到底,这些先驱者认为,为了爱护人类的利益、爱护每个人的利益,必须有民主与法治。民主与法治是人类爱的必然要求。自由、民主、平等、法治、公平、正义等现代世界普遍承认的政治原则或普世价值,全部都立足于人类之爱。任何国家的政府或政治领导人,如果是热爱人民大众的,而不是维护少数特权者利益的,都必然会承认、接受并积极推行这些世界所公认的政治原则,或普世价值。

我们现在上上下下还有一些人喜欢用阶级斗争的传统观念看问题,给普世价值贴上资产阶级的标签,以否定普世价值的存在。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希望大家对社会进步的根本规律和主义、理论等问题有一个与时俱进的认识。

高亮之的《爱的哲学》洋洋30余万字,论及爱与个人、家庭、社会、人类、自然等方方面面的关系,我感到这些问题,虽然偏于理论,却对我们认识世界与中国的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我希望此书稿能尽快出版,能对正确认识问题、反思历史起作用。■

(责任编辑 洪振快)

《炎黄春秋》精品书系介绍



1998年推出的《炎黄春秋》精品书系,是从《炎黄春秋》1991年创刊至1995年计45期650万字中精心筛选出的重点文章150万字,编辑为五卷珍藏本,分别为:《政坛高层动态》、《重大决策幕后》、《历史迷案揭秘》、《名流写真》、《血荐轩辕》。该珍藏本出版后一度脱销。应广大读者强烈要求,精品书系五卷珍藏本再版发行,以弥补本刊早期合订本售罄之不足。

由于数量有限,恕不分卷出售,欲购从速。定价125元,另加邮资12元。汇款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收款人:炎黄春秋杂志社,邮编:100045,联系电话:010-68532048,传真:010-68532569。

我走进了“胡风分子”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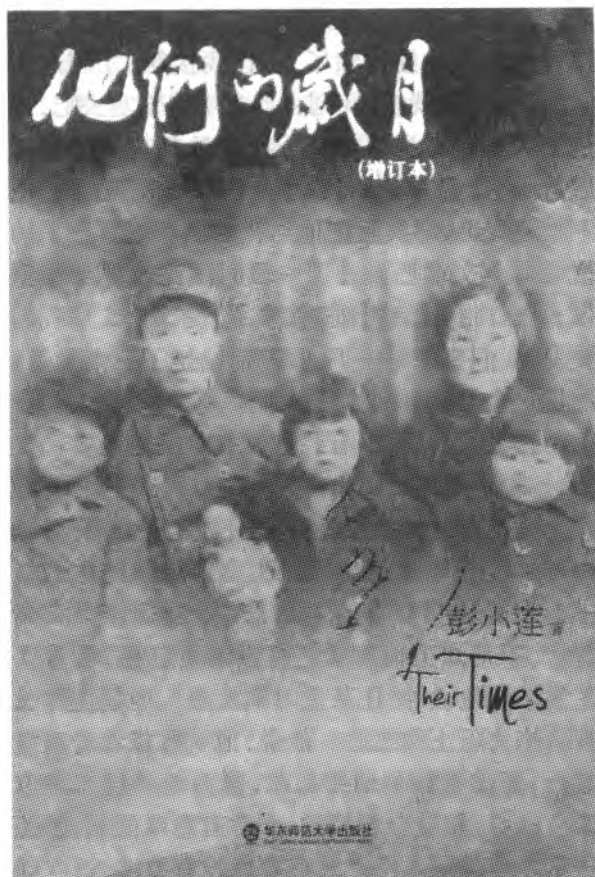
○ 彭小莲

50多年前,父亲彭柏山(1910~1968)因与胡风先生有私交而被打成所谓“胡风分子”,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十年前,我写下了父母的惨痛经历,以《他们的岁月》(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为名出版。

十年过去了,《他们的岁月》又一次再版,对于我依然是那么重要,不仅是创作上的一个支持,更重要的是,它继续帮助我在走完这个艰难、漫长的思考。当初写《他们的岁月》的冲动,是为了认识自己的父母,去理解他们的人生,也是在努力为弥合我们曾经有过的隔阂和误解;可是写着写着,我却再一次进入“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噩梦中。原以为完成了这本书,就可以结束这伴随我一生的噩梦,殊不知在完成了这本书以后,我有了更多的疑惑和无奈,于是我又重新上路,拿着《他们的岁月》作为敲门砖,开始采访那些依然活着的“胡风分子”的叔叔、阿姨们。

对于我,最大的疑惑就是舒芜,他曾经和胡风先生有过那么密切的合作和交往,他们曾经是那么亲密的朋友,怎么会反目,他的行为逻辑是什么呢?作为一个写者,他的思考是怎么转弯的?真的像他在《回归五四》里说得那么简单?他为什么要把胡风写给他的私人信件交出去?等等,等等的一切……

我想,我已经是下一代人了,特别事隔半个世纪以后,人们是可以对自己的行为有一份思考,特别是经历了那么多的政治运动之后。于是,通过牛汉叔叔(他是“胡风分子”中,唯一和舒芜还有往来的人),提出希望对舒芜进行采访的要求,舒芜答应了。父亲的朋友听到这个消息,对我



《他们的岁月》(增订本)书影

的行为非常质疑,他们问我,你这样的态度,何满子先生能原谅吗?我说,我为什么需要他的原谅?我不过是想正视一段历史,所有人都有自己的话语权,我更愿意是一个没有“是非”的边缘人,我想把历史和盘托出,不给任何行为答案,我也不想站在任何人的一边。赴京之前,我去看望了何满子先生,并告诉他我出行的目的,何满子先生平静地说:“好啊,我倒很想听听他的声音,看他能说点什么。”

可是等我赶到北京的时候,等牛汉叔叔给舒芜打电话去约定时间的时候,舒芜拒绝了,他在

电话里说：“我重新看我以前写的东西啊，我就觉得除了那个，没有什么好说的了。没有这个必要。”我在电话机旁听见了回答，我站立在那里发憊，他所指的“那个”又是什么呢？后来舒芜的好朋友朱正先生说：“我跟他（舒芜）说，你写文章就写文章嘛，你拿个信出来干什么？他说：‘你不知道，我从广西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冯雪峰找我谈话，说你调来以后你愿意做什么工作？我听了这个问题觉得很奇怪，你冯雪峰不是知道么，我一直是搞理论的。你问我这个问题，大概就是把理论这一块给排除了，不让我接触，才问这个问题。那么我就说，我到古典文学编辑室去吧，于是去了古典文学编辑室。所以批判胡风开始以后，他们让我写文章，我想从理论上写呢你们也不欢迎我讲，那我就把他给我的信里流露出来的情绪写个文章吧。过了一段时间呢，那个编辑（《人民日报》记者叶遥）就来了，说这个文章我们要发，我们要核对一下，我就借给她了。谁知道，她把这个信就拿到林默涵那里去了！’他说：‘我又知道了。’所以有些批判文章说他是主动交信，他说不是那么回事。”

只是在北大教授王丽丽的研究中，却有另外一种解读，她说：“胡风先生在给绿原先生的信中，大概是1952年左右的信中，他其实非常痛苦，大家都知道他对文艺特别有责任感，看着文艺领域像他说的‘往灰色时期发展’，但是他却没有资格去阻止和改进。他说，他就好像看着瘟疫流行，而没有资格动用药品，因为他还没有考取医生执照。跟这个相反的，非常意味的是，舒芜进京之前对别人说：‘北京拿他没办法，这次让我去，做主刀大夫。’我觉得这种说法是非常意味的。”

在经历了这些采访之后，又有很多人批评我，说：“都是那么一个老人了，过去就过去了，为什么你老是要在那里纠缠不清？做人，为什么就不能有一份宽容？”

我想，我不是不宽容，实际上任何事情都是会过去的，即使你不宽容，一切也都将成为往事。关键在于，当你面对一段历史的时候，我们必须在他面前有一份敬畏，要把历史的真实面貌留给下一代。宽容是必需的，但是宽容是有前提的，任何一次宽容，都像是在上帝面前，你是要下跪在

神父的小窗口前忏悔，你需要对着神圣的上帝有一份反思，你更需要深夜人静的时候，对自己的良心有一份诚实的叩问。只有在这些基础之上，才会有宽容出现。无原则的宽容，是对罪恶的庇护，是欺骗的延续，更是一次对历史的亵渎。何满子先生觉得最恶劣的是，因为有了舒芜的行为，“以前还没有，顶多我检查我自己，理论上批判你而已。拿隐私、私信出来检举的，还没有。他第一个，他创造！”确实，舒芜是否主动交信，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他在胡风先生给他的私人信件中，他利用“情绪写文章”，然后断章取义，将它们上纲上线，设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小集团，最终将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于是，这一招成为后来历次政治运动的范本，“揭发”这个词，也就成为运动中的关键词。舒芜文章的措辞和叙述方法，逐渐形成了后来运动中的语境。

这才是最可怕的，儿女揭发父母，亲友反目为仇，朋友互相陷害，人性被阶级性替代，人与人之间只存在着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可能。刹那间，人情和信任在消失，亲情和帮助在丧失，我们离地狱还有多远？

二

我喘着粗气从惊恐中挣扎出来，2010年6月我跑到广东海丰县参加丘东平先生百年诞辰的纪念会。正是从丘东平的作品中，我真正理解了胡风先生提倡的“主观战斗精神”，他的作品就是这个“精神”的体现。他的作品非常有个性，他的文字和叙述，也区别于当时的“抗战文学”，但是他的人物却在抗战最前沿，他本人就是在1941年的战斗中牺牲的。鲁迅先生把丘东平的作品，放在30年代作家的前三名。聂绀弩伯伯说：“看了东平的小说，我们还写什么小说啊！”他又把东平称为“中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父亲说，那时候黄源把丘东平的遗作《茅山下》交给他保存，他觉得简直是交给他一颗炸弹，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爆炸，责任太重了。他上前线，都不敢把稿子放在司令部，而是背在自己的身上，行军的时候，衣服、生活用品都扔掉了，可是稿子还是紧紧地贴在身上。丘东平的稿子上是沾满了自己的鲜血，那稿子还存有我父亲的体温。一个作品，



1939年10月,黄源、彭柏山、聂绀弩(从左到右)摄于皖南新四军军政治部

却联系了那么多人的命运和情感,一直到文章发表了,父亲如释重负,于是那颗炸弹在战场上发挥了效率,它轰然炸裂的时候,谁都会被震动的。

可是1950年3月14日周扬在文艺创作会上说:“丘东平作为战士牺牲是值得尊重的,但是他是胡风小宗派里的人,所以作为作家,死了就死了。”当我读到这段冷漠的文字时,我想起1979年秋天,我见到的周扬,那个跟我说:“我现在没有什么权了……”他显得有点疲惫,但也显得是个非常善良的老人,我很难把这个形象和这些话语联系在一起。我看见了权力对人的腐蚀,看见了权力对人性的异化,我更加感受到一种,在权力之下,人心、文学都丧失其原有的价值。其实当初正是周扬发现了丘东平,把他的作品推荐给鲁迅先生,可是不久丘东平就不能接受周扬的霸道,他把稿子投给胡风先生创办的《七月》,甚至在战争中,他都与胡风先生有着密切的通信往来。

20多年后,已经没有人再记得这个天才的年轻作家,这个死难烈士。这时,漏网“胡风分子”聂绀弩伯伯竟然在1964年,从北大荒劳改返京之后,戴着右派分子的帽子,千里迢迢跑到广东

省海丰县,一个非常偏远且闭塞落后,连公路都没有通车的乡村,看望丘东平80多岁的老母亲。那时候丘东平的妻子在1950年斗地主的运动中,被作为地主婆批斗(因为当年作为烈士亲属,农会分给她两亩地,她和老母亲都种不了这个地,雇佣了一个长工),批斗之后,她受不了这个委屈自杀身亡。聂伯伯拿出100元钱交给老人手里,然后轻轻地跟她说:“以后有什么事情,就直接给刘少奇、陈毅写信,东平过去做过他们的秘书。”谁也不会想到,两年后,刘少奇和陈毅都被逮捕了。

我就是这样渐渐地走入这个“圈子”,渐渐地了解这些人和事,渐渐地明白文学在他们的生命里是占有多么神圣的位置,而情感又曾经是多么刻骨铭心地留在他们的友谊之中!也是渐渐地认识到,政治运动是如何在摧残着我们的文化,摧残着我们的人性,摧残着我们的良心!

实际上,这些胡风分子互相都不大认识,他们只是作为作者和编者胡风先生之间,有着个人的往来。对于我父亲,除了胡风先生,几乎就没有和他们中间大多数的人有过任何私人交往。一直到运动结束,这些“分子们”怀着好奇的心情,大家想见见面,说我这个冤枉,到底是和什么人“集团”在一起了?要受那么大的折磨!没有想到这一见,真把他们纠缠成一个“集团”,他们大有相见恨晚的遗憾。这以后,他们自觉地互相交往,通信、拜访、郊游,总之全国各地的“分子”们像一家人似的互相帮衬着,既艰难又快乐地走完了他们的余生。

三

在这些“分子”中最让我难忘的是阿垅先生。他毕业于黄埔军校,在“八一三”淞沪战役中负伤,转入地下后,为共产党做情报工作。阿垅是“七月”派的代表诗人、理论家。当他被关押了十年后,才被提审判刑。宣判的当天,法院四周如临大敌,站满了警察。因为隔夜在找阿垅先生谈话的时候,他依然不服从判决,坚决不在判决书上签字。但是,在法庭上,当他看见年轻的作家林希也被卷入胡案时,他决定承担全部责任。

林希回忆说,当他作为证人出庭的时候,“我

进去之后就站在旁边,这时阿垅抬起头来看了我一眼,我也看了他一眼。我们两个人的目光交错,这一下对我的震撼太大了。啊呀,我违心地做这个,这个他妈的不是人的证,我又看见了我所最尊重的前辈,我的感情简直没法控制。这时候法官提出,“林希面对法官!”我就冷静下来,说我和阿垅是怎么认识的,他对我说了哪些话,使我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所有的证词都是按照官方审定的。然后休庭十几分钟,一会儿宣判,我们就进去坐在边上。阿垅重新出庭,阿垅确实挺着胸膛,抬起头阔步走到他的位置上。法庭宣判这个那个,判处有期徒刑12年。‘阿垅你有什么说的?’我可以一字不差地给你重复阿垅的话:‘我放弃上诉,一切责任在我,与任何人无关。’完了。那在我的印象里,那是永远不会消退的人格力量!”

宣判结束后的第四个月,阿垅先生在监狱里给审判员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说:“从根本上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全然是人为的、虚构的、捏造的。所发布的‘材料’,不仅实质上是不真实的,而且恰好混淆了、颠倒是非黑白。一方面歪曲对方,迫害对方,一方面则欺骗和愚弄了全党群众和全国人民!我认为这个‘案件’,肯定是一个错误。一个政党,一向人民说谎,在道义上它就自行崩溃了。这显然是政治迫害,政治欺骗,别的解释是不可能的。我也多次表白:我可以被压碎,但是绝不可能被压服。”

信,是最后从公安部的档案室里退回给阿垅家属的,信纸的抬头上,标写着档案馆的登记号码。那已经是这个世纪的事情了,阿垅先生已经在监狱里患癌症,于1967年3月15日去世。当我从阿垅儿子陈沛的手上,看见这张用铅字打印出来、泛黄的信纸时,我看见的是一个站立的灵魂,是用鲜血写下的最后诗句。我努力控制着,不让自己的眼泪往下淌,我觉得在阿垅先生面前,我的眼泪太轻,太微不足道,也太廉价了,以至于它淌落下来,会是对阿垅先生的亵渎。

阿垅先生不相信眼泪!

四

只有在贾植芳叔叔面前,我敢大胆地追问

他,因为他是最随和的一位老人。我要贾叔叔亲口告诉我,他交了胡风先生这样一个朋友,他后悔吗?贾叔叔连思考都没有,接着我的提问就说:“从不后悔!”我再问,“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朋友,作为一个大教授,你的生活会是怎么样的?”

“不会比这个更好。文化大革命刘少奇都打倒了,老革命都打倒了,周扬四条汉子也进了监狱。我说毛泽东,55年把我们抓进去了,66年我们都差不多都出来了,把四条汉子抓进去。文化大革命以后,把四条汉子放出来了,把四人帮又抓进去,监狱大家轮流坐。我们是劳改第一期毕业,是老资格了。你说,我怎么会感到幻灭?人生就是游戏,我说我中学念书的时候,是美国教会学校,只想回家Marry(结婚),就是想回家娶个媳妇。这个时候,人就很容易感到幻灭,这叫虚无。后悔没有后悔……小莲,我大学也没有念完,我在日本上大学,我在高中念了三个月就被开除了,我只有初中文凭。我那个不安分,我在一二·九运动被抓进去,但我不是党员,我和他们没有关系,我当初就是要争取民主自由,反对封建统治、封建法西斯。到抗战的时候,在流亡,我在日本是流亡学生,我流亡到日本的时候,受日本警察监视。后来,回来参加抗战,在国民党那里当个编辑。后来逃难,内战的时候,我又给国民党抓进去。终于解放了,你都看见了……”

是的,都看见了,后来的日子里,我是他们生活、学习的见证人。现在,胡风分子们一个一个去世了。我带着自己敬畏的心情,补充了更多的细节完成《他们的岁月》的再版。我想说的,也是我现在渐渐地明白的,就是:他们是中国历史上一群特殊的文人,因为他们没有奴气,他们的灵魂是站立着的。■

(作者为自由签约导演)

(责任编辑 洪振快)

本刊声明

为保护本刊和作者权益,凡转载本刊文章,请注明“转自《炎黄春秋》”。

从清代农业政策看当代农村变革

○ 高王凌

在历史学界，近三百年历史常常被分作三段：清史、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段兼修的学者很少。像我这样只修一头一尾的，也不多见。比较多的，是从清代进入民国，或由民国转入当代。

我的“一担挑式”选择，全神贯注于前面一头，而内心关切却在后头。它也成就了我的一个观点，即当代的“昨天”，不在民国，而在清代。当然，这主要是就经济史而言。

至于当代农村变革，又可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经营制度，即与“包产到户”有关的土地制度、经营体制等问题；一是关于农业经济发展的方向，带有很强的技术性。

一、同样遇到“人口问题”

从历史观察，在18世纪的清代，“我们”遇到了什么问题？第一个，恐怕就非人口问题莫属了。

公元18世纪之初，康熙皇帝发现，国家人口益繁，不能不“预筹安养之策”。这就展开了清代史中最有光彩的一页，集中表现在18世纪头50年中，政府连续给出一系列的政策措施。

康熙、雍正时期，中国“人丁”只有两千数百万，到乾隆初年初次统计“大小男妇”，就发现已有一亿三四千万“口”。至乾隆五十八年（1793），全国人口达到三亿之众。

中国在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这么多的人口，也没有这么大幅度的人口增长。重要的是，它竟与后二百年连成一段，一直增加到十几亿之众。各位也许不会同意我的看法，即中国从彼时即已开始试行“现代化”，但不难发现，“当日”问题与“今日”已十分接近。

还有一节不能不说，就是中国人口思想的主流，是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力求用经济发展来满足日益增加的人口需要，而非限制人口增长。它自然要带来一个巨大的需求和农业产出，并带动

一系列政府政策的出台。

二、似乎不成问题的开垦政策

要发展经济，首先便是开垦土地，当日朝堂上称为“垦政”。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对农业生产来说，第一步即开垦土地，舍此并无其他。至于灌溉、施肥，以至复种、多种经营，都是以后的事。历代也都把土地开垦，作为“恢复时期”的主要政策，一向卓有成效。

从官方统计数字来看，清代以前明代中国的耕地面积，已有7亿多亩，到民国初年，达到14亿亩。其间约7亿亩是为清代开辟，占据一半。换句话说，清朝三百年土地开垦，与以前三千年所垦约略相当，成就极为可观。

从其他各方面史料也可印证，清代出现了“全域性开垦”，势头及于历史上从未开辟的深山老林、生荒地土，其中最著名的新开发地区有西南、中南及东北等地，相对于明代经济重心偏于东部运河一线，已形成极大反差。

经过清初“恢复时期”的持续开垦，到雍正年间（1723～1735），中国造报耕地数字达到9亿亩。估计民国初年14亿亩耕地中，可能有12亿亩，是为乾隆年间（1736～1796）已经开垦。

可是当康熙年间（1661～1722），中国还有大片的荒芜土地有待开垦，康熙皇帝却持相反观点，表示：“内地实无闲处”，“此外更有何应垦之田”？

康熙之后，雍正皇帝重新强调土地开垦，史称：“雍正间督各省开垦，颇用以厉民”。引致朝野不满。

因此乾隆皇帝甫一即位，便一面声称：内地开垦一说，断无其事。各省督抚亦断不得以此为言；一面减税免税，甚至对耕地面积的统计都不复关心。所以到乾隆初年，中国的耕地数字就固

定下来。中国传统的经济政策出现了历代没有过的大转向。

尽管这些都属于经世派的学问,可惜的是,清人对自己这些东西,从没有好好总结过。一直等到很久很久以后……中间还走了一段大弯路。

为什么要这样说?事情还要追溯到半个世纪以前。据史料记载,1950年1月访问苏联期间,毛泽东曾说,“中国人吃饭难是个普遍的大问题。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发展农业,扩大粮食耕作面积。”(《汪东兴日记》)陈云也认为:“农业增产有三个办法:开荒,修水利,合作化。这些办法都要采用。”(《陈云文选》)在毛泽东编辑的《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也有若干篇章都谈到土地开垦,如天津王顶堤村,几年来共开垦土地1200余亩(低洼地),约占原有面积的十分之一;江苏新海连市朝阳乡农业社开荒2200亩,占原有面积的三分之二;安徽繁昌浮湖乡农业社“大力开荒增产粮食”,在1954年开荒332亩,超过了该社当时的耕地面积;广东台山田美村农业社,也以“入山开荒”作为生产的主要出路。为此“本书编者按”说:“这是短距离的开荒,有条件的地方都可以这样做”,认为土地开垦还大有潜力可挖。这种情况,直到很久以后才有所改变:1974年毛泽东与斯诺谈话,才承认中国没有什么土地可以开垦。

这种思想在本质上是不是改变了呢?怕是未必。农业学大寨,开山造地,各地退归还粮(特别是在广东、福建),恐怕仍然是“扩大粮食耕作面积”,仍然是一种“开荒”。

三、老大难的多种经营

下一步面临的问题就是,如果说耕地已经开发殆尽,将如何谋求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如果清代耕地的增加远不足以解释农业总量的提高,又应从哪些方面去寻求这些方法和原因?这是中国历代没遇到过的重大挑战。

上世纪50年代,最初的口号是“以粮为纲”,但与它的后半句“全面发展”,就不免成为“悖论”。所以后来胡耀邦称之为“以粮为纲,全面砍光”。这里面原因很多,我们只能集中探讨它的“技术方面”,而且仍是从清史出发。

新的探索始于康熙,期望农民不再“狃于种地”,开展畜牧等他种经营(康熙五十五年上谕);继之以雍正,土地增垦、“竭力耕耘”之外,提倡“山泽园圃之利,鸡豚狗彘之畜”,展宽农业经营方向(雍正二年上谕),而完成于乾隆,不独以农事为先务,而兼修园圃、虞衡、薮牧之政。

这一经济发展政策的主旨,就是不再亟亟于土地的开垦,而在已有的耕地上做文章,提高其利用水平,特别重视五谷以外的作物种植,及农耕以外的各种经营。其涵义已不止于“精耕细作”,而在于经济作物等“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村工业和商业的广泛增长。遂为中国经济指明了一条极具可行性的发展道路。

后来有估计说,中国农民经营“副业”的收入,一般占农副业总收入的三分之一,农民中约有五分之一以上专门依靠副业过活。如果加上“工业”部分,相信清代数字还要高出许多。

总而言之,清代的经济增长,可以说全与贸易有关。它成为土地开垦之外,对清代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一个因素,也是清代经济发展的最大成就。这虽非政府一手造成,政府政策的作用却不可小觑。

有材料表明,佃户改种高产值经济作物,依旧交纳稻谷田租;同量田地上耕作者增加,导致亩产量得以提高,田租反而下降,有利于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需要。

反观当代,一般认为,土地改革以后有一个“黄金时代”,其实大可商榷。根据统计数字,到1952年,中国粮食总产恢复到战前水平,人均产量却有所下降;经济作物的下降更是明显,如油料、烟草、茶叶、丝茧的产量降低了一半左右;而且以后很久,这部分生产都未能恢复起来。

到1956年,集体化以后的第一年,问题就充分暴露出来。1956年中,《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社论,5月6日:“一五”计划前三年烤烟生产的计划都没有完成,原因在于指导错误以及价格政策等;9日:越来越尖锐地感觉到油料供应不足;10日:农村副业、手工业生产大大下降,是造成当前农村市场不活跃的重要因素;24日:去冬到今春不少地区农村副业大大衰落;6月6日:由于领导机关重视不够和长期以来收购价格偏低,江浙两省桑园面积和产茧量,目前只相当于战前的

54%和35%;据农业部统计,今年花生、黄麻、甘蔗播种面积都在减少,许多地区副业生产下降了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特别是养猪减少;7月:中央农工部副部长王观澜报告,浙江副业严重下降,江苏长江两岸地区副业产值一般亦下降了30%~80%。

毛泽东为此专门起草了一份通知:河北省粮食以外的农产品占产值71%,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数字。其他各省情形与此有些不同,但粮食以外作物及副业的产值至少占50%,或者在50%以上。各地农业生产合作社要注意多种经营,否则就是一个很大的偏差,甚至要犯严重错误。

生猪的出栏头数从1955年下降,1956年下降为6157万头,比1954年减少20%左右。1956年出现了全国大牲畜数量的首次下降,从此开始了一个持续下降的过程。

而且,极力强调粮食生产,粮食问题并没有解决。在集体化的前十年(1956~1966),粮食生产是零增长;后十年(1967~1977),仅仅是总量增长,人均并无增加。在大饥荒时还能依靠四川、黑龙江,改革前夕则几乎没有一个省份还可调出粮食。

当年“以粮为纲”的做法,不但没有解决中国的粮食问题,反而害苦了那些先进地区。类似的问题,在历史上就存在过,如雍正皇帝曾一度批评广东和福建“舍本逐末”。继1982年福建之后,1983、1984年我两次赴广东考察,目的就是看看在“放开”之后,地方经济将向何方“自由”发展。

简言之,在中国这一农业古国,自发展的早期阶段,粮食生产都是丰富而有余裕的;曾几何时,一些地方改而经营其他经济作物,因此不得不进口粮食(如广东、江苏、福建等),这是一种进步,而不是倒退;如果“倒行逆施”,强令其“自给自足”,结果将会放弃其领先地位,即使获得一时成功,却最终无法解决该地区的发展问题。

“以粮为纲”的问题,到上个世纪80年代初才得以解决。《杜润生自述》中说:1981年中央批转了国家农委《关于积极发展农村多种经营的报告》(13号文件),它关系到健全农业生产结构,和农业生产的战略方向等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生产结构问题和责任制问题至少是同等

重要的。两项政策,一条是包产到户,一条是多种经营,从此把农业推进新的体制和新的生产结构。

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存在着很大的误解。好像在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都主张重农轻商,就只种粮食,不搞多种经营。实际上“多种经营”是禁不住的,在有些朝代还很发达,——《自述》在这里即引述了我的研究。

1982年秋,我把文章初稿交给农村发展研究组。当时小组正准备下乡调查,题目是“包产到户以后”的政策走向,“带头大哥”决定将这篇文稿打印若干份,送中央书记处。多年以后,据友人唐晓峰回忆,某高层人士曾拿此文向他说:谁写得出来?

说到这里应该声明,我无意指陈中国当代改革是受清代影响,不,农村改革是从实际出发,并非受书本和前人影响。但也不可否认,这里面存在有一种“关联”,并且可以“互相说明”。

四、一以贯之的农村工业问题

有关经济发展的第三个方面,是农村工业问题。

有人以为,农村工业是“大跃进”以后才有的,这并不对。也有朋友问我,苏南的乡村工业为什么这样发达?在地区研究中,我专门研究过江南。我的结论是,在清代长江三角洲,曾有一个“农村工业区”。当然,这里说的不是现代工业,而是传统工业。在那里,农家出产主要是工业品——手工纺织产品,基本是以货币结算,出售丝绸、棉布,买米自食及交纳漕粮。不但如此,如果进一步细作区分,可以发现,其最终产品组成中“工业所得”占据大半,“农业所得”不过三分之一。因此,江南也成为当时人口密度最高、经济最为富庶的地区。

与一般所知相反,清代政府对农家工业采取支持态度,好些省份,如河南、四川、陕西等地“劝农”,也都把江苏当做经济发展的楷模。相应的,乾隆时期政府还开放了矿禁。

《杜润生自述》里说:我到国家农委上任,正是1979年初,发现江苏一枝独秀,发展了一批社队企业。乡镇企业在苏南早一步得到发展,也和

近代早期的传统基础有关。他又引述我的研究,说:据中国有的学者研究,在清代这里就形成了一个传统工业区,家庭手工业非常发达,已成为当地农民的主要收入。而且,到本世纪很快就转成现代工业,并形成当地的经济中心,但解放后逐渐趋于凋落。纵观历史,农业向工业生产发展的冲动,在中国是早就存在的,也是难以遏止的。

在追述改革前夜农村形势时,杜润生提出,当时农村已形成了三类地区,各占三分之一左右的比重:一种是集体经济搞得比较好的,一种是处于中间状态的,一种是较差的“三靠队”。所谓“三靠”,即是“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这一类生产队大多在落后地区,显得问题最大。

但是人们往往忽视了,第一类地区即所谓先进地区,问题也很大,只是性质不大一样罢了。这些地方迫切需要放宽政策和解放劳动力,把经济导入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梯。然而,受到宏观经济的制约,这种需要很难满足。集体经济体制既解决不了“三靠队”的脱贫问题,也满足不了先进社队的致富要求。它几乎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为此,1979年,刚恢复工作不久的杜润生就

替中央起草了一个文件。到1982年、1983年的一号文件,突破了只有社队才能办企业的限制。1984年一号文件提出,农村中越来越多的人转入工业和其他非农产业,“是一个必然的历史性进步”,接着转发了《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作为1984年第四号文件下发。为以后乡镇企业迅猛发展,打了个基础。农村工业遂成为此后中国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

发展“多种经营”和“农村工业”,是清代为我们展现的两条极具可行性的经济发展道路。至今,中国农村经济仍然走在这条路上。中间的一度改变,并不能使其中断。

当代农村改革究竟从何而来?不难发现,其中起到主要作用的制度因素,不是别的,正是一定的土地及财产私有、小农的家庭经营、农民选择生产项目和经济行业的某种自由、商品性经营以及市场机制等。而所有这些,都是中国历史中曾经有过的东西。由此看来,当代中国农村改革的内涵,也可称为传统制度的复兴。历史,在这里重新接续起来。■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 洪振快)

(上接第34页) 注释:

注1 一说是申伯纯听到首批特赦人员要安排工作的消息后,“主动找有关领导人建议,让这批具有相当文化水平而又许多重要历史事件的当事者和见证人,到政协搞文史工作最为适宜。……有关方面同意了这一建议。”(汪东林:《文史资料工作开创时期纪事》,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办公室编《纵横春秋五十年:人民政协文史工作者纪事》,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

注2 后来逐渐增加到36人。王述曾、王耀武、文强、方靖、吕光光、朱洛筠、任宗德、孙吉甫、牟中珩、杜聿明、杜建时、李佩青、李以勳、杨伯涛、杨格非、吴淑班、沈醉、宋希濂、张学文、陈子坚、陈树华、范汉杰、罗历戎、周振强、郑庭笈、赵子立、黄维、黄苗子、康泽、董益三、溥仪、溥杰、廖耀湘、端木和、潘君密、冀毓敏。(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目录汇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文革后,文史专员室重新恢复活动。八十年代以后,“除两三位组长外,大都已不再坐班。”(黄森:《他们在这里度过了有意义的晚年——记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室》,《文史资料选辑》第134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七届政协后,老的文史专员,都已成为全国政协委员。”(文强:《我在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室》,《文史资料选辑》第134辑)

注3 据李义勋说,前三批特赦人员充任文史专员不是18人,而是16人:溥仪、溥杰、杜聿明、范汉杰、宋

希濂、王耀武、廖耀湘、康泽、董益三、沈醉、杨伯涛、郑庭笈、周振强、杜建时、罗历戎、李义勋。(《我所知道的廖耀湘——当年在缅北痛歼日寇名震中外的历史人物》,《文史资料选辑》第146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年版)

注4 黄森:《他们在这里度过了有意义的晚年——记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室》,《文史资料选辑》第134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截至1981年底,文史专员共写出了320篇、475万字的现代历史资料,还协助文史办公室审阅了近4000万字的资料。(党德信:《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室二十一年回顾》,《文史通讯》1982年第2期)

注5 这种情况在七、八十年代之际的一些地方文史资料上还是如此。比如,1978年底,天津文史部门在“保证继续往全国政协输送稿件的同时,开始编辑出版有天津地区特色的《天津文史资料选辑》。……初期的目的是供领导及历史研究部门和有关单位参考,故限于内部发行。‘选辑’出版以来,获得很高的评价,读者队伍迅速扩大,有很多单位或个人开介绍信前来购买,大有供不应求之势。”(谢天培、乔维熊:《天津文史资料工作纪实》,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办公室编《周恩来同志倡导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四十年纪念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

(作者为河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洪振快)

苏俄的“政治自由”问题

○ 金 雁

警惕“一个在共产主义基础上的革新了的皇帝专制”

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俄国、俄国社会民主党诞生之日起,就把“争取政治自由”列为头等目标。追求“政治自由”还是追求所谓“人民专制”,曾经是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脱离民粹派阵营而自立门户的两大标志之一,后来又是区别俄国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的两大试金石之一(另一个是承认资本主义为必经阶段还是追求从传统农村公社过渡到“社会主义”)。作为俄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奠基之作、被列宁称为“教育了整整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的普列汉诺夫的“老三篇”中,除了《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讲的是哲学外,其他两篇即《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和《我们的意见分歧》都以批判“人民专制”、强调政治自由为主题。普列汉诺夫当时曾一语成谶地警告:“人民专制”下的“革命”可能会造成一种“反动”的“政治畸形现象”,“有如古代中华帝国或秘鲁帝国,即一个在共产主义基础上的革新了的皇帝专制”。^{注1}

为了防止这个不祥的后果,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们一再强调政治自由的重要。针对民粹派关于政治是否自由无所谓、经济上均贫富才重要的说法,普列汉诺夫回应:“争取政治自由是我们‘完全确定的政治纲领’”。针对民粹派关于“人民专制”下只有“人民”以及代表他们的革命党有发言权的说法,普列汉诺夫明确主张再革命的“党”也不能封别人的嘴:“俄国的社会主义者既在原则上承认了言论自由的权利,并把这样的要求列入自己的纲领,他们就不能只让那一自命为在當前革命运动时期有领导权的‘党’派来享受这一权利”。^{注2}在司徒卢威起草的《俄国共产党宣言》中,也把争取宪政民主、争取“新闻与出版自由”提到显著的位置,该《宣言》认为,争取“政治自

由”是实现无产阶级伟大使命的第一步,并表示要“坚持不懈地使自己的全部行动都符合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党的基本原则”。^{注3}以后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党纲在其他方面的内容都根据形势的变化做过不少更改,唯独这两条始终保留在“十月革命”前的历届党纲中。

“争取政治自由是我们最直接、最重要的任务”

列宁那时在这方面也不甘人后,他指出,人们转向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步,就是要坚决抛弃那种“反对政治自由(据说这只能使政权转到资产阶级手里)的彻头彻尾的民粹派分子的观点”。^{注4}列宁也非常注重出版的自由和舆论信息的公开化,他常说,只要能够发出声音,让群众知道真相,革命就成功了一半,用压制和剥夺非生产性集团的权力(如选举权、结社和出版自由等等)来限制民主是反动政府的一贯主张。

列宁把“经常出版秘密出版物”列为革命运动核心任务之一。^{注5}到“十月革命”前俄国社会民主党已经出版了40余种报纸。^{注6}列宁在革命年代大量的文章都在抨击沙皇第三厅的政治特务和书报检查制度。列宁发誓革命胜利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做到新闻自由。他认为争取政治自由是社会主义者的当务之急。^{注7}所以毫不奇怪,当民粹派说均贫富比言论自由更重要时,他们受到了列宁的如下痛斥:“那种为了虚幻的经济利益而离开争取政治自由这一俄国社会党人最直接最重要的任务的图谋”,实际就是“背叛伟大的社会革命事业”。^{注8}

“十月革命”后“临时性的”新闻管制

但几乎在夺权后的第一天,列宁就转了调

子。“十月革命”前列宁还声称不会像法国大革命那样使用恐怖手段来维护政权,但是拿到权力的第二天,布尔什维克就颁布《关于出版的法令》,建立了临时的书报检查制度,在该法令中明文禁止反对派的出版自由,把一切不属于布尔什维克控制的、反映不同声音的报纸都说成是“毒害大众心灵并使群众意识发生混乱……危害性甚至超过炸弹和机枪”的“资产阶级最有力的武器之一”。不久出版业很快被国有化,约有1000家造纸厂和印刷厂全部归为国有,1920年国营出版社的比例已达到92.4%。^{注9}当时所有的商店都接到上级的通知,只有党所认可的“工人阶级的组织”才有使用印刷设备和纸张的权利。根据1918年11月颁布的《图书馆和所有藏书征用办法》,私人的藏书和原沙皇机构的藏书全部充公。

列宁解释说,出版和集会自由这类“纯粹的民主”是骗人的鬼话,“我们向来不承认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这种说法就连以极“左”出名并得到列宁高度赞扬的革命家卢森堡也不能接受,她曾对此尖锐批评道:“只有仅仅给与政府的支持者和一党成员的自由,就不是自由。自由应当总是对于那些持有不同想法的人而言的”,“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集会等自由,公共生活就会逐渐毁灭,就只能是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雅各宾派统治意义上的专政”。^{注10}而列宁反唇相讥道,暴力夺取政权必然要用暴力来维持,任何阶级都没有“彻底的民主”和“无限制的公开性”,“资产阶级在全世界还比我们强,强很多倍,再让它有建立政治组织的自由(出版自由、因为报刊是政治组织的中心和基础)这个武器,那就是为敌人的活动开方便之门”。“我们不愿自杀,因而决不会这样做”。^{注11}

但列宁也心知肚明,这样做与革命党时期的宣传、与无产阶级追求的理想目标是背道而驰的。虽然他一方面说,我们的专政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注12}但同时他认为这样做是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不得已的策略。列宁希望这种做法能为自己赢得喘息时间,通过喘息时间可以重新赢得民众对自己的支持,然后再调整自己的政策恢复民主,列宁认为只有这种策略才能挽救革命。面对第二国际指责他领导的“布尔什维克行动唯一的积极结果就是建立了一个新的军

国主义”^{注13}时,列宁并不是那么理直气壮,而是强调情况的特殊。他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中多次说:“任何一个国家,即使是最民主的国家,在宪法上总是留下许多后路或保留条件,以保证在有人破坏秩序时”有应对的措施。^{注14}这时列宁真实的想法是,把民主和专制都拿在手里,在自己没把握的时候用“专政”,在自己有把握的时候用“民主”,但是这种“有把握的”自信一直就没有到来。

这种想法是当时俄共(布)党内很多人的共同认识,包括托洛茨基在内,他们都承认,“政治垄断权”只是一种“紧急措施”,一旦紧急状态结束就要撤销它,“十月革命”后取消出版自由的措施是暂时的、不得已的。所以在1918年的“出版法令”中申明,这是“一些临时性的紧急措施,只要新社会秩序一经巩固,就撤销对出版物的一切行政管制,并将按照最宽容和最进步的规章,在担负法律责任的范围内予以出版物的充分自由”。^{注15}即便如此,当时党内的卢那察尔斯基、党外的高尔基都曾对俄共书报检查制度的专横粗暴做法表示过愤慨,他们大力呼吁尽快出台正式的出版法加以规范和限制权力对新闻出版业的干预,高尔基曾以放弃俄国国籍抗议布尔什维克践踏新闻自由、取缔其他党派的报纸,高尔基质问道:布尔什维克半年取缔的报纸比整个沙皇时代加起来还要多,为什么害怕与自己不同的意见,难道要把社会公众的思想也要变成国有的吗?要把国家变成巨大的监狱吗?^{注16}“真正的‘自由生活’不应该建立在反对个性发展的基础上,更不能建立在罪恶的基础上,否则,我们就可能用自己的双手来扼杀自由”。^{注17}

从“临时性”管制到“长期净化俄罗斯”

但是随着内战的爆发,取消“战时状态”的“管制”的诺言成为泡影,新闻与书报检查的行政管理不是逐渐宽松,而是越来越紧。那个时候,即使是不计前嫌的孟什维克放弃反对布尔什维克的主张,而与他们联手反对“白卫势力”的时候,他们的出版物也被严令禁止,苏维埃政府不允许他们“以写作为掩护”毒害人们的思想。^{注18}列宁强

调说,“我们不承认任何‘私人’性质的东西”^{注 19},对“出版业”要“拉紧缰绳”,警惕那些“用写作为白卫组织打掩护”的“当代农奴主的刊物”^{注 20}。1922 年夏天在列宁的指示下,各大城市都逮捕一批科学家和人文学者,准备把他们驱逐出境。列宁批示道:《经济学家》杂志“是当代农奴主的刊物”,应予以查封;《文学者之家》和《思想》杂志所有的作者,要么是最狡猾、最阴险,要么就是布尔什维克最凶恶的敌人,把几百个这种先生毫不吝惜地驱赶出境,我们就将长期净化俄罗斯”^{注 21}。他还在 1922 年 5 月 19 日给捷尔任斯基的信中说,给《经济学家》杂志撰稿的人“是最应该被驱逐出境的”。^{注 22}三个月以后,一百多名俄国顶尖级的人文学者被驱逐出境(他们对俄罗斯文化的贡献直到剧变以后才得到承认)。尘埃落定后苏维埃政权并没有兑现“等打完仗以后”就“还原无产阶级民主”的许诺。而从此以后,第二国际和 1919 年成立的第三国际就有了“民主社会主义”和“专制社会主义”、“强制社会主义”(鲍威尔语)之分。

因为革命后“一国社会主义”的“孤岛”生存意识,清除外患以后专政的利剑又落在了本国民众头上,步入正常的宪政轨道已经变得遥不可及。正如时人所说,这种“强制社会主义”的落脚点是在“强制”上,而不是在“社会主义”上:在统治者根基不稳的情况下,保住权力立刻就上升为第一政治要素,“布尔什维克主义形成的自我概念使它和它的母体西方马克思主义明显的区分开来”,^{注 23}“制造出的革命根本不像他们原来打算的那个样子”。^{注 24}俄共(布)把人权、多元文化与党国体制的生存对立起来,认为“多声部”的社会生活会对管理者造成麻烦。就像托洛茨基所说的,如果“每一个劳动者都认为自己是士兵”,国家的事情就好办了。扎米亚京在他的预言性小说《我们》中概括得更形象:这个体制的实质不是从“人”着眼,个人必然会成为“多余的”,因此个体必将被毫无个性的“我们”所击败。

苏俄内战结束后建立“全能的管理体制”就是以俄共的存在为最高准则的,所有的人都被当做“潜在敌人”和竞争对手,是需要防范的。于是管理、压制成为一种常态,对人实行“管、关、杀”,和对言论和出版物实行“查、封、堵”是最常见的

政策。对待新闻出版行业自然也不例外。1922 年苏俄成立出版总局,它的明确职能主要是规范和管理私人出版社、杂志社、印刷厂、图书馆,预审各种出版著作和期刊并作政治上的把关等等。老百姓都知道,名曰“出版总局”实际上是“查禁总局”,它所管辖的事情甚至比尼古拉一世的“第三厅”还要宽泛、还要严厉,因为谁都知道伴随尼古拉一世严厉的新闻审查的是繁荣的俄罗斯文学创作期,而在俄共的舆论控制下文化出版业是一片凋敝。比如苏俄 1920 年出版的图书只是沙俄 1913 年的 1/10,而且主要还是执政的布尔什维克党的政治宣传品。当时判断作家的标准,就是看他对红色政权的态度,20 年代初只有别德内、绥拉莫维奇、马雅可夫斯基、布留索夫、勃洛克等少有的几人的创作被认为是具有进步意义,是可以出版的^{注 25}。其他作家的创作以及沙俄时代的文学作品都在“被禁”之列,高尔基的《不合时宜的思想》也在“禁书”的名单上,如果在市面上出现这类“黑货”是要被处罚没收的。

经济放开 政治收紧

实行新经济政策的 1924~1925 年,出版总局的预审和政治把关曾经相对宽松了一两年,带有批评倾向的一些杂志如《经济学家》、《新生活》又悄然出版。然而到 1926 年新闻与出版行业的管制与查禁的势头再次卷土重来。1926 年一年就查禁了 4400 期国外期刊、5276 部书籍,撤销了 975 部作品,从 1927 年以后每年没收的出版物达到 20%~30%,哲学和宗教类的达到 40%,政治和历史类的达到 23%。^{注 26}20 年代末私人出版社全被查封停业,多元化的新闻出版活动完全停止,查禁书目、报刊、勒令停演的剧目比例大大上升。而出版总局用来“书报检查”的机构越来越庞大,远远高于尼古拉一世时期,到斯大林时代的 1938 年出版总局下设 15 个处,仅出版前“把关”和出版后的“政治审查”人员就有 525 人之多。到 1940 年仅俄罗斯联邦中央一级的“书报审读员”就多达 5000 人,另外还建立了总局特派员和“政治编辑”制度,专门负责报刊书籍的“政治思想审查”和“敏感问题”报批制度。在那些曾经从俄国“黄金时代”汲取营养的

一代知识分子中，“怀念”旧俄国竟成了一种“私底下的享受”，他们发出感慨，“那个时候的日子是多么美好”。

当然，这个体系并不是原来就预设好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步步走向这个结局的。在1920年代前期，俄共（布）一直在“无产阶级民主”和极权国家之间摇摆不定。这种两难困境的紧张对立使执政党内无法保持平衡，一边是要维护布尔什维克党天下的“生存”紧张感，一边是如何兑现原来理想主义的奋斗目标的紧迫感，最后政治实用主义制度发展超越了理想的追求，宁肯“背叛伟大的社会革命事业”，也不能丢掉政权的思想占了上风。在列宁去世前后俄共（布）尚处在摸索阶段，在“这样试试，那样试试”、一切还没有“定形”的1920年代上半期，执政党的控制手段忽紧忽松，并没有形成一定之规，列宁也表现得前后不一致，他时而高调批评执政党的“狂妄自大”管得太多，说没有文化的繁荣和新闻的自由就不能取得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就，转而又赞成对与“共产主义格格不入”的“新闻原则”采取严厉的措施。总的来说，这一阶段列宁是主张经济放开，政治收紧。列宁的一个特点就是非常善于运用“群众”和“精英”这两手：当他的意见和党内领导层相左时，他就在媒体上呼吁，强调要落实革命的理想，期望从群众的激进主义思潮中调动资源与他的观点遥相呼应；而当他控制了党内的力量违背了群众意志的时候，他就会说，“十来个聪明人（无非是指职业革命家或政治领袖）”胜过“数以百万计的群众”。^{注 27} 有人就此指出，列宁张口闭口的“多数”并不是“数量大多数”，而是“政治大多数”，而这个“多数”其实就是他自己。

瓦尔金与米亚斯尼科夫仗义执言

当时社会上关于言论和出版自由呼声不断高涨，党内也有强大的“解禁”的推动力。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1921年的“瓦尔金事件”、“米亚斯尼科夫事件”和“工人反对派”的呼声。1921年4月份全俄肃反委员会的特派员瓦尔金给中央上书，要求允许“苏维埃中有反对派”，建议给他们“法律允许内的活动自由”和“发表自己意见的自由”。^{注 28} 接着5月份一位有15年党龄的老党员

米亚斯尼科夫给列宁写信，谈到对革命后的制度建设等一系列重要问题的看法时指出，“要多给工人、农民一些自主性，给予工会、农会、和工农检察院相应的权力、给予一切政治派别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他说，“连土耳其这样的国家里都可以建立农民协会”，我们为什么要惧怕农民自治组织呢？他特别强调必须给予民众“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他提醒列宁说，这曾经是我们党成立时期就为之奋斗的“主要任务”，在革命时期您也多次强调，言论自由是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力的基础之一，而在目前兑现这一点“能够激发工人农民经济生活中的积极因素”。米亚斯尼科夫向列宁建言说：“我们需要制订一个言论和出版自由法，使那些发昏的热心人不至越轨，必须把全国最大的日报之一办成各派社会思想进行论战的报纸，苏维埃政权要像罗马帝国一样，用自己的钱供养起诽谤他的人，这也将是我们俄国条件下的出版自由，我们的任务是使我们的出版自由为遵守法律的人所用，而不是为资产阶级所用，这种自由在世界上从君主派到无政府主义者无论谁都未曾见到。我们可以利用这一措施来加强我们在城市和广大农村群众中以及在全世界的影响。”^{注 29}

米亚斯尼科夫针对党的任命制导致的“官僚化”现象进一步指出，现在党组织已经成为站在金字塔顶端的法老和奴隶主，上层领导正在腐败，酗酒成风，再加上官官相护、徇私舞弊、机关门禁森严、杂乱无章、办事拖沓等都有所发展，任命工作人员的原则是任人唯亲，靠机枪保护的“历史”成了笑柄——这是醉生梦死的历史。领导阶层与群众已经形成一种对立，凡是胆敢提出批评的人，只要你不赞同一贯正确的教皇，只要是有悖于领导的意见，都将划入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之列，就是居心不良的反革命，或者被开除出党，或者说你是精神病人，难道你们要把党员变成百依百顺的留声机，变成厨娘手里的土豆，工人们要问：我们究竟是什么人？我们当真是阶级专政的基石吗？或者只不过是驯服的羊群，只是作为统治阶级的垫脚架呢？他请教列宁说，“列宁同志，你是否认为拯救革命的办法就是机器般的服从呢？”^{注 30}

米亚斯尼科夫在给列宁的信中反复论证“言

论自由”的重要性,他指出,“有人说,假使我们实行言论自由,那么非党群众和苏维埃的敌人一下子就会知道一切迄今对他们保密的东西了……以为非党群众不了解这些混乱的现象的想法并不对,这些现象他们不是从我们报纸上,而是从活生生的人们那里得知的。非但如此,非党群众知道的情况要比省里领导人知道得还要多。肃反委员会经常因散布‘谣言’逮捕一些人,而这些人无非比他们多知道一些情况而已,这种‘保密’带来一个结果,人们不再相信我们的报纸,秘密外交屡遭失败,而我们的敌人知道的情况要比我们想象得还要多。谁害怕工人阶级和农民思考,害怕他们说出自己的看法,谁就总是提心吊胆,认为到处都是反革命。工人阶级用一道铜墙铁壁把自己和共产党隔开,共产党员什么都不知道,正如当年的密探一样,工人们把共产党员不是称作党支部,而是称作‘党探子’。这是为什么?原因在哪里?你是否会说工人阶级会平白无故的惩治共产党员?你是否会说工人阶级从前和现在都有言论自由?我要说这是谎言。工人阶级之所以要惩治共产党,是因为共产党在1921年把1918~1920年间对付资产者的办法(肃反委员会)用到了工人阶级身上,这一切应该收场了。1921年当无产阶级镇压了剥削者的反抗,建成了全国政权后,当时你担心言论自由可能成为资产阶级的一种力量,而现在的言论自由则成了无产阶级的一种力量,言论自由是无产阶级完成新任务时的基础。您宣称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不是无产阶级的口号,不是党的口号,而是资产阶级的口号,难道无产阶级不需要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吗?”^{注31}

革命以后人们不禁要问:“这就是自由王国吗?这就是伟大的飞跃要我们带向的那个地方吗?”^{注32}

来自“左边”的政治自由呼声: “工人反对派”

对缺乏政治自由不满的人这时已经不止来自“右边”,来自知识分子和倾向自由民主的人;而且也来自“左边”,来自工人群众、老工会活动家和坚持革命时代理想主义的“不识时务者”。他们在新经济政策初期与主张经济放松、政治收紧的列宁截然相反,在经济上敌视市场和私有制,

政治上则呼吁自由、自治而反对专横和集权控制。他们形成了当时颇有影响的“工人反对派”。套用今天网上的一个新词,这个派别的特点是“政右经左”。“工人反对派”是1919~1922年俄共(布)党内代表工人利益的派别,也是在列宁死后俄共最高层发生内斗之前、列宁生前最重要的党内反对派之一。他们认为革命的布尔什维克执政以后上层发生蜕变,脱离群众,成为新的官僚主义者;指责1921年搞的新经济政策是在俄国复辟资本主义。他们要求重建党内民主、承认党内反对派并实行派别组织合法化、扩大工会的自治权利等。其代表人物是革命前布尔什维克最高层长期流亡国外期间一直坚持在国内搞工人运动的施略普尼科夫,以及柯伦泰、卢托维诺夫、梅德韦杰夫等人。^{注33}

这些人与米雅斯尼科夫等人有共同的想法,他们在散发的《工人反对派》小册子中就发扬民主、反对官僚主义、呼吁言论新闻自由有更加系统的理论。他们说,目前苏维埃国家机构的数量已经比沙皇时代庞大几十倍,一个新的统治阶层正在形成。我们战胜了敌人,却不能战胜自己,我们的革命和建设已经走样了,我们偏离了最初的道路。……不能允许党的组织把苏维埃的职权篡为己有。国家的最高政权集中在堪称“寡头政治”的政治局手中,“官僚主义这一祸害自然是集中在中央”。^{注34}因此“工人反对派”向党中央提出了两点基本原则:

首先,党必须回到选举原则上来。所有官员必须对群众负责。“任命制”、“委派制”不是无产阶级政权组织建设的理想模式。“工人反对派”本身就是在反对1919年3月俄共八大通过的《关于组织工作》的决议的基础上形成的,正是这个决议制定了干部任命制的原则,这种以中央组织部任命干部的程序在党内产生一种非常不健康的空气,成为官僚主义和寡头政治的温床。仅1920年半年间俄共(布)中央就任命了37547名“拥有独裁者无限权力的”^{注35}“政委”,1920年8月召开的“九大”决议中提出提拔党员到重要的领导岗位,“全党的组织任务就是把党的队伍中的全部60万党员分配到各个党的工作岗位上去”。^{注36}这些委派下去的“政治委员不受约束、胡作非为”,使民间已经发出了“取消委员制、打



去世之前的列宁,与妹妹和医生在一起。摄于1923年夏,当时斯大林已经实际上掌控了权力。

“倒政治委员专制”的呼声^{注37}。革命胜利后工人“无权选举自己的委员会、自己的机关,这样搞下去,革命就会失败”。^{注38}连《真理报》都承认那些削尖脑袋钻入党内的投机分子,是“把党看成了带馅的大包子”。^{注39}1921年政府雇员人数比1917年增长4倍多,1922年政府所属的各种委员会多达120多个,国家机构的数量十倍于沙皇时代,1918年莫斯科的中央和地方职员有23万人,1920年克里姆林宫的开销比当年莫斯科全市的社会福利的支出总额要高得多。曾经到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而为我们所知的老革命家岳飞后来成为托派,他当时也批评说:党内“存在着巨大的不平等,个人的物质状况主要取决于他在党内的地位”。^{注40}的确如此,早在20年代,党的官员的工资就比同级的政府雇员高出50%。^{注41}工人反对派的代表人物米洛诺夫痛斥列宁是“最大的官僚”,是沙皇官僚制度政治上的继承者,他

“把被动员起来的群众当作盲目的工具,当作被送往屠宰场的‘愚昧无知的牲畜’”。^{注42}

其次,“工人反对派”坚决反对党的领袖那种“教皇式的一贯正确”和“政治局具有批评豁免权”的特权,他们说,党不应当继续生活在内战时期纪律的高压下,这种状况应该让位于更活跃、更宽泛的现代政党责任制,俄共要回到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上来,要看到社会主义斗争历史上反对派存在的必要性。欧洲社会主义政党所普遍接受的规则、经实践证明可以保持党的生命力的原则,我们为什么要抛弃?!他们提出要废除禁止“党内派别活动的禁令”,要让党内各个派别和集团合法化。他们认为党内的民主和多元是唯一能保证共产党立于不败之地的先决条件。就连沙皇在1905年的《十月十七日宣言》中都承认思想反对派的存在,莫不成布尔什维克比沙皇还要更加政治垄断吗?没有意见的交锋,没有各个派别的斗争,没有反对派,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民主,即使在资产阶级装模作样的“民主”中,这一原则也被明确地规定为一切真正的民主的形式上的先决条件。对党内的争论要广泛的公开,党的纲领中要明文规定有发表的自由和表达的自由,党的代表大会讨论期间给与全体党员自由批评的权利,而且对于不同派系提出的文件,要给予动用出版基金的权利。“社会主义自由”是时代的最强音,如果连这些已有的社会主义政党都遵守的原则都做不到的话,无产阶级的奋斗目标只不过是——一句空话。

“国家就是我们”:列宁与党国体制的建立

列宁认为“工人反对派”的这种“救党”主张只是那些目光短浅的庸人之见。其实早在1920年10月11日,列宁在给布哈林的一张便条上便以直白的语气写道:“只要以整个中央的名义声明(并论证)以下几点就够了:……无产阶级=俄国共产党=苏维埃政权”,^{注43}苏俄的“党国一体”的模式就是列宁建构的。在1922年俄共11大政治报告中,列宁以斩钉截铁的语气说,“当我们说到‘国家’的时候,这国家就是我们,就是无

产阶级 就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国家就是工人 就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分 就是先锋队 就是我们”。^{注 44} 那些“不明就里”的“工人反对派”一直认为 这个“工人阶级”还包括他们这些产业工人 殊不知工人阶级的“先进部分”其实就是出于金字塔顶端的“小集团”。当然到列宁生命的晚期 当他发现自己这个名义上的领袖已经被实际权力无限的总书记架空的时候 他又深感“对不起俄国工人阶级” 这已经是后话了。

从此以后苏维埃丧失了其民主性和代表性 从“通过劳动者进行管理的机构”变成了“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对劳动者进行管理的机构”。^{注 45} 托洛茨基更是强调说 在这样的堡垒中绝不允许任何反对派存在 哪怕只是一个弱小的反对派。^{注 46}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就没有想到有一天他也会成为“反对派” 会向共产国际控告俄共中央委员会践踏党员的权利。布哈林当时有一句名言：“我们也许有两党制 但两党中一个当权 另一个入狱”^{注 47}。不知道后来他被斯大林囚禁在狱中的时候 自己对这句话作何感想。列宁早就想把工人反对派驱逐出党 但是他在 1921 年初的中央委员会上仅以一票之差没能获得 2/3 多数 于是他授意斯大林在第十次代表大会的秘密会议上宣布严禁党内组织的派别活动 并赋予他强硬的组织决断权 从此开辟了“总书记的决定权没有边界”的先例。^{注 48}

“按照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回答 我们早就该关门了”

1921 年政府用强力解散了不驯服的工会代表大会和工会委员会 并镇压工人的反抗。党内的“工人反对派”也被十大的“党禁令”宣布为“非法组织”。政治局否定了瓦尔金的建议 1922 年 2 月 20 日在列宁的建议下 俄共中央政治局批准将米亚斯尼科夫“革除教门”。^{注 49} 这是俄共(布)创建以来第一次因言论而开除党员 从此以后全党就再没有人敢提“政治自由”和“言论自由”了。后来在党内斗争中一次次地把敢讲真话的人剔除出去 那些用党内民主反对专制的人都遭到了灭顶之灾。以后党内就不再有争论 不再有人们的思想的碰撞 有的就是死水一潭的顺从和一些

马屁精、趋炎附势者向“权力中心”的靠拢。马克思曾经强调的社会主义民主和自由已经被连根拔掉 理想主义者的抗争以失败告终。列宁的党既然把沉默加到了俄共(布)党内 对党外的管制就更不在话下了。1923 年《真理报》发表社论指出党的“代表大会不允许任何人拿‘党专政’的问题开玩笑……那些喊叫要在这方面加以‘修正’的人没有一点市场。”^{注 50} 人们这才明白 以“工人阶级的名义对工人阶级使用暴力”已经成为事实 “苏维埃政策完全背离了早期共产主义纲领所表现的符合阶级实质的原则”^{注 51} 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传播和俄国革命的初衷已经被歪曲得面目全非。

倒是斯大林一语道破天机。他说：“按照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回答 我们早就该关门了 既然你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想关门了事 而相反的想继续生存 那么国家政权就应当存在和应当加强 无条件地应当得到加强。”^{注 52} “党的利益高于形式上的民主”、“形式上的民主是空洞的 而党的实际利益才是一切”。^{注 53} 他尤其强调 “恩格斯并非完全正确 如果我们在自己的著作中有什么地方触犯了恩格斯 这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注 54} 于是在苏联 马克思主义所剩下的仅仅是一些空洞的、貌似相似的“意识形态化”的词句 “成为一种公认的、不可抗拒的、但又极其乏味的官方说教”^{注 55}。马克思主义从此变成了一门“官学” 就像普列汉诺夫当年斥责“合法马克思主义”依附于权势时说 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论证方式是“颁布命令式的” 结果变成了这样 谁有权颁布命令 下达判决 谁就代表马克思主义。他们把原来只有靠逻辑的力量才能说服人的理论 在掏空其理性内容后 装上自己的私货 然后运用权力去推行。难怪葛兰西把“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叫做“反对卡尔·马克思的革命”。成功夺取政权的布尔什维克党要实现的“争取政治自由”的任务 就这样被执政后的俄国共产党抛弃了。后来流亡出国的托洛茨基才明白过来：“赝品”不论在外表上多么形似 和“原本”之间都是有很大差距的。■

(本文注释见本刊网站)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 洪振快)

来 信 摘 登

贵刊 2010 年第 11 期刊登的《朱厚泽和他的“三宽”》一文阅后受益不少,但对“‘三宽’意味着什么”这一节中有关“三宽”意义的论述还想斗胆做一些补充,或者说将其中的第三个论点说得更为明确:

实行“三宽”有利于新思想、新观念、新制度的发育成长。凡是新的东西,与传统总有不同的地方,否则怎么能称之为“新”?如果稍有不同,就一概扼杀,一概打倒,“新”的怎么能发育成长?连孕育也不能了,因为孕育了,就要面世,那就立刻面临死亡,有多少人愿意来做这样的无用功,甚至自取其祸?那人类的思想,就只能永远在一个老框框里,社会就无法前进了。当然,在“三宽”政策下,也可能难以防止错误的东西出笼,那也不可怕,要相信大多数人的识别能力,要相信实践的检验。错误的、使社会倒退的东西,终究是站不住脚的。所以,应当努力实行“三宽”,以此来促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并以此来阻止像“四人帮”那样的政治骗子为了一己的私利,设置若干禁区,限制和绑架人们的思想,阻挡改革的潮流。

江苏泰兴 何泰一

读贵刊 2011 年第 3 期钱江先生《国际问题评论员蒋元椿》一文,其中写到 1955 年蒋元椿被调到人民日报社,李慎之留在新华社之事。“没有想到,这成了蒋元椿一生的转折点,两年后他被划为‘右派’,蹉跎 20 年。”按此文义,如果蒋先生不调到人民日报,留在新华社就可免遭划“右派”之厄难。愚以为以蒋先生的为人和思想意识,1957 年在新华社也难逃划“右派”的命运。李慎之没调出新华社,一样被划为“右派”,后文又写到蒋先生的夫人张黎在新华社被划“右派”,就是佐证。所以蒋元椿调到人民日报一事,未必是其一生的“转折点”,1957 年的“反右运动”才是。

北京 李三达

贵刊 2011 年第 2 期刘绪贻《亲历大跃进中的湖北教育革命》一文中提到,马寅初的人口理论因为不

同于毛泽东的“人多力量大”的观点,而被认为是反动言论,并被错划成“右派”。

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彭华著《马寅初全传》(2008 年出版)第 184 页说:“把人口讨论政治化的文章发表后,有人主张把马寅初定为右派。周恩来总理了解到这个情况后,明确地对当时中央统战部副部长许涤新说:‘马寅初这个人有骨气,有正义感,是爱国的。他是我国有名的经济学家,国内外都有影响,不能划为右派。’此前,周恩来曾与陈云商量过此事。陈云认为,马寅初是热爱党和社会主义的,他的《新人口论》的基本观点是正确的,坚决反对把马寅初划为‘右派’。由于周恩来、陈云的出面制止,马寅初才平安地度过了 1957 年。”从此文可以看出,由于周恩来和陈云的大力保护,马寅初未被划为“右派”。

在此之前,《炎黄春秋》上谈到马寅初的文章,都没有说把马寅初划为“右派”。不知刘绪贻教授的根据是什么?

读者 冯维孝

2 月 26 日

经核实,马寅初先生 1957 年确实未被划为“右派”。昆明读者宋兴义先生亦曾来函指出此事。非常感谢!——编者

《炎黄春秋》2011 年第 2 期刊登的《我的右派经历与反思》,文中第 28 页有“鬼域犹得诉罗殿,圣朝无处哭昭陵”的诗句,其中的“鬼域”应是“鬼蜮”之误。同页有“共产党打了三场战争(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之句,其中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应改为“第二次国内战争”。

同期刊登的《刘瑞龙指挥百万“民工大军”》,文中有“昨日孙元长兵团突围时被我军全部消灭,仅八纵就俘虏 1.1 万多名”(第 73 页),此处的“孙元长”应当为“孙元良”之误,其所部为十六兵团。据《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简史》载:“孙元良部刚一突围,就被围歼部队发觉。一部当即被堵回,逃出的主力被华

野第八纵队和冀鲁豫军区、豫皖苏军区地方武装分别歼灭于永城附近之黄瓦房、张老窝和亳县地区。”

同期《我策划了冲击三军演出事件》中“4月16日,三座门夺权见肖华、关峰”一句(第34页)，“关峰”应是当时在中央文革红极一时的“王关戚”中的“关锋”。

上海读者 朱夏生

我是贵刊的忠实读者,兹有一疑问请赐教。

据2010年11期第59页,梁文斌《我向中央告省委》一文所记,“大跃进”时期安徽省死人特多,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是个执行极“左”路线特别积极、不顾人民死活的人,1962年元月在中央七千人大会上因此受到毛泽东批评而被免职。而据2011年2期第64页,许人俊《邓子恢和六十年代的包产到户试验》一文所记,却是另一种情况,可说是“大相径庭”。邓于1961年到合肥。他早就耳闻安徽搞包产到户责任田,曾希圣向他汇报,说全省已有39.2%的生产队试行责任田,社员生产积极性高涨,产量增加,效果很好。邓子恢十分赞赏。次年初在中央七千人大会上,曾希圣因此受到毛泽东批评而被免职。

我看过其他一些资料,均记载曾希圣是梁文斌所述情况。把曾希圣说成是违背毛泽东意志,顶着压力搞包产到户的好领导,我第一次从许人俊文中看到。

我是82岁老人,不会上网,特写此信,望赐复释疑。

应山红

许人俊先生答复如下:

经与梁文斌同志电话沟通,我作如下答复:

一、我和梁文斌写的都是历史事实,也同属安徽农村工作范围的事情,它们既有联系,但又有区别。

我的着重点是记述六十年代灾情严重时,我国各省农村正在寻求用各种方式恢复发展农业生产度过灾荒的途径,其中包括安徽试行的包产到户责任田。邓子恢副总理负责分管农村工作,始终坚持实事求是,重视调查研究,他在合肥会见曾希圣问及农村情况。尽管当时全国上上下下对包产到户责任田有严重分歧,但因邓子恢不仅是国务院副总理,而且是新四军的老领导,为人一向随和,平易近人,所以曾希圣向他如实汇报安徽试行包产到户责任田的情

况。邓子恢认为办法很好,后来特地派副部长王观澜带领工作组,到安徽农村做深入调查,确认效果明显,故而决定大胆向毛主席竭力推荐。在这一点上,曾希圣顺应了民心,从历史实践观点看,他在安徽推行包产到户责任田,这个历史事实应该充分肯定。

至于梁文斌的文章,则主要是记述曾希圣隐瞒安徽灾情,扣押告状信,封锁消息,惊动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受到批评、撤职等等内容,则是叙述的另一件事,反映他工作作风横行霸道,搞一言堂,同样也是历史事实,但没有否定曾希圣推行包产到户责任田的正确性。

两篇文章叙述同一时期、同一农村、同样人物,侧重点不同,内容并不矛盾。我和梁文斌同志通过电话沟通,他也认为没有矛盾。

二、六十年代农村灾情严重时期,中央领导层对农村灾情分析和是否允许农村推行包产到户,当时一直存在分歧。有人认为主要是“自然灾害”,有人认为“七分天灾三分人祸”。对于试行包产到户,大多数支持试行,如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少数反对,如柯庆施、毛泽东等。尽管毛泽东有时表示“可以小范围内试一试”,但基本态度是反对,而且态度坚决。

当时,因为邓子恢主管农村工作,最了解农村情况,也最敢于实事求是地向毛主席反映民意,并多次进中南海向毛主席竭力推荐包产到户。

邓子恢周围的人了解毛主席的思想,所以一再劝邓老不要去中南海。但他依然冒着在政治风险,不怕丢官,敢于为民请命,坚持讲实话。由于有一时期要求试行包产到户的呼声较高,毛主席极为反感。正好安徽省出现举报第一书记曾希圣作风霸道,大量扣押群众告状信,对中央封锁消息,农村饿死大批人,一直隐瞒灾情不报。问题严重,被毛主席抓到了典型,于是在七千人大会上严厉批评曾希圣,撤了他的职。名义上是摸摸曾希圣的老虎屁股,批判他作风霸道、封锁中央,实际上是借题发挥、敲山震虎,一箭双雕。既敲打曾希圣好发脾气、爱搞一言堂的错误作风,又借此警告主张包产到户的领导人,压一压刮“责任田”的那阵风。

但是,邓子恢并没有被震住,他依然在毛主席面前继续推荐包产到户责任田。1962年8月在中央北戴河会议,一些省委书记又积极酝酿集体推荐包产到户,提倡责任制的思潮重新抬头,邓子恢副总理眼

看这么多人支持试行包产到户,一心想帮助大家说服毛主席同意试行包产到户。没有想到事与愿违,惹恼了毛主席,他怒言指责邓子恢是站在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社会主义,是老右倾机会主义。

随后,撤了邓子恢副总理的职,而且违背事实指责中央农村工作部“十年一贯制,没有办一件好事”,决定撤销中央农村工作部。但是倔强的邓子恢没有灰心,他改而采取离开北京,到边远的广西秘密试验包产到户,寻求实现自己的心愿,这就是历史的真相。

三、曾希圣的工作作风问题,也是历史事实。它有其自身主观因素,也有社会、历史的客观因素。

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党内政治生活极不正常,民主集中制名存实亡。从中央到地方,一言堂盛行,一把手个人说了算。高指标、浮夸风、说假话成为风气。全国胡吹形势大好、莺歌燕舞,到处提倡插红旗,拔白旗。一时间思想混乱,是非不清,干部不知所措。人人提心吊胆,政治压力大,生怕拔白旗。普遍报喜不报忧,不敢说真话。一些经过长期培养锻炼的领导干部,处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久而久之,作风问题也随之变化和扭曲。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当时曾希圣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同时又兼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说明他工作能力很强,这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少有的。正因为这样,曾希圣工作中也不可避免地违背党的教导、形成一些错误作风,犯了许多错误,属于好人犯错误、办坏事。

他在工作上一方面积极推行包产到户责任田,领导农民度荒救灾,另一方面又作风霸道,好发脾气,封锁中央,隐瞒灾情和饿死大批农民。这种双重人格的出现,显然不是偶然的,除有其自身主观因素,也有其社会历史的客观因素。

我的文章和梁文斌的文章写的都是历史事实,表面看似矛盾,其实辩证地想并不矛盾,矛盾和统一都是历史存在。曾希圣同志安徽被撤职后,中央没有一棍子打死,安排他担任华东局第二书记、1965年他到中共西南局担任第二书记,“文化大革命”中受政治迫害,1968年因病去世。

原安徽省长王郁昭同志,过去在曾希圣手下工作过,相当熟悉曾希圣同志的情况。王郁昭同志在有关“包产到户”的著作中叙述:曾希圣同志是一位敢想敢干的人,他虽然秉性刚直,有时爱发脾气,但他水平高、能力强,富于改革开放精神,一心一意想把

安徽的事情办好。在工作中,他钻研精神很强,看准了的事情,雷厉风行,一抓到底,因此在群众中威信很高。谈到“责任田”问题时,王郁昭同志说:“责任田”实际上就是包产到户,它一出台,首先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不是搞试点的队,也自发地搞起来。但对干部来说,许多人确实存在疑虑。省委领导班子虽然拥护曾希圣提出的办法,也知道这种办法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有利于克服困难,但内心总认为这种办法具有很大的风险性,搞不好就会被说成是刮单干风。那个时候,刮单干风就是复辟资本主义。曾希圣本人也有此顾虑,但他作为省委第一书记、党的高级干部,对有利于克服当前临时困难,对既符合群众利益,为群众所欢迎,又符合党的事业发展的事情,他甘愿冒这个风险,哪怕因此而受到处分也在所不惜。曾希圣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解,在省委有关“责任田”的文件中,他苦思冥想,不用“包产到户”的字样,而是把这种办法定为“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与党中央提出的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精神保持一致。他很谨慎,曾先后专程赶到苏州和蚌埠,当面向毛主席汇报请示,毛主席表示“你们认为没有毛病就可以普及推广”。没有想到事情后来却发生了突然变化,他遭到了无情批判、撤职。

实事求是党的基本原则,1978年党中央本着实事求是精神,为曾希圣同志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

2004年10月19日,据《安徽日报》报道:在曾希圣同志诞生100周年时,安徽省委、省政府在合肥市曾隆重举行纪念大会,省委书记王太华同志发表长篇报告,对曾希圣同志革命一生、战斗一生做了实事求是、公正、客观的评价。报告特别提到:曾希圣六十年代“大力倡导责任田,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探索农村经济发展道路的一次意义重大的尝试”。并说他“当时心急如焚,苦苦思索如何拯救群众于水深火热之中,事实证明人民公社于事无补,还有另一条道能够行得通,那就是推行分田责任制,他是农村经济的改革者”。曾希圣倡导责任田,“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普遍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起了十分重要的启迪作用”。曾希圣同志在安徽工作期间功过是非,由此有了公论。功是功,过是过,泾渭分明,这就是客观历史事实。

以上答复妥否,供读者讨论指正。

三千元起编辑出版 文集·自传·家史·家谱

出书范围

- 1、个人文集：诗文、小说、杂文、随笔等单集或合集。
- 2、回忆自传：革命、受难、创业、怀旧等回忆录、自传。
- 3、先辈遗文：先辈遗文集、先烈纪念集、家族先贤传、家史档案。
- 4、家史传记：家族百年史、家族大事记、家族老照片、家谱族谱等。

服务流程

作者来电说明打算→编辑部寄发参考样书→作者寄送稿件图片→公司核算成本价格→协商签约支付定金→电脑录入编排校对→寄送大样作者初审→专业编辑审改→协商设计封面插页→排版设计制作样书→作者终审签字付款→出版印刷送书。

基本价格

“个人文集、回忆录、自传”一般32开本，“家史传记、家谱族谱”一般16开本，封面与照片铜版纸彩印，内文黑白胶印，胶装或线装；二百页出版50本三千元起，设计、排版与加印彩页费用另行计算。

相关说明

所出书一般没有书号，只用于交流与赠送；北京客户上门服务。外地客户来电详询赠送样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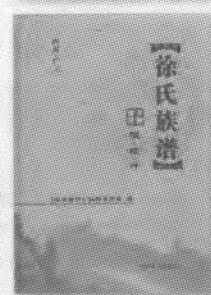
老人出书，历史见证；家族出书，文化传承！

服务电话：010-68920114 68920399

单位：北京时代弄潮文化发展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图书城25号（家史·家谱·传记书店）

登陆网址：《个人出书网》（www.grcsw.com） 《家族出书网》（www.jzcsw.net）



人人出版

全国免长话费咨询
400-668-0650

愿人人都有作品传世

北京天禾佳诚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是国内一家从事图书合作出版的文化公司，公司成立以来与多家出版社建立了密切业务关系。

业务范围：

- 个人出书：诗歌、散文、小说、生平传记、学术著作等。
- 老人出书：回忆录、自传、诗词、散文、思想理论著作、书画图册等。
- 家庭出书：家庭照片画册、家史档案、家谱族谱、先辈遗文、家族音像等。
- 学生出书：优秀作文集、书画作品集、学生纪念集、孩子成长图册等。
- 学校出书：教学经验谈、教研论文集、名师纪念集、名校成就图册等。
- 博客出书：个人博客作品集、网络专题作品合集、社区网文合集等。
- 旧书翻印：旧书急用少量翻印、书刊资料整编重印等。
- 电子音像：音乐、戏曲、录像摄影、光盘复制、磁带复制等。

另有：合作出书 常规出书 宣传推广 合作教材 录入排版设计 著作署名/挂名/编著

出书类型：

- A类：国内出版社出版，国家标准书号，可在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备案查询。可在国内主渠道（新华书店等）发行销售。
- B类：无书号出版，用于交流与赠送，不进入书刊发行渠道，数量一般在300册以内。

基本价格：

- 1、大32开本：封面用250克铜版纸，赠送勒口，内文用70克蒙肯纸或胶板纸。200页出版100本三千元，300页出版100本四千元；排版、设计与增加彩页费用另行计算。
- 2、16开本：封面用250克铜版纸，赠送勒口，内文用70克蒙肯纸或胶板纸。200页出版100本4千元，300页出版100本五千元；排版、设计与增加彩页费用另行计算。

（注：A类型出版的书，1000册起印；所有书籍无论开本印量越大越便宜。）

服务流程：

作者来电说明书稿详情（如需要公司寄送参考样书）→公司报价→签约支付定金→电脑录入编排校对→报送出版社（如需正规出版）→出版社三审三校（如需正规出版）→邮寄样书→作者终审签字付款→回邮样书→印刷送书（附赠成书光盘）。

欢迎“组稿代理”与“项目合作”

目前，中国中产阶级不断发展壮大，传统文化精神逐步回归，民间文化、家族文化的搜集、整理与出版渐成热点；本公司大力开拓民间文化、家族文化的网络数字传播与纸质书出版业务。尤其自（学生出版网）（老人出版网）（人人出版网）（出版发行网）开办以来，深受离退休老人与各地文联、作协、民间作者、学校老师和家长的欢迎，每月编辑合作出版作品近百部；为方便作者就近洽谈与交稿，我公司设立“地方组稿代理”与“编辑出版分站”，请有写作经验与组稿能力的单位或个人洽谈合作。

出版服务热线：010-58608407 82057551 58608409

传 真：010-58608409

投稿邮箱：5805191@163.com

登陆网址：（老人出版网）www.lrchuban.com（学校出版网）www.xxchuban.com

（人人出版网）www.rrchuban.com（出版发行网）www.chubanfaxing.com

公司名称：北京天禾佳诚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邮编：102218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立汤路188号北方明珠大厦三号楼1509室

作品展示



炎黄春秋

1.

高岩：邓小平怎样处理党内民主
对现代中国不同思潮及其后
“公安工作”“大跃进”
共产党是怎样开始的，怎样处理
国际国内怎样控制舆论的

炎黄春秋

2.

田纪云：追忆关于改革的几点建议
杜润生：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
改革重点：建立现代新闻制度
在中国建立新闻制度的实践
中国新闻文化与社会建设

炎黄春秋

3.

“国进民退”的真相和根源
胡耀邦和胡耀邦下台前后
个人主义与公民社会
中国历史与现实的思考
中国新闻文化与社会建设

炎黄春秋

4.

对历史的一次民主大评议
李锐：向谁有关老人学习
国企改革遇到新难题
劳动教养制度与民主斗争
从清末改革到当代改革

炎黄春秋

5.

文件重读：在报刊上展开批评
科学家与在民意的“丑闻”
何力：金耀基的几个问题
世博会与奥运会的共同发展生态
苏东国家领导人更替的教训

炎黄春秋

6.

集厚薄：谁文化精英问题
田纪云：我改革的几点体会
“国进民退”也看在前途
李锐：中国特洛伊木马的悲剧
苏东国家领导人更替的教训

炎黄春秋

杂志

2011年 再度扩版

独立 权威 真实 厚重

全年 96元

邮发代号：82-507

订购热线：010-68532048 68539058

全国邮局网点均可订阅 也可以通过邮局或银行直接向本刊订阅邮购

炎黄春秋

7.

“以党治国”重读
从“国统”到“国统”运动
罗隆基和他的法理学
中山的“三三”八国马和作
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争论

炎黄春秋

8.

杜光：改革的目标模式
王元：李锐之与毛泽东秘书汪东
“一厘半主义”与赵作海案
曾庆红：我认识的胡乔木
1979—1988年贵州日报日记

炎黄春秋

9.

胡耀邦的全面改革主张
中共历史上“反党集团”的结局
知识分子对道德的承担与突破
李锐：王元化与胡乔木
“国统”与“国统”的结局

炎黄春秋

10.

增编：我们从哪里来 到哪里去
悲壮的“八九”
蒋经国之死
田纪云：国统时期的特区工作会议
我们为什么走错了路

炎黄春秋

11.

中国改革的历程及其走向
王元化：温总理的话读来
舆论监督与官员名誉权
温总理“文革”老人问题处理经过
专制主义的改革为什么难以成功

炎黄春秋

12.

公民权利与人大代表选举权
李锐：苏东国家领导人更替的教训
胡耀邦“三家村”
艾克：苏东国家领导人更替的教训
胡耀邦“三家村”

《炎黄春秋》杂志十年精选本 (共二辑) 隆重推出

《炎黄春秋》杂志独立、权威、真实、厚重，在国内读者群中有着广泛的影响

十年精选本是2000年—2009年10年“亲历记”专栏所刊文章的精编集

著名历史学者吴思主编，为你揭秘鲜为人知、触目惊心的中国当代史

精选本分为两辑：《走向1949》和《1978纪事》，时间跨度从抗日战争之初到改革开放前后，所记录的内容偏重平凡人的视角，但也有对重大人物的审视；既反映出了当时普通的家庭生活，也展现了许多关键的历史事件；不仅有原汁原味的纪实成分，更有还原历史的解密文字。



文章都是当事人自己亲历的活生生的历史，内中包括我在延安被“抢救”、随毛泽东进京赶考的日子、不能忘记本原的开国大典、我看守被监护的彭德怀、毛家湾服务员披露林彪家庭生活内幕、宋庆龄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员、胡耀邦向我们的鞠躬等许多著名篇章。

《亲历记：走向1949》定价29元 邮费6元

《亲历记：1978纪事》定价29元 邮费6元

炎黄春秋杂志社发行部

邮购地址 北京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编 100045

咨询电话 010-68532048 68539058

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设想及实施

周巍峙回忆周恩来

新闻发言人制度与胡耀邦

1960年公民肖森的上书

萧乾出任中央文史馆馆长经纬

从清代农业政策看当代农村变革

ISSN 1003-1170



9 771003 117002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定价: 8.00元